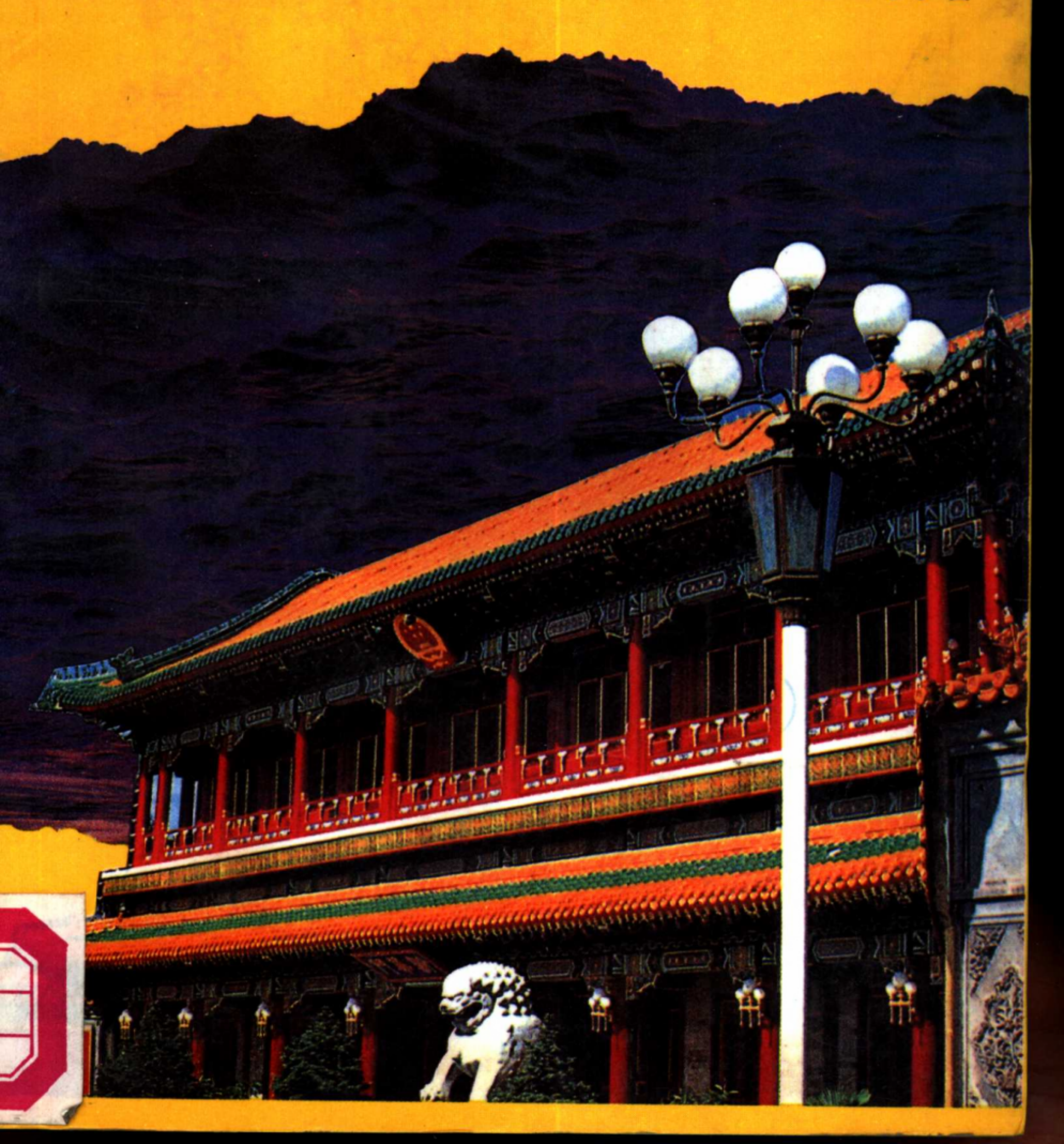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第一卷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魏海生 [illegible] 等译

求　实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张克敏
封面设计　王　岐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魏海生　艾　平　等译

•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25印张　307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 册

ISBN　7-80033-169-5/D·63
定价：5.80 元

本卷译者：

艾　平（作者序、引言和第一章）

魏海生（第二、三章，附录二——六）

王　宁（第三、四、五章）

黄家全（第六、七章、附录一）

张文诚（第八、九、十章）

童孝华（第十一、十六章及附录七、八）

苏　玲（第十二、十三章）

侯建新（第十四、十五章）

许宝友（第十七、十八章）

周成歧（第十九章，结束语）

校　订：

杨淮生　杨立文　朱立人

资料工作：

魏海生　李嘉凤　华思薇

统　稿：

魏海生

我们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水浒传》（作者原引自英文版，引文有出入）。

编译者的话

20多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演出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今天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动乱早已过去，但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忘却这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为了给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推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为了开拓我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大革命”研究的视野，我们翻译、出版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撰写的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全书共分三卷，其中第三卷《大动乱的来临》(1961—1966)目前仍在撰写之中。

作者是前英国国会议员（工党），中国问题权威刊物《中国季刊》编辑人之一，60年代任《每日电讯报》记者，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讲1988年该校开设的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广泛利用中国以及西方、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论著和回忆录，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对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

期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了这些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和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从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政治体制、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国际关系以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个性、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和个人恩怨等各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环境、立场所限，某些问题的论述还存在不妥之处，有些观点和说法缺乏说服力。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各卷后面附有长达10多万字的注释，大多是有关资料和引文出处的说明，且多为国外出版的文献。为方便我国读者查考，我们没有照译全部注释，而是根据需要加注。凡引文有中文版本的，基本上都参照中文版本作了校核和注释，并将其改为脚注，放在每页正文之下。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引用的不少资料，是我国未公开发表的文献，有些引文由于未查到中文原件，只好根据英文译出，可能有不准确之处，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教授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李嘉凤、华思薇、张军立等同志作了大量的资料核查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原作者麦克法夸尔先生，他曾先后寄来有关本书的材料、他本人的简历以及他撰写的中文版序，对翻译、出版者给予了热情鼓励。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的翻译、审校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1989年2月

中文版序

听说我关于中国政治的二卷书已经译就准备在中国出版，我既感到意外，又觉得欣喜。我还没有机会查看译文，但要对承担起繁重任务，将篇幅如此巨大的书（原文分别为450页和几乎490页）译成他们自己文字的译者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承担这一项目的出版者。我殷切希望，那些对1956至1966年间的事件了解得比我多的中国人能读到这两本书，这样他们或许可以帮助我纠正关于事实和理解方面的错误。

1984年，我曾有机会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邀请的学者，以这些书为基础作过两次报告，并在那次和1986年的研究访问中，与研究所当时的所长和他的同事们、党史专家以及其他学者，包括中央党校的部分学者，进行过富有成果的讨论。我要再次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感谢。我还要对一些人表示敬意，他们以"开放"的精神使人们得以获得丰富得多的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基本文件材料——不论是关于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的时期。我相信，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扩展开来。这将使中国和西方的专家得以对中国现代史作出更为

准确的描述。

我有两点遗憾：一个是我参加的那些交流未能在我的原书出版之前进行，因为那些谈话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和理解；另一个是我一直希望见到那些参与了我所描述的事件的官员并向他们提问，然而所有努力至今未果。在撰写晚近的政治史时，显然最好能向那些曾亲历其境的人们核对事实和看法。如今我只能希望，在完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部书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之前，我的运气能好些。这一卷将以《大动荡的来临：1961—1966》为题。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989年1月16日
于哈佛大学

前 言

我第一次撰写有关1956至1957年间中国事件的文章，是在那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我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毕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问题观察者”。我是在费正清的睿智指导之下，在哈佛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我曾幸运地受雇于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在该报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戴维·弗洛伊德手下工作。这使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的和苏联的形势发展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62年，借助于杰拉尔德·弗鲁因德联系到的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对1956至1957年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1968年，我再度回到这个时期的题目上来，靠的是约瑟夫·斯莱特和戴维·芬克尔斯坦争取到的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贝尔是一位耐心的支持者，他听说我的研究成果要从一卷扩展成三卷，依然处之泰然。

1969年，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特约高级研究人员在纽约继续进行我的工作。这次的研究课题是由东亚研究所和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联合赞助的。两位研究所的所长，约翰·林德贝克和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给了我许多友好的鼓励和学术方面的推动。约翰·林德贝克不幸早逝后，韦慕庭又从东亚研究所争取到新的资助。我曾有机会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其他单位工作的或同这些机构有联系的学者交谈，其中包括：鲍大可、张书成、詹姆斯·哈里森、唐纳德·克莱因、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理查德·索里奇、弗雷德里克·泰维斯、唐纳德·扎戈里亚，我还在一所大学就现代东亚这一主题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过一篇论文，这些谈话和就我的论文所发表的意见都使我获益匪浅。张书成、保罗·哈珀、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弗雷德里克·泰维斯让我拜读了他们的论文。A.M.哈尔彭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卢西恩·派伊和戴维·麦凯克伦）允许我就哈尔彭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手稿作了大量札记。

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期间，我了解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可以得到大量新的文件材料，认定可以试图写一部1956年至1965年的文革起源的历史，并把这一阶段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结合起来加以利用。理查德·索里奇让我任意利用他卷帙浩繁的档案材料，唐德刚帮我熟悉他为东亚图书馆收集的红卫兵小报，而我的研究助手布鲁斯·雅各布斯则长时间地翻阅、搜寻、复印这些材料。当我请陈志让和中岛丰夫提供新材料时，他们的反应是慷慨的。福特基金会提供的旅行资助方便了我搜寻更多材料的努力，我去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斯坦福校园内的胡佛研究所，东京和台北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和联合研究所。在各个研究机构，下述人士拨冗接待了我：吴文津、王冀、余秉权、马大任、吴振蔡（译音）、郭华伦、哈拉尔德·雅各布森和威廉·徐。回到英国以后，琼·勒斯特巴德又向我提供了得自香港的另一些材料，而比尔·布鲁格和肯尼思·沃克则使我得以利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缩微胶卷。

1971年秋，当时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查塔姆大厦）所长的肯尼思·扬格聘用我为研究员，让我完成这项研究。此后我的工作是在该所当时的研究主任詹姆斯·福西特的关怀下进行的。1972年秋天，新任所长安德鲁·肖恩菲尔德拨出专款，使我得以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我撰写本卷的最后阶段，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斯图尔特·施拉姆耐心细致地阅读了全部手稿；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和本杰明·施瓦茨读了部分手稿，他们极富见地的意见，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全国讨论会成员的看法（他们听取了我关于这一阶段的一个方面的论文），都对我大有裨益。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我还就1956至1957年这个阶段同许多人长时间地交换意见，从而使我获益甚多。他们是：霍华德·布尔曼、菲利甫·布里奇曼、爱德华·弗里德曼、理查德·哈里斯、艾丽斯·兰利·谢、埃利斯·约菲、沃纳·克拉特、保罗·克顿斯伯格、伦纳德·夏皮罗、理查德·所罗门和艾伦·怀廷。夏志清、Y.C.刘女士和H.F.西蒙使我避免了把过多的"克里姆林宫学"的词汇强加到中国人的语言上。

在查塔姆大厦，赫米亚·奥利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尽心尽职的编辑。她一遍又一遍地勘误和校正，其认真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她的职责本身的要求，诺拉·贝纳姆在枯燥的打字工作中努力振作精神，艾琳·孟席斯巧妙地安排我能按期交稿，莉莲·布利斯比看了引言并提供了有益的意见，研究所图书馆和出版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高效率地向我提供了书籍和文件。

当整齐干净的清样开始从东方出版社送来的时候，我从台北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得到了两本极为珍贵的毛泽东讲话及文章的合订本（我在所附书目和有关方法论的注释中介绍了这两本书的情况），我采用了所有有关的新材料——清样送回时可不那么整齐干净了——但由于材料到手太晚，许多内容只好放到注释里了。

对我提及的上述每一个人，我都要对他们的建议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的错误同他们丝毫无关。我所欠下的人情远远不止那些使我在多年研究中获益的同事，即使是这些同事，我在注释和书目中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也无法完全报答他们的贡献。

我的妻子希望我感谢她这个“没有参与本书撰写工作的人”。但事实恰恰相反。她在身兼母亲和记者二任的同时，挤出时间来几读手稿；在敦促我进行修改时，她显示出自己对中国政治具有相当的了解。本卷即是献给她的。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973年8月于伦敦



作者简介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前英国国会(工党)议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60年代任《每日电讯报》记者，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多次来华访问、讲学。著有《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中苏关系（1949—1971）》等。

目　次

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部分　整风运动

第四部分　反右运动

引　言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上去象是一个稳定、严整、举国一致的国家，其领导是在长征、抗战和内战中结下同志情谊的一群人。他们进行了一场革命，然后又大胆地担负起改造一个由6亿人民组成的社会的职责。他们借以统治和革旧布新的工具，是世界上可能最有效力和活力的共产党；在这个党的背后，是一支拥有25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原文如此）。然而除了西藏这个极为特殊的例子，他们从不需要解放军采取大规模行动来支持自己的文人政权。

不出几个月，这个宁静、和谐的景象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在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排重炮已经轰响。1966年6月，第一批高级牺牲者被公开撤销职务。8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又一次重大调整。会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狂热的群众集会，其间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对毛的崇拜愈演愈烈，而他以前的战友似乎注定要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共产党这架机器完全

瘫痪了。党的地方领导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押着他们的是涉世未深的红卫兵，这些人从毛的令人激动的“造反有理”的指示中汲取力量。一直是党的卫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却接到命令要去支持摧残党的人。只有当取胜了的红卫兵们陷入你死我活的武斗时，军队才被用于恢复秩序。经过“文化大革命”，军队成了唯一具有实际权力的全国性组织。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使毛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遭到否定：他一贯坚持共产党领导一切，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使党的干部心灰意懒，在群众眼里威信扫地——显然，党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毛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然而“文化大革命”后在新的党的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军人；毛曾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感到惋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本人却被变成了神；毛一贯主张“治病救人”，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笔一挥就清洗了许多同事，随之葬送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做法。

毛不可能精确地预见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任何后果，但是他所走上的那条路所具有的危险性，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使中国的政体成为1966年春天那样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那么他为什么要毁掉它再来重建？本书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解释是：这是一场长期斗争的两条路线的决战，是毛的正确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和接班人刘少奇所坚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决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一所谓长期斗争的说法，其根据就是红卫兵出的小报上经过选择而刊登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为了赞扬毛，有时是为了诋毁刘或他的所谓支持者。然而认真研究一下事实就会发现，毛和刘的立场都并非始终如一，他们也并非总是对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那些岁月里，中国领导人在关键问题上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使用“两条路线”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涉及的问题极端重大。在很多方面也的确如此。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问题。同时，正如涉及到有关人的问题时所一贯会发生的那样，这里面也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积怨。

本书并不准备提供一部1956至1965年间中国的完整历史，而是试图检验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和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悲剧。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曾将其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革命。经过15年之久的挫折和失败——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干涉的结果——他们聚集到了毛的周围，而这也就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也犯过新的错误，遭受过新的挫折。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意志坚强，充满自信，特别是他们始终团结一致。要想衡量这种团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只消看看那些独立后领导人未能继续保持团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就够了，在这方面人们立刻就会想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似乎朝着同一条路走去。延安的“圆桌”被抛弃了，一整代领导人消失了。他们并没有象斯大林的受害者那样走向死亡，但他们受到的斥责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当中犯的错误，还有涉及他们整个生涯的活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被否定，毕生尽心尽力的工作被一笔抹杀。

鉴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一些个人，我在本书的适宜位置简要叙述了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以便于解释他们在那些关键岁月中的行为。很遗憾，能够据以作出这种评价的可靠材料寥寥无几。有三位领导人在当时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因此我

觉得最好在开始叙述之前先对他们描述一番。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刘少奇，“文化大革命”的打击目标；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后的动荡的幸存者。

毛、刘、周

在这三个人当中，毛的特点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最容易描述的。他以埃德加·斯诺为媒介为世界提供了一部自传。①他著述甚丰，经常发表讲话，还是一些研究报告和回忆文章的对象。所有这些材料都以一定的可靠性揭示出他的个性的某些方面。他的许多个性都同他出身农民家庭有关：朴实而又机敏；诙谐和举止之中表现出的粗俗；偏爱直言直语，生活朴素。他在政治上的反对者承认他有魅力，特别是在他置身于一小群人当中时尤为如此；他的崇拜者也不隐瞒他被激怒时脾气很大。他博览群书，似乎乐于在听众面前显示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然而他决不是个书呆子，而且毕生喜好艰苦的体育锻炼。他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欣赏武功的诗人。他对自己的看法，中年时是一个英雄天子，70几岁时则成了孔夫子式的教师。也许他最为重要的智力特点，是正确“分析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普遍经验”②。但无论何时，他最强有力的品质却是自信。这一点，再加上恒心，支持他渡过了失败和撤退的关头。

以上看法可能是普遍公认的。然而他个性中相互矛盾的方面却给研究者带来一些困难。这些矛盾的方面促使他在本书所研究的这段历史的不同时期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毛自己关于理想政治局面的公式充分体现了这些矛盾，这一公式是他在1957年夏天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0—70页。——译者注

② 斯诺：《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译者注

第一次提出，12年后又被写入新党章的。毛说他的目标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①的局面。但在本卷所叙述的前两个年头中，毛更强调的是这“六有局面”中每一对“有”的后一个方面。很有意义的是，这一公式开始的提法是把民主和自由放在前面的，可最后定稿时却把重点颠倒过来，这标志着毛在1957年下半年认为需要的是更多的纪律。

这些矛盾也影响到毛同他的同事的关系。1939年斯大林60岁生日时，毛曾讲到他认为坚强的个人领导是重要的：

> “革命阵线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②

这段话同刘少奇所坚持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即：毛虽然是全党的领袖，“他也要服从党”。但是也要把毛的理论同他的实践作个比较。有证据表明，他要求拥有发表纲领性声明的权力，但他并不要求绝对服从。邓小平1957年告诉青年团的干部，“毛主席从未说过他不会犯错误。”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在60年代，毛对此越来越恼火。然而最开始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却是他自己的民主领导作风。

---

①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译者注

②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作者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34页。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毛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对他的矛盾的目标的两个方面给以同等的重视，但却从未成功过。本书下面部分所描述的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毛，是有变化的，他的政策变化不仅反映了他个性当中的不同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变化着的国内国际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在本书所研究的所有主要人物中，刘少奇是最无色彩的，一个声名显赫却毫不引人注目的人。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北京的首脑彭真那样的领导人，即使站在毛的身旁，也能显出自己是强有力的人物，而刘则显得含蓄得近乎羞涩，谦虚得黯然失色。也许他受了过多的“组织高于个人”的训练，以至他的个性也在其间殒灭了。当他23—24岁的时候，一度曾是他的上级的张国焘（他在30年代围绕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败在毛的手下）第一次遇到他，张评论说，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多情绪激昂，充满热情，而刘“很少显得激动”。张对刘的概括是：“有些书生气，深沉，少言寡语，但显然坚韧不拔”；从气质上讲不以苦乐为意；他一步步升上去“不是由于显而易见的才干，而是靠工作上切切实实的努力”。刘对待工作和个人生涯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众多攻击，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在1957年对一群学生解释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要准备好长期从事艰苦、无私的工作，而最终就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报偿。显然他想到自己的经历，正如有一次他向自己的儿子宣讲这一哲学时所吐露的：

> “你要成名成家，那你就得埋头苦干，不要先想出名，越想出名就越出不了名，你不想出名，倒出了名。这就是马列主义辩证法……我干革命根本就没想到当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当上了，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了。”①

---

① 《刘少奇对刘允斌的一次谈话》（1963年）。——译者注

刘最重要的特点显然是专注。锲而不舍的态度使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物登上了顶峰。然而他的显赫是受之无愧的，他有相当的才干。一位印度驻华大使对埃德加·斯诺说：

> “一开始刘少奇给人一种平庸的肤浅印象。五分钟的交谈就反映出他的思维逻辑性极强，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作出简单然而却是有力的和透彻的回答。”①

刘曾长期在城市和工人中间工作，主要是在敌占区。他显露出并发展了组织工作的才干，这种才干就连政治上的对手也不能不承认。毫无疑问，40年代初，毛在希望按自己的意图整顿中国共产党时，他之所以选择刘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刘的才干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对毛有用，还因为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6个月期间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规培训，这使他在反对毛当时的主要对手——他们也在莫斯科受过训——时成为毛的有力同盟者。也许在外人看来，刘少奇论党、党内斗争和党员修养的主要著作显得冗长、啰嗦，充满“散漫、零乱的句子”，“对材料的组织过于讲究，而思路却不时显得杂乱”，然而这著作却使他具有了理论家的独立地位。在6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中间流行一种说法：“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

不管刘少奇可能多么谦虚——他的一个敬仰者宣称，刘不同意出版自己的文集，至少是在毛还在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功绩似乎还是了如指掌的。人们感到，他对机遇和个性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刘知道他对毛的支持是使毛得以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也可能会使那忿忿不平的心绪变得更为复杂。有件事很明显，就是刘并不急于赞扬毛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似乎也不同意毛使用“主

---

① 斯诺，《大河彼岸》。

席”的头衔。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主席是什么？我从未听到苏联有人称列宁为'列宁主席'！"他还坚持说："中国的斯大林尚未出现！"①即使在刘开始颂扬毛是领袖和理论家——这可能是对让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回报——以后，他也没有把毛奉为斯大林式的偶像。1947年，刘在一次会议上说：

> "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如果有人要充作这样的领导者，那他就是猪鼻子插葱——装象。"②

正如一名学者所说的，即使刘由于看到毛的身上有着必不可少的远见卓识、领袖的魅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心，接受毛为领袖，他也肯定"把自己看成能够洞察细节和能够从事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的人，而没有这种能力，毛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无法实现。因此，他接受了作为毛的助手的地位，但却显然无意将自己的批评能力束之高阁。"③这些能力他一直保持着，甚至在他遭受贬黜之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待材料，是摆事实讲道理地回答对他的指控，而不是卑躬屈膝的自我贬损。这些材料表明，他在逆境中保持着勇气和从容的尊严。

周恩来已连续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达45年以上。在共产党内担任要职的这一纪录，没有任何人能与之相比，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内。在革命的岁月中，他在所有重要事件上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唯一的例外是他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时他在国外。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

① 作者引自红卫兵小报《人大三红》1967年5月11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85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斯图尔特·施拉姆语。——译者注

后，他一直是总理，这使他成为本世纪所有重要国家中担任政府首脑一职时间最长的人。的确，他身居高位如此之久，以致于他的地位似乎成为不可取代的了。

周成功的秘诀似乎很简单：他把无与伦比的能力、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无与伦比的精力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的阶段，他已70高龄，却能几乎几天几夜不睡觉。然而周在同毛共事的38年间，他之所以一直处于显赫地位，恐怕在于他同毛的关系，至少同他的各种条件同样重要。

周同毛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能是在长征途中建立的。在江西苏区，周曾取代毛负责军事，尽管苏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毛创建的。当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围剿难以粉碎时，据说是周下达了开始长征的命令。

1935年1月，夺路而逃的共产党部队在贵州省的遵义做了短暂的停留，并在该地举行了一次最高级会议，批判了那些在军事上犯了错误，致使蒋介石得以把共产党人赶出江西苏区的人。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周做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可能还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结果，毛接过了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周，让他担任副主席。担任新职后，周似乎继续履行迄今负责的一切职能。也许正是周甘愿在毛手下任职而不抱积怨这一点首先向毛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完全忠实的下手。

这段插曲也表明周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既是要幸免于难，也是要尽心尽力：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并且不允许自己由于考虑“面子”而停止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

在毛、周的关系上还有一个谜。共产党取胜前，周曾多次证明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但在取得政权后，特别是在本书论及的年代里，他几乎总是与对内和对外的温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他同毛更有节制的那一面，或者——按“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衡量——不那么“毛主义”的那一面相处得更好。

在政策问题上，周的立场基本上是温和的，原因之一大概可以从他个性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找到。毛如同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是个有点孤独的人物，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就连最亲密的支持者也并不总能理解他。刘尽管在党的机构中有一批圈子不大的支持者，但看上去也象是个形影孤单的人，而周恩来则显然是在同他人相处时如鱼得水的人，不管这种接触中感情的成份多么少。即使是1958年周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以后，他仍然会见大批外国代表团——从外交角度考虑，其中不少人并不重要，而需要他处理的其他事情又无疑很多。自从学生时代起，周就作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崭露头角。他驾驭他人的忠诚靠的是他个人的品格而不是远见卓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未试图为自己确立"理论家"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精于此道的谈判能手。然而谈判，或者调解，要求当事人乐于做交易，而周在原则上的坚定立场总是允许在方式上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即外柔内刚。

一个善于同人打交道的人必须会做出妥协，而周操纵他人的才干同他往往偏爱温和政策的习惯似乎有密切的联系。即使周的这种偏爱有时使他同毛产生分歧，毛显然仍旧感到周会顺从他的指示，哪怕是在他们两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的时候。忠诚加上能力，这就是周处于今天的毛——周两头政治之中的原因。

为什么选择从1956年写起？

正是在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的事件——中国完成集体化，苏联召开苏共二十大——从而为一系列明显地——如果不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过程做了准备。

在毛看来，集体化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最后步骤。当集体化的完成已经在望时，他宣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

折点，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中国的两个经济“跃进”中的第一个。在后来的5年中，毛和他的同事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试图取得经济上的重大突破上。当“大跃进”在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中的1960年带着怨声和隐泣结束时，它已在最高层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并将导致对发展战略的重新估价。其结果是毛同他的许多同事分属意见相左的两方。此外，争论还使毛在党内的权威受到相当打击，并增加了他的疑心。

乍一看，毛在这一点上的忧虑似乎有些奇怪。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他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处于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地位。对他加以斥责，败坏他的声誉，而又不危及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那是决然做不到的。然而早在1956年，当非斯大林化刚刚开始时，毛似乎就已经开始担心了。尽管非毛化不大可能发生，但他的某些同事可能乐于利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攻击斯大林的机会来削弱他的地位。由于毛自己曾决定，为了防止斯大林死后在俄国发生的那种拜占庭式的争斗在中国出现，他要逐步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这使得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里人们又可以察觉毛身上的矛盾：他让出权力的意愿，被他对那些对权力过于热衷的同事的怨恨所抵消。在本书论及的这10年中，这种怨恨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成了促成“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大还在中国引起了其他重要反响。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在匈牙利随之发生的暴乱，在毛的心底提出了共产党同统治下的人民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应该怎样治理中国？这就是毛在1957年面对刘少奇、彭真和其他党的官员的坚决反对时，力图通过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毛当时改变了初衷，但是在60年代中，当他越来越对苏联选择的方向感到担心时，问题显得更为紧迫了。

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以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教义，使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能力以及他们将把共产主义集团引向何方的问题产生了忧虑。1959年，这种忧虑由于赫鲁晓夫似乎准备同美国达成妥协而进一步增长了。从1960年起，中国开始斥责苏联要向帝国主义妥协的意愿，但是这种责难并没有使苏联领导人清醒过来。于是毛开始重新全面考察苏联社会，力图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俄国人偏离了他所谓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在50年代初期，中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抛弃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到60年代中期，毛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完成了。他认定，必须防止中国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必须对党和国家进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为中国设计一条不同道路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代表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毕生思考和努力的高峰。但在毛头脑里，正是1956年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导致他开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

第一部分

“根本的变化”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高潮”

“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在他为1956年1月12日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① 中这样写道。这部洋洋大观的著作描述了毛号召省委领导加速农业合作化前后农村的情况。毛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篇讲话（到10月才发表）里，批评谨慎的党的干部“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②，并建议为加速农业合作化规定一个新目标：到1956年10月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增长一倍，而不是象中央农村工作部计划的那样增长55%。

同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的速度相比，毛的目标似乎相当保守。毛准备用14个月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到1955年11月底就实现了，只用了4个月。毛7月份发表讲话时，参加农业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页。——译者注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页。——译者注

产合作社的农户只有1690万户。而当他12月27日在《序言》[1]上署名时，已达到7000万户。中国的1.1亿个农户中，60%以上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劳力、牲畜和工具汇集到一起，交给集体支配。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典型的家庭耕作制度几个月里就被推到一边，“暴力、抵抗和混乱”比苏联集体化时要少得多。据毛说，到1955年底，“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2]这就是他所说的“根本的变化”。一个月以后，毛讲明他说的是“政治形势”中的根本变化。他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已经不远了，只需要3年时间。[3] 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了毛的估计的含义：“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胜负是已经被决定了。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4]（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第一节 农 村

为什么毛认为变化是根本性的？答案可以从他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中找到。到1955年6月，共产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家。1951到1952年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效地摧毁了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使共产党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到村一级。到1952年底，思想改造和“五反”运动已使共产党得以控制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到这时，使经济从12年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中恢复过来的目标也基本实现了，而且当局正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直到两年半以后才宣布计划的具体内容。

① 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下同。——译者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3页。——译者注

③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原注

④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页。——译者注

1954年秋天，新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建立了政权的正式结构。对毛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最高级的同事来说，巩固中共政权的目标已经实现。刘少奇在1954年底讲的一段话大概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造的任务，开始进入一个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① 刘和其他人当然也赞成农业合作化的长远目标，但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对于政局的稳定和实现其他目标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还记得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担心在中国加快这一过程可能会失去农民的支持，而随之而来的分裂则可能危及他们的经济发展计划。

但是毛却不这样想。在7月的讲话里他预言，如果继续允许私人农业存在下去，将会出现可悲的后果：

>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②

---

①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报《政法公社》1967年4月16日。未查到原件，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页。——译者注

简而言之，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中共在农村的天然同盟军将会变得疏远，而潜在的敌人将会变得更强大。

这一政治问题同取得对剩余农产品的控制的必要性密切相关。剩余农产品——用于支付机器进口，作为轻工业的原料，作为人数不断增加的城市工人的口粮——对工业化计划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都可以证明，集体化使取得粮食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来说变得简单得多了。此外还可以假设，由较贫穷的农民控制的集体，将比单干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农更乐于交出剩余农产品。

毛发表讲话时存在的另一个关键的农业问题是生产。如果农业生产不能迅速增长，就没有余粮可收。落后的产量已经迫使计划制订者压低原来的五年计划目标。毛根据80%已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结果认为，集体化将使生产增加——至于苏联的经验，他们太不走运，不足为证。他提出，如果中共对自己和对群众缺乏信心，不敢将合作化推向前去，就不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到那时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换句话说，对毛来说，农业合作化是实现当局基本目标的必要先决条件。

尽管毛对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坚信不疑，然而在7月份没有迹象表明他已料到他的讲话会引起如此迅速的“根本性变化”。当他在5个月后撰写《序言》时，他的预计仍然是保守的。他估计，向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的转变将在1956年完成，而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以后称为集体）要到1959年或1960年才能完成。甚至《序言》之后的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再度提出的时间表也只要求到1958年基本完成合作化。实际上，到1956年6月，已有63%的农户进了合作社，到同年12月，即已达到88%。

农业合作化是毛个人的一个胜利。引起“高潮”的是他1955

年7月31日的讲话①，而这篇讲话是他在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他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而这些省级领导人又再次显示了党的机器极强的组织能力。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的官员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对他们的任职安排，很可能是在毛向他的同事吐露他的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心以前做出的。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政治局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是由陈伯达提交的。

到这个时候，对所有人来说，"高潮"的出现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尽管规模有多大要到几个月之后才能变得明显起来。证据是，政治局做出决定，公布毛7月提出的目标，这一决定在全会上被接受了。毛本人颇具信心地批准发表他的讲话，并对全会说，实现合作化是中共近期取得的四项胜利之一：

>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这四个方面取得了胜利：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镇压反革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这些胜利都带有对资产阶级做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将长期继续进行。"②

面对这一胜利，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反对过毛的人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在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

> "几年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在土改之后，除了普

① 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译者注

②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5—217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遍发展劳动互助组，要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等一段时间。结果，我没有能够推动和认真研究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错误的。”①

刘可能还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样，由于主持了1955年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而做了自我批评，因为那次会议接受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关于将现有的67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散2万个（原文如此——译注）的建议。几乎可以肯定，正是这一决定促使毛进行干预，以他7月31日的讲话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新的推动。

刘少奇用了“也”字，这表明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就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缺乏热情的态度做了自我批评。这些人中可能包括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农业部长廖鲁言。这两个人在当年早些时候都主张对农业合作化要谨慎。某些高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暗示过他们的错误。邓子恢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毛的批评，但他当时似乎并没有做公开的自我批评。他也没有参加1月25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由农业部长廖鲁言提交讨论的，他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邓的副手。最后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子恢终于做了自我批评，但这太晚了，使他没有能像其他所有副总理一样被提升进政治局。

第二节　城　　市

到1955年10月，人们一致认为毛已经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

① 作者引自《农业机械技术》1967年8月第5期。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的，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反对者做出自我批评并不是证明这一点的唯一迹象。另一个迹象是工商业国有化进程的加快。六中全会曾讨论了工商业应如何对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做出反应。不久以后，中共领导人就着手使中国的资本家做好准备，以工商业集体化的崛起来适应农村的情况。10月29日，毛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执委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进行座谈，参加者有500人以上。毛、周恩来总理和高级副总理陈云发表了讲话，“工商联”的主席和其他知名人士也讲了话。11月1日，陈云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有1000多名工商业者参加的座谈会上再次讲了话。

可能在这后一次会议上，向“工商联”的174名全国执委传达了当时被称为“指示”的毛的10月29日讲话。当天，“工商联”的执委会开始举行一次为期3周的全会，这是1953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在“工商联”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和副总理陈毅——他以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上海市市长的身份与会——发表了讲话。“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对执委们说，农业合作化和生产的新高潮正在改变经济的面貌，并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国有化冠以此名——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工商业者不同这一改造一同前进，他们就将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他还说，在改造过程中，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树立为生产及消费者服务的思想。然而他这些话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并不清楚。会议结束时，“工商联”的一位副主席总结说，这次会议完成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一封“工商联”执委会致全体工商界人士的公开信，号召工商业者更快地接受改造。《人民日报》的社论将这一信息的含义讲得很透彻。

中共中央也就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召开了自己的会议（11月16日至24日），尽管当时没有公布。刘少奇在会议第一天发表讲话，描述了一个月前毛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国内

忐忑不安的情形：

> "现在资本家情绪很多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也不安，中国有六亿人口，有五亿几千万情绪不安，动荡，不晓得怎么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现在要来改变两种所有制，要来废除两种私有制；一种是把小生产的私有制——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一种是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使得全国除工人阶级之外全国人民都动荡不安。"①

尽管这段话，以及同一讲话中的其他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用来攻击刘少奇，但他当时所做的只可能是描述一种可以理解的全国性情绪。显然，他并没有根据他对国内情绪的评价要求放慢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相反，他强调了当前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重要性——实现公私合营将打破资产阶级对国有化的抵抗，尔后就将轻而易举地实现向完全国家所有制的转变。因此，刘主张，为了保证当前这个关键阶段的胜利，要进行阶级斗争：

>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决定胜负的斗争。一个起决定性变化的斗争……到了最后，要宣布国有化的时候，所有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好多斗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不是把斗争摆在宣布国有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说要有严重的斗争。而是要把现在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把公私合营看作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斗争，是淮海战役……我们跟资产阶级斗争，到底是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呢？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了，农业合作化了，手工业合作化

①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者引自《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译者注

了，胜负问题也就解决了。”①

刘还强调了工商业者的技术对国家的重要性，期望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淮海战役”中得到他们中间比较进步的人士的帮助：

“有的资本家是很能够做事的，他们的管理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超过我们的同志。他们中间精明干练，懂技术的人不少。把资本家说通了之后，改造之后，他们甚至可能比共产党员管工厂管得好一些，这种情形是可能的……在资本家中间，在资本家的老婆中间，在资本家的子女中间，有一批积极分子，赞成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这是很可宝贵的，对于今天的阶级斗争形势是很有帮助的。他们的作用相当于在战争中打一场大仗，他们就象战争中的英雄……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堡垒，需要资产阶级里面有一些人起义，起来赞成共产主义，而且是积极分子……资本家的老婆晚上回去一席话就比两个陈副总理〔即陈云和陈毅——作者〕还厉害，要这样看她的作用。”②

中央开会之后，12月初，毛泽东到上海做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访问，市长陈毅安排他同该市80名左右工商业界头面人物见了面。毛对那些人说他需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据其中一个人说：

“毛一开始先赞扬‘民族资产阶级朋友’过去所做的巨大贡献。然后他接着说，‘现在我从北京到这儿来，是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他说，许多工商业者要求加快对私人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则民族资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进步的

---

①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2—183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1—182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过程中就要掉队了。’他对我们说，‘我想我不能同意这一点。但对这个问题我消息不大灵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了两只耳朵到这个会上来，如果你们是想听我讲，那就会失望了。’”①

毛一直听了两个小时，所有发言的工商业者都主张加快向国家所有制转变，有的说只要5年就能实现。据说毛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过他仍然感到，在决定是否加快进程之前，必须慎重考虑怎样才最符合“民族资产阶级朋友”的利益。

在这阶段，即1955年12月，为完成私人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变所规定的目标是1957年。据后来（一位带有敌意的作者）的说法，“急急忙忙”召集各省省委书记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这一目标，然而，如果说行动中有任何匆忙的话，那恐怕是农业合作化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所造成的。实际上毛在12月6日一个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讲话中亲自批准了要以1957年为完成转变的期限。如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一样，毛似乎被事态的发展所压倒——或者说，这次是被北京市的党组织所压倒。

在12月份，好几个工业城市召开了会议，宣布他们将在1957年完成转变——他们大概是从陈云那里得知了官方规定的时间表。直到1月3日，《人民日报》还在社论中重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在1956和1957两年中基本完成。”这家报纸指出，12月初，国有化的速度有所加快，涉及主要在中国六大工业城市的2000多家企业的30多个工业部门同意实行全行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改造。在同一地区，十几个商业行业，涉及3000多家商店，也表示同意实行转变。但是，只有一个城市——北京，理解了这些初期成功的含义。

① 罗伯特·洛，汉弗莱·埃文思合著，《逃离红色中国》第136页。——原注

早在12月16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提醒不要为了加快运动而盲目合并。然而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党组织的一次干部会议在进行了5天的讨论后，提出一项“初步”计划，号召在1956年底完成向公私合营的转变。到1月初，武汉也醒过梦来，看到事态的发展有比所规定的速度要更快的种种可能性，并预计在1956年也要完成这一过程。但是公众丝毫没有想到，北京在1月的头10天就对工业和商业进行了转变，手工业的转变紧接着于11日和12日完成。一开始，这可能不过是叫法上的变化——私营企业简单地改称公私合营——但有的确实是“盲目合并”。很快，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庆祝这一成就，毛、刘少奇、周恩来都参加了大会。

上海一个工商业者回忆说，就在毛那次与他及他的同事的友好谈话以后，仅仅几个星期市里就告诉当地的工商业者，转变过程要在今后6天内完成。北京举行大会那天，上海的工商业者开会讨论北京的办法，同意在20日完成提出要求转变的准备过程①。但是，第二天，上海市的一名领导人在干部大会上讲，市委觉得转变过程本身在20日就可完成②。与此类似，其他工业城市也被北京的成就推动着采取行动。到1月底，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转变过程已基本完成。

陈云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一次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是改造已经完成；改造刚刚开始。在这个改造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求我们逐个地加以解决。”③同上海那样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城市相比，北京的问题相对简单一些，然而一旦北京发出挑战，上海不能不作出回答。陈云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①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7日。——原注

③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第307—318页。——译者注

讲述了他的看法：

> “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按行按业、分期分批来进行的。今年1月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政府改变了原定计划……为了适应当时的要求，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迅速的改变，使许多业务部门和许多地区来不及积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经验，因此就在敲锣打鼓庆祝改造的那些日子，许多地方有不少的工厂、手工作坊、商店纷纷合并，有些不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①

大而不当并不是匆忙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唯一后果。供应、生产、销售打乱了；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一夜之间被扔到了一边；产品的品种减少了；营业时间缩短了，也不去考虑对顾客是否方便。

11月30日，就在“工商联”主任委员告诉他的同事，在改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必须改变以后仅仅3个月，周总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混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原来的经营办法决不能“轻易”改变，好的办法要当作“应该发扬光大的历史遗产”加以保护！2月8日，在陈云作了说明之后，国务院决定：“私营企业在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一般应照旧经营，半年不动”。②有秩序的转变被打乱了，但陈云至少争得了一段喘息时间。

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证明，一旦掀起一个“高潮”，那就

---

①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第315—316页。——译者注

② 《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规定》，《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第308页。——译者注

无法加以控制了。就连毛也无力节制下级干部，正如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担心被称为右倾。在六中全会上毛曾说，如果要在1956年达到80%的半社会主义集体化，那就是"左"倾；实际上到1956年底实现了80%以上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化。不论毛在私下对北京的作法如何不满，在公开场合他还得鼓掌称赞。在这两件事上，唯一可能的不同作法是刹车，就象一年前邓子恢在合作化问题上所做的那样。然而对毛来说，这种作法是不能接受的。同年晚些时候，他在生产高潮方面面临着同样的进退两难的局面。

第 二 章

发动第一次“跃进”

毛泽东曾经宁愿采取审慎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但他很快基本上看准，赢得这场决战已经胜利在握了。1955年12月27日，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上签了名，当时他已准备告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已再也不成问题了。他说：

>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①

1956年1月25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再有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译者注

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他反复谈论自己的胜利："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①

社会主义化问题的解决似乎卸下了毛心里的一个很大的包袱。政权的巩固已经有了保证。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一项更艰巨、更长期的任务上来，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国家。显然这是一个萦绕于他心头的任务，因为他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②，而生产力的解放必须带来生产的提高，以证明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毛把生产问题作为注意的中心。他认为，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重大发展：

> "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③

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简短而又适度，但他的《序言》则是在经济上打冲锋即后来被称之为1956年"跃进"的第一声进军号。他在《序言》中号召批判那些对生产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的人。他说：

>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即各个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作者注〕，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原注

② 同上。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译者注

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这个《序言》发表两天后，周恩来在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报告时讲道，党中央已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②毛此时所担心的右倾保守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清楚论述的，是表现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与后来出现的内容迥异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

第一节 《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1月，毛在天津同中共的15个省的省委书记，就他本人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十一条”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224页。——译者注

②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译者注

“十一条”变成了“十七条”。1956年1月，毛又在北京与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进行了磋商，并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这就是《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这个草案随后被提交给各方面的专家和各民主党派的人士讨论，参加者共有1000多人。在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得到采纳。之后，这个纲要草案的修正稿于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并公开提交1月2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就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① 《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对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造。这个“四十条”的纲要包括了从通讯到水利建设等有关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为明确的指标是，要求在12年内使粮食和棉花产量有一个惊人的增加：按照各地情况，粮食增加100%到140%，棉花增加71%到185%。有关这个纲要草案的意见将于1956年4月1日以前收集起来，提交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然后再作为向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建议。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这个雄心勃勃的规划的起草者——毛泽东以及各省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的日常事务是从事人的管理，而不是农业经济。他们面对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许对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有点过分乐观，特别是还有12年这样一个期限。等到1月份把各方面的专家召集来进行讨论时，要想进行较大幅度降低指标的修改，也许由于政治上的以及官僚主义的原因，已经不可能了。

早在1955年11月，大概就在天津商定农业发展“十七条”之后，一些省已决定加速完成他们的增产指标。山西、江西、山东宣布，他们将在1956年完成1957年的指标。其他各省随之在12月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原注

份纷纷效仿。更有意思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对《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反应，该省决定到1962年，水稻亩产要达到800斤。当这个纲要公布后他们一看，原来要求浙江省到1967年才完成这个数量。浙江省的这种作法也许是为了弥补他们在1955年初所采取的"坚决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错误，尽管毛曾免除了该省省委负责人对这种保守思想的表现所应负有的责任。

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前，已经行动起来的并非只是那些在为增产而跃跃欲试的各省官员。1955年12月举行的农业科学家会议就制定了一个12年农业科学研究和害虫防治的方案；全国乡村邮电工作会议也许愿说，要如期实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大约在七年以内"做到乡乡通电话的任务，而《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要求是在7—12年的时间内来完成这一目标。很显然，在1956年1月讨论《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期间，曾对纲要作了一些修改。不过要使其切实可行，仅仅作些修改是不够的。看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讨论会的精神还没有吹到各省领导人那里。仍有不少省在新的一年宣布，他们将在1956年完成1957年的指标。广东省号召粮食增产200万吨，这就是说1956年的粮食产量要在1955年的基础上再增长18%以上，而结果只完成了这一增产指标的一半。然而，《人民日报》无视这种冒进做法，它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的社论中，仍然认为有必要对生产规划中的保守思想进行斗争。

当时，为了制止各省纷纷出笼的过激规划，周恩来在1956年1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重申，1956年的粮食、棉花增长指标分别为9%和18%——如果完成这些指标，将意味着提前一年在1956年就能轻松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他坚决驳斥了所谓这些目标太高的说法。

中央提出的增产指标对各省的影响，可以通过福建1956年的

经验略见一斑。据该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说[①]，福建省当年的粮食增产指标是16%，几乎是周所要求的增产指标的一倍。但这个指标到了乡一级时，已被提高到40%。在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发起的全国农业增产竞赛运动的鼓动下，农民们做出增产达到将近46%的保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多、快、好、省”

工业也在效仿农业战线上的冒进。195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还就落后的基本建设规划发表了一篇低调的社论[②]，一个月后，该报在评论1956年计划的准备情况时，仍然继续采取一种稳重的方针。但到了12月，在开始采取措施加速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12月25日，建工部部长[③]对新华社记者说，根据该部最近制订的计划，1956年的建筑安装工作量比原来的年度计划指标要提高26%，这意味着1956年的工作量要比1955年实际完成的增加一倍。煤炭工业部宣布，该部在1956年将完成1957年计划的96%。第一机械工业部表示，在1956年，该部的主要产品如蒸汽涡轮、发电机、机车车辆等的产量，都将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指标。诸如此类的预言也来自其他各部。铁道部部长在7月份还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原定的新建铁路计划只完成了40%，而在12月22日，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该部的五年计划指标将在1956年底以前完成。同一天，重工业部宣称，重工业生产系统1956年的总产值，可以达到1957年指标的99%左右。

---

① 参见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日。——原注

② 指《努力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译者注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5日。——译者注

在11、12月间，国家计委制订了1956年的计划，并于1956年1月后半月间进行了修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后来讲道，他的部门按照与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而“带来的新情况，重新制定了一些相适应的指标。”①这种重新制定计划的情况大概发生在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间。不过当时并没有发展到采取措施对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进行修改的地步。

如同农业战线一样，工业战线的生产者们也积极响应倡议，参加竞赛运动。各个部部决定召开先进生产者会议，以鼓励那些不那么积极和熟练的工人。毛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新口号，借以激励他们。但是李富春和计划部门似乎一直在极力将生产热潮保持在一定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来：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在全国工人中开展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一是毛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新口号过了较长时间才出现在报纸上。这两件事上的拖延，也许有计划部门的背景。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在1月13日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②。2月9日，该执委会主席团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然而，这两个决议当时并没有发表。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决议，直到1956年2月29日才由《人民日报》予以发表，自全国总工会通过后已差不多过了7个星期。而第二个决议不得不等了更长的时间才发表。3月10日，一个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筹备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并不是由全国总工会主席牵头，而是由李富春出面筹

①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译者注

② 全称为：《关于动员全国职工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译者注

备。两天后，中共中央秘密发出了一个通知①，同意2月9日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但直到3月30日，这个通知以及全国总工会的决议才由《人民日报》发表。这样，决议通过后已拖延了7个多星期。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共中央予以同意后，竟容许两个半星期之后才最后发表这个决议。

在全国总工会1月13日的决议中，毛的口号被改为“更快、更多、更好、更省”，而不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而在2月9日全国总工会的决议中，这句口号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这就表明，在那段时间的某个时候，毛的这个口号才最后确定了下来。尽管在1956年初，这个口号就已众所周知，但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后，它才被正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口号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就全国总工会1月13日的决议公布所发表的社论②并没有提到这个口号，虽然该社论中出现这个口号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口号最终以官方认可的方式出现在《人民日报》3月13日的社论中。社论说道：

> “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以后，还必须不断给他们指出方向，这样才能步调齐一，收效宏大。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总的方向。”③

看来在2月底、3月初这段时间里，中国高层领导就如何加速工业发展，以便与农业发展速度保持一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结果，计划部门同意开展全国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和全国先进生产者运动，并同意发表毛的口号。但他们已接管了先进生产

① 指《中共中央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译者注

② 《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为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2月29日。——译者注

③ 《企业领导者的迫切任务》，《人民日报》1956年3月13日。——译者注

者运动的领导权，并在制订各种加速工业发展的重要计划前，从事了广泛范围的经济调研工作。正是这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工作构成了毛 4 月底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讲话中有关经济部分的基础。不过，毛已私下讲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在50至75年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第 三 章

开始解冻

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的高速度必然会反映在生产的增长上，反映在由此而来的生产指标的全面提高上，这会使得精心起草并于近期公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显得软弱无力。毛肯定打算要通过那些正规渠道，即通过苏联建议设立的各部、委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来推进即将到来的“跃进”。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它的所有专家的才能，需要所有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它也需要象富农这样一些农村人口中的积极因素的努力，这些富农先前曾受到怀疑，但随着社会主义胜利在望，他们可以被认为已经中立化了。经济建设所引出的这两个问题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政策。这些政策也许比斯大林在同样情况下所能允许的走得还要更远一些。这要归功于毛所抱有的这样一个坚定信念，即中国各阶层的人民都可以动员起来，支持中国共产党为本国所制定的目标。

第一节　关于知识分子

在1955年12月间，各民主党派纷纷举行会议并通过决议，其主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带来了新的形势，在这一新形势下，要动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自1955年1月12日起，《人民日报》开始登载一系列由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许多党的官员并不想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他们复杂的政治问题，除了工作之外，不与他们交往，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二是必须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尤其是要提供更高的待遇和更好的设备。

所有这些问题成了一个大型会议的重要议题。这次会议于1956年1月14—20日举行，中共中央邀请了1279名党的官员参加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十分缺乏，并概括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力量所准备采取的措施。周说，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发展的需要……”①。他指出，必须纠正“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②，这些现象和情绪阻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估计，知识分子的数量为384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为10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了从科学、工程技术到文化艺术的各个领

---

①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1页。——译者注

② 同上。

域。周宣称，在知识分子中只有大约40%的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其余的还有大约40%左右一般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约占百分之十几；剩下的还有百分之几，周称之为反革命分子。周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但是：

> “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①

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力量方面的三项任务是：更好地使用他们；信任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并能参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保证给他们以更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个“适当的待遇”应包括更好的生活和福利条件，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专业分工及升级制度，以及制订学位、学衔的授予制度和发明奖励制度等。总之，周说，党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为了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干，就必须正确地对待他们。周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百分之百地与党保持一致不存幻想，但只要他们努力工作，党就准备容忍他们。

周恩来是一个最适合于说这些话的人。首先，作为政治局5人内阁的成员，他具有向那些对党的知识分子路线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党的官员有效地传达这个新政策的威望；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却不可能有周这样的权威。其次，几乎同等重要的是，周比最高领导层的其他任何一个成员都更熟悉非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主要联络官在国民党首府重庆

---

①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8页。

度过了较长的时间。周和蔼可亲，善于言辞。他在重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引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学生支持他的事业。他的功绩是相当可观的，同情共产党事业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就得归功于他的工作。由周宣布这一新政策，知识分子就更有可能对此抱有信心。

为了强调这个问题，毛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了讲话，大意是表示对新政策的支持。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①

几天之后，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中国在为结束落后状态和取得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他接着补充说，同时，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②

周恩来的讲话以实际行动被付诸实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工资增加了；政治、社会和行政性事务减少了；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安排了工作。甚至还鼓励知识分子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毛关于科学工作的指示，在这年晚些时候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以便制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12年发展规划。

第二节 农村的情况

在农村，新的自由化意味着取消对富农的压制，以便在生产运动中利用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技能。通过对一些文献的比较，我

---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原注

们可以看出对待他们的政策的变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第二章“社员”第十一条第三条款规定：

“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之内，不接受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入社。在合作社已经巩固，并且本县和本乡的劳动农民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参加了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已经依照法律改变成份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才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但在此后不到3个月发表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四条规定：

“对于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要求入社的问题，在1956年内应当开始着手解决。解决的办法是：（1）表现较好，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做为社员，并且允许他们改变成份，称为农民。（2）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作为候补社员……”②

在几个月内，对待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的闭关主义政策完全改变了。在11月份，表现最好的富农都要等到过几年之后才能加入合作社；但到了1956年的1月，只有那些表现最坏的才不能立即加入，尽管新成立的合作社很难说已经“巩固”了。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于1956年6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对富农的这种新立场得到了认可。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解释了这一

①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译者注

②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文集》第3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223页。——译者注

变化。他说，由于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已被孤立起来了，而且他们已认识到了这一点。

甚至连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都从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胜利后滋长的自满情绪中得到了好处。在1955年11月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没有提到他们入社的事，只是简单地提出不接受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入社。但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象对待富农一样，对他们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那些真正坏的、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将被逮捕法办，但其余的则可以依照其罪行的轻重，允许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入社——尽管在事实上1955年刚刚经历了自国家政权建立以来对反革命所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重要斗争。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论述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所取得的四个成果，他列举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的全面展开，并预计今后两年内反革命分子将在全国范围内肃清。①

吸收过去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入社，这在农村干部和比较好斗的农民中间并不受欢迎，他们这样批评道：

> “党的政策没有错，可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这样宽大，太便宜他们了。”
>
> “咱们打天下，他们来登殿。”
>
> “咱们辛辛苦苦由互助组办初级社，由初级社升高级社，他们却是一步登天。”②

还有的农民怕麻烦，不愿吸收这样的坏分子入社。

---

①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8页。——译者注

② 《时事手册》1956年6月第12期第33页。——原注

为了消除这种担心，宣传工作者首先强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结果，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新的形势动摇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信念。现在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就可以促使他们的阵营进一步分化。但宣传家们也强调了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的数量在经济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他们总共有4000多万人，占农村人口不到10%。显然，国家政权绝对不会允许如此大量的、可贵的劳动力被拒于合作社体制的门外。

第三节 生活变得丰富多采

新近出现的全国性宽松气氛的象征，是一个使服装更时髦、更漂亮的运动。1956年2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者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不能反映今天中国人民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漂亮的服装与资产阶级的奢侈腐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会议安排，将在3月中旬举办一个服装式样展览会，但后来由于参展者太多，展览只得延期到3月底才开幕。5月，刘少奇对广播事业局发出指示，要求"广播应该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和需要……例如，北京有许多人很关心时装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应该抓住诸如此类的问题……。"①这年晚些时候，一位西方作家②访问中国时证明了这一新政策的影响。他在参加一个舞会时，看到女孩子们穿着印花的衬衫，甚至还有一些人穿起了旗袍，旗袍的开叉竟开到了膝盖上方一英寸的地方。

---

① 《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第4期。——原注

② 指迈克尔·克罗夫特。——原注

第四章

苏共二十大与中国的反应

1956年1月底，中共开始推行内部解冻的政策。这一解冻的基础是领导层对政权业已巩固的信心和对加速发展生产力所带来的需求的分析。这一新基调的特殊受益者包括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富农甚至反革命。但是，或许中国人民做为一个整体在经历了前6年的斯巴达式的清苦之后，都欢迎这一新气氛。在民族和谐与自我满足的平静池塘中，尼基塔·赫鲁晓夫扔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谴责。若干年后，中国人这样说道："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7年多以前就开始。具体地说，这是从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①

①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原注

第一节 朱德在苏联

1956年1年27日和28日，可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苏共告诉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领导人最近作出决定直接批评斯大林。这些代表不包括中国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主要代表——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和党的秘书长邓小平，他们当时还未抵达莫斯科。但即使中国领导人在场，他们也不会被告知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上会走多远，因为作"秘密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始后作出的，或许是在2月25日清晨作报告前不到24小时。

朱德元帅于2月15日向大会提交了中国的贺词，在此之前，他已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报告客客气气地把斯大林抛在一边。然而他还没有听到米高扬2月16日对个人崇拜远为激烈得多的抨击，而"秘密报告"更是10天以后的事。在"秘密报告"发表前的某个阶段，与会代表得到列宁于1922年12月写的"遗嘱"的全文，其中一些内容严厉批评了斯大林。还有他1923年1月写的补充，提议解除斯大林党的总书记的职务。① 如果散发这一文件是在朱元帅发言之前，而且他了解这些情况，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发言中没有提及斯大林，而中共2月9日的贺词却提到了斯大林。贺词可能是根据苏共1月27日—28日会议透露的情况起草的。它强调了当前的苏联领导人同斯大林所作所为的密切关系，其目的看来是要维护这位专制者："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了由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②

---

① 《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5—618页。——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词》，《人民日报》1956年2月16日。——译者注

第二节　和平过渡与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根据中国领导人后来的说法，他们反对苏共二十大主要有两个理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当时，中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谴责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本人似乎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而不去顾及其他问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在1956年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尽管当他们于1960年首次公开谴责苏联的理论和政策时，这个问题是他们的主要关心所在。

2月19日，《人民日报》曾就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发表社论，称该报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并说：“‘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将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① 该报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社论，对赫鲁晓夫对列宁主义的这一特定修正的热情有所收敛，但仍然表示支持：

> “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就保持着’。但是决议同时指出：‘战争的注定的不可避免性是没有的’。因为‘现在有着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拥有重要的手段来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而如果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战争，这种力量就会给侵略者以歼灭性的反击，粉碎他们的冒险计划’。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局势这种深刻的分析，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巨大的鼓舞力量。”②

---

① 《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人民日报》1956年2月19日。——译者注

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56年2月28日。——译者注

1956年中国人并没有在战争不可避免问题上反对赫鲁晓夫，甚至在这之后也没有声称当时这样做过。这就表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支持核时代中和平共处的理论阐述上，意见是一致的。这符合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即强调国际形势中的关键因素是紧张局势的缓和。事后，中国人声称对和平过渡的概念——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一概念是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的新路线的必然结论——在与苏共的"内部讨论"中曾有过争论。实际上直到1957年11月，中国人才正式向苏联提出"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中国人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进行公开争论，甚至没有象对待斯大林问题那样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自1954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与它的亚洲邻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了新德里和仰光。同年晚些时候，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访问了中国。三方政府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一颗明星脱颖而出，甚至压倒了他的"引荐人"尼赫鲁。周的和解态度、外交手腕和个人的魅力征服了原来充满敌意的亚洲领导人。他的成就是与下述各国建交的关键步骤：尼泊尔（1955年）、斯里兰卡（1957年）、柬埔寨（1958年）以及中东的埃及、叙利亚和也门。

中国对中立的，甚至非中立的亚非国家的友好态度，取代了北京早期对尼赫鲁、吴努、苏加诺等人的谴责，他们过去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傀儡或走狗。如果北京当时发表声明，透露说它希望新德里、仰光、雅加达以及其他的友好政府最终将被暴力所推翻，那么这将严重损害中国这一新的姿态的可信性。中国人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重申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教益，强调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暗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后来他们声称，这恰恰是刘少奇于1956年9月在向中共八大提交的政治报

告中所试图讲明的。

第三节 中国人对斯大林的评价

作为苏共二十大的直接后果，中国人或许太沉缅于斯大林问题，而无法讨论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景这类似乎更带有学术性的问题，这是不足为怪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谴责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片混乱，使中国人面临怎样区分毛与斯大林的作用这一特殊问题。

秘书长邓小平于3月3日自莫斯科回国后，中国领导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起草了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它发表在4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以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为基础写成的。毛后来表示他完全同意这篇文章。无疑，文章的理论基础——它强调关于矛盾的理论，以便解释斯大林的错误根源——带着他的烙印。毛本人在一年之内就矛盾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①所有这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攻击撰写或反驳这篇文章的人，表明中国领导层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用一位西方评论家的话说，《人民日报》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证共产主义的婴儿不会与斯大林主义的洗澡水一道泼掉"。②文章试图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把一些成就归功于他，使他仍然能被描述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同时文章承认他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其中包括：肃反扩大化；对德国进攻苏联缺乏警惕；忽视农业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

① 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译者注

② 唐纳德·扎戈里亚：《中苏分歧，1956—1961》。——原注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错误的建议，特别是对南斯拉夫做出错误的决定等。中国人无疑希望他们两方面兼顾的公平态度能够使非斯大林化不致成为向共产主义制度发动全面进攻的基础，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文章对斯大林的错误起源的理论分析同样是为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帮助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全面看待斯大林问题，而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这点是欠缺的。文章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消除疑虑，因为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① 对共产党人来说，包括俄国人，无论他们同意中国人的分析与否，文章本身看起来像是使北京成为至少与莫斯科平起平坐的理论指导中心的首次尝试。

然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无论他们对震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波多么担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带来的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毛的地位和他们能从斯大林的错误中所吸取什么教训。为了捍卫毛，文章指出，早在1943年6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就针对领导人的问题作出过决定，它反对"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文章的含义是，毛曾领导了党内反对斯大林现在受到指控的那些罪孽的斗争，尽管文章自始至终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及毛。对中共党员来说，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可以从自己的《毛泽东选集》中知道，上述中央委员会决定是毛本人撰写的。4月5日的文章还断言，在中国，犯下把孤立中间势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斯大林主义错误的不是毛，并且几乎完全是在毛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前的时期里犯下的。中共领导人的其他严重错误也同样主要归咎于毛以前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归罪于王明，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纠正。

---

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文章不仅为毛开脱了斯大林式的错误；而且还论述了领导人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①

在讨论从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的问题时，中国人得出了普遍的和特殊的结论。他们普遍性的理论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包含矛盾的——在此情况下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个人崇拜的矛盾——任何相反的论点都是幼稚的。对毛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矛盾的可能性的理论并不是新的：他早在1937年就提出过这一观点，并在1952年再次加以论证。②但是这一论点是同斯大林及其继承人的理论相左的，当苏联人出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该论点被删除了。这一理论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人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吸取的实践教训是领导方法问题。他们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避免那种导致斯大林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就是指：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

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② 指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1952年又重新作了补充、删节和修改，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8月出版。——译者注

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①

这意味着无限循环这一程序。当一个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实行群众路线是特别必要的，因为那时：

> “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②

无疑，这正是斯大林所做的，其代价是他的无数同胞的生命。中国人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保证他们的党员坚持群众路线，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文章只是说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有关建立这些制度的思考，成了后来12个月内毛关心的主要事情，但是文章直接了当地警告说，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要反对教条主义。从实践上看，这似乎是警告人们避免仅仅反对而不去团结中间派的“左”倾思想。

对党龄较长的党员来说，4月5日的文章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危险的警告，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异的事。他们还记得1942—1944年以及1950年为了整顿作风而开展的运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们的主要表现）和官僚主义（或党的形式主义）是毛发动1942—1944年运动的讲话中所抨击的“三害”中的两害。当这些党员读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他们一定会猜想，这是不是在预报一场新的整风运动的到来。

---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译者注

②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第四节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的地位

含蓄地使毛摆脱怀疑他是另一个斯大林的情况并不难以理解。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暗示，在他看来，斯大林最大的罪过就是以个人的独裁取代党的领导，处决或囚禁了成千上万名党的忠诚干部。毛不能被指控犯有该罪。他证实自己可以与过去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共同工作。若干年后，陈毅外长称赞毛的慷慨大度，说这是他的一个最伟大的品质：

> “他之所以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领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不记前嫌。
>
> “毛泽东思想最有意义的是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但他不报复，不急于要澄清。”
>
> “毛主席是挨斗最多的人。他是受气最多、受冤枉最多的人……他曾被解除职务，留党察看，被宣布为机会主义分子，蒙受耻辱并被送到后方休养，没有人看望他，因为没有人敢接近他。当他重新掌权之后，所有的同志都与他讲和了，然而他却不让别人对他表示歉意。”①

这些话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8月和9月讲的，当时陈毅可能是在试图阻止或至少限制已经开始的对高层领导人的清洗。但既使这是他的动机，他对毛宽容旧敌的态度的描写无疑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56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张闻天那样的人，他们在30年代初都是毛的对手。李立三和王明等原中共领导人，此时仍是中央委员。

---

①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报《文革风云》，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编，1967年第4期。——译者注

斯大林和毛，他们在对待各自的同事和反对派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旧敌，这使中共20年来得以享有稳定的领导。自中共掌权以来遭到清洗的唯一一名政治局委员是高岗，他几乎无疑是个人野心的牺牲品——他试图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成为毛的高级副手。恰恰由于毛长期注意保持中国领导人的团结，这才使得我们对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意破坏这一团结做出解释变得格外重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最经常的指控是他们试图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削弱毛的地位。1956年下半年，在一次关于音乐的谈话中，他谴责了照抄外国的倾向。毛为了深入阐述它的恶劣影响而选择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他提醒听众，当党盲目照抄外国（即苏联人）的那一套时，中国革命遭受了灾难。这对他的同事是个强烈的暗示，不要照搬苏联人最近采取的政治措施(即非斯大林化)。

但是，从表面上看，1956年的春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感到除了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强烈的申辩之外，还须对毛的崇拜做更多的事情。几周之后，在“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中，毛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上。人群仍然挥动小旗，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翌年，外国访问者报道说，有充分证据表明，人们对毛的颂扬并没有减少。也许正是由于苏联破除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并未对中国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才使得一位中国工商业者做出这样的评论：“个人崇拜闹得斯大林名誉扫地。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搞崇拜呢。”这句话表明有些著名的中国人士丝毫不了解，在高层领导人中间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是否要效仿苏共的做法。

而且，毛本人感到十分安全，以致在4月6日，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的第二天，当米高扬抵达北京时，他在会谈中还批评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再次强调

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即斯大林功大于过，认为有必要对斯大林进行“具体分析”和“全面评价”。米高扬到北京是来签订新的经济援助协定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对毛产生什么约束。

第五节　十大关系

中国出现解冻最初是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的结果。但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毛被迫把党群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是到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之后，才对这个问题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以致完全摆脱了对其他问题的考虑。但是4月底和5月初，他已经在政策上提出了一套初步的建议，目的是防止斯大林的苏联的弊病——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重演。这些建议包括在两个重要的讲话之中，即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和5月2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论十大关系》是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讲话，它表明毛对经济发展和国内和谐的双重关注。前五种关系是关于加快工业建设问题，表明经济发展仍是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本书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讲话的后半部分，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证实的，表明毛开始尽力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他以后的一年半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从政策角度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毛所说的非党人士指的是那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的独立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是八个非共产党的党派，它们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资产阶级。但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后期都反对蒋介石，并于1949年与中共一起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当时作为国家的首脑机构——6位副主席中的3位是非共产党人，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的两位

也是如此。尽管这些职位并不掌握多少实权。1954年宪法通过之后，政府进行了改组，唯一的一位国家副主席是共产党人朱德；所有的副总理都是共产党人。

当时讨论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及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望，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应该消失了。如果资产阶级即将消失，代表它的政党也应该消失了。然而毛有别的想法：

>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①

毛的还是有几个政党"好"的大胆声明，由刘少奇在9月中共八大的报告中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他说：

>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②

然而，毛更关心的是实际的政治，而不是理论上的论述。他指出，民主党派的成员有时反对中共的政策，但出于爱国主义后

---

①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6页。——译者注

来又支持它们。很清楚的是，毛珍视这一“反对派”经常不断地发表的观点，尽管直到邓小平于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报告之后，人们才知道全部的原因。当时，毛仅仅说道：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很有利”。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他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时，告诫全体同志，特别是省委书记，要掌握、核查、重新制定并促进统一战线的工作。

在他讲话的这一部分，毛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新政策，即中共与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是他并非主张其他党派可以对中共领导人任意批评，正如上述引文中加了着重号的句子所表明的那样。他在讲话的其他有关部分持有同样有节制的态度。在讨论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八个关系）时，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不要将反革命分子加以处决的意见（如有必要，将来也要处决反革命分子），但他也确认劳动改造的办法一般是更可取的。在讨论是非关系（第九个关系）时，他强调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的重要性。

在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六个关系）时，毛强调说，必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依然存在，但一般来说，这不是重点。毛透露早两年已经对这个方面的工作进行过一次检查，他建议应当再来一次。这里，新的政治气候的温和特点又一次表现出来：掌权的人，这里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应该有所节制。

① 《论十大关系》。作者的引文与《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部分有较大出入。——译者注

最后，在有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第十个关系）的讨论中，毛提倡要更多地向外国学习，掌握更多的外国语言。由于当时已经从苏联和东欧吸收了不少知识，这里更实际上是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并学习西方语言。中国是“一穷”——工农业不发达——“二白”——现代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都很低。但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毛表现出中国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胜利所获得的信心。他们当时并不那么担心人民是否会因学习西方而被腐蚀，所以才制定了一条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毛所建议的这条道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苏联的信心的削弱，这是由于“秘密报告”的出笼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处理不当。

第六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周之后，毛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声明，再次阐述了他《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后半部分的看法，鼓励人们在学术领域自由发表意见。这就是他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著名的“百花”讲话。在这一讲话之前，中共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执行周恩来1月份所阐述的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学创造的作家的新政策。中共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苏联文艺政策的新动向作出反应；这是从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2月27日至3月6日）的发言中所得出的印象，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艺的副部长周扬的开幕词，它的主题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在理事会闭幕之前，刘少奇就文学创作的发展问题给周扬和一位同事①发了一条指示。刘强

① 指刘白羽。——译者注

调，中国的作家应该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似乎愿意对要求他们深入工厂和农村获得“实际的”生活经验做出慷慨大度的解释：“……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也可以。如果作者和艺术家吃不了苦，他们可以坐小汽车去，可以在车里吃住。”刘重申，中共有权对文艺采取政治上的干涉，但同时指出，以后如果政治上的干涉是正式代表党组织的批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文件。无论资格多么老，党员个人的批评意见可以受到作者或中共文艺权威的否定。① 这个指示显然给更大胆的作家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但是，在如何看待作家的政治态度问题上，刘并不比周两个月之前的讲话抱有更多的幻想，他说：“现在工人、农民、甚至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样高，而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倒反而没有积极性，……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②

三天之后，即3月8日，适逢全国现代戏剧汇演在北京刚开始不久，刘向文化部党组发出了一个关于戏剧的指示，他批准在演出戏剧和拍摄电影时更为宽容，并呼吁根据“百花齐放”的精神来发展中国的传统绘画：

> “戏改不要大改，无害的不改。有害的经过某些小改动之后也可以上演。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
>
> “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是进步的，无害的，都可进口……美国搞铁幕，我们不搞……”
>
> “国画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有些国画家却没有得到很好安置……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些东西不能因为是旧的就不要。文艺改革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没有

① 《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4—185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4—188页。——译者注

怀孕就要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①

3月14日，周扬发表了符合这一指示的讲话，他在一个文艺工作者讨论会上说，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以及苏联文化；他还赞扬了传统文化：“如果我们想让百花齐放，第一件事（紧要的事）就是保存和挖掘民族遗产”。

3月初，刘少奇和周扬使用了“百花齐放”这个词。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在政治局能有时间得以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完成全面评价之前，就计划在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自由化运动。这时的目的可能仅仅限于恢复旧的政策，因为刘使用的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毛在50年代初用以解释对戏剧的政策的。当毛在5月2日的讲话中将他的口号改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中国领导层更为关心的是在苏联搞非斯大林化的形势下，如何在知识界制订自己的自由化政策。刘少奇用下述的话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描述了这一口号的演变：

> “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争鸣的口号首先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后来，毛主席对它作了改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有许多事情都不是毛主席想出来的。毛主席不过是加以总结提高”。②

毛自己也承认“百家争鸣”思想是古时就有的，但刘的说法又一次表明了想削弱毛的作用的意图。

据刘说，“百家争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

① 《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9—193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作者引自《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10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义并避免使我们局限于一家之言”。在党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5月26日对学者、作者和专业人员公开阐述这一新政策时，主题无疑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由于毛早些时候的讲话①没有公诸于众——“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出现任何文本——陆定一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就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获得更大自由的唯一指南。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指控与此相反，但陆定一的讲话可能直接体现了毛的思想。（见附录1）

陆定一解释说，“百花齐放”适用于作家和艺术家，而“百家争鸣”则适用于科学家。他阐述制定这一政策的理由说，国家要想繁荣和强大起来，那就需要有繁荣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而要使这些领域得到繁荣，就需要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将有助于独立思考、开展辩论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在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和科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但是：

> “共产党人主张必须把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对反革命，应该镇压，应该打倒。对人民内部的唯心主义的落后思想，应该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尖锐的，但这个斗争是从团结出发的，是为了克服落后，加强团结。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②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政策？陆定一没有提到苏共二十

---

① 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译者注

②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译者注

大，但他说有4个因素：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几年之内，一切剥削阶级都将被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变化——这里，陆的提法是以周恩来1月的报告[1]为依据的；尽管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但国内阶级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这是一条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上加强团结的政策。陆定一还详细引用毛发起1942—1944年整风运动的讲话说，一些共产党人在如何促进团结、避免"宗派主义"或歧视非党人士方面有许多东西要学。作为党员的指导方针，他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给生物科学或其他科学理论贴上"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标签是错误的。至于文学艺术，党只要求它们为工农兵服务，其中包括为知识分子服务；在题材问题上不施加任何限制：

> "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造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至于艺术特征问题，典型创造问题等，应该由文艺工作者自由

[1] 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译者注

讨论，可以容许各种不同的见解，并在自由讨论中逐渐达到一致”。①

陆对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敏感领域的态度较为模糊；他只能警告党员不要垄断这些领域，并说中央不会颁发一部正式的党史教科书。宣布下面一条消息是为了帮助克服现代史研究中令人不满意的状态：

> “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写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②

这里无疑是对苏共二十大作出的直接反应，因为甚至在二十大的公开会议上也曾有人对斯大林的历史学进行了抨击。

最后，陆谈到了批评和学习的问题。他举出毛在1942—1944年整风运动中所作的三次最重要的讲话③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典范，要求既反对过火的批评，同时也反对不痛不痒的批评。在学习问题上，教条主义显然是主要危险，这里，陆推荐大家学习毛的这三篇讲话以及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文章将使人们了解教条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所在。陆指出，中国共产党有

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原注

许多理由悲叹教条主义的危害：

> "但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几乎断送了我国的革命，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这个痛苦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①

在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是怎样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与他们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在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或顺从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人进行领导时，中共几乎被消灭，这些人在与毛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时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方式。其结果，正如陆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是一场灾难。在牢记斯大林主义（或教条主义）对他们的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时，中国领导人一定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管理中，斯大林主义同样有害。当毛在30年代末期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时，他用整风运动清除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面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管他多么不喜欢这一报告被公布的方式——毛一定在开始设想，在管理一个共产党国家时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消除斯大林主义。

陆定一的讲话，除了一般性的温和和通情达理的基调外，引人注目的另一点是反复提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有这一特点。但在那篇文章中，仅仅提到整风运动所抨击的"三害"中的两害——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而在陆定一的讲话中，除了对教条主义继续进行抨击外，第三害，即宗派主义，也受到了谴责。

陆定一讲话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通知，规定要学习陆定一提出的5个文件：毛的三篇整风讲话、《关于若干

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译者注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4月5日评价斯大林的文章①。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员，中高级党校的学员和大专院校毕业班的学生都要学习。通知明确宣布，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和国家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这样，到1956年年中，毛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两项重要的政策性建议，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党开始掀起了一场学习整风文件的运动——这些文件可能已被毛视为在未来某个时期开展一场新的整风运动的基础。

---

①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第 五 章

毛与计划部门之争

1956年4月底，经济问题仍然是毛主席关心的问题。十大关系中的前五大关系都涉及到经济，这绝非偶然。讲话前所进行的协商表明，毛最初只想谈经济问题。毛在讲话中透露，政治局曾用了两个月时间来听取34个中央部门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之后，这些报告的内容被归纳为十大关系。但是，除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很难相信这些财经工作报告对讲话的第二部分产生了多少影响。很有可能，后五大关系是毛在与他的同事协商之后自己提出来的，因为那时毛正在考虑针对苏共二十大应该采取什么步骤，然后才把这后五大关系附加到讲话中来。而那篇讲话最初只是想给工业制定一个文件，作为《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那样的对应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十大关系读起来不如毛1957年2月发表的有关矛盾问题的讲话[①]连贯。有关矛盾问题的那篇讲话也是全面考察国家

① 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译者注

事务的一篇讲话，不过它是又经过10个月的思考之后才产生的。

毛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其经济部分的主要内容表露出——如果考虑到讲话的起因——他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大概对经济计划部门所遵循的某些重要政策感到不满。在这不满的后面，潜伏着对工业发展步伐缓慢所怀有的不耐烦。经济计划部门未能根据工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胜利去提高五年计划的指标，这使毛和刘感到不满意。在讲话中，毛试图寻找各种办法加快工业的发展。讲话表明，在4月底，生产运动仍在持续进行，但毛还是感到可以向计划部门施加些压力。

5月12日，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其任务是制订年度计划。据说这是以苏联的机构——国家经济委员会为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的这一机构于一年以前成立，正是为了削弱苏联长期计划部门的权力。如果中国的国家经委纯粹是出于计划的原因而建立的，那么它应该在它的苏联相应机构成立后不久即建立起来。但是在1955年5月，中国人也许认为没有必要设立两个计划机构。一年以后，由于长期计划部门表现得不那么灵活，所以毛可能才愿意效仿苏联把计划部门分为两摊。很有可能毛希望在两方面绕过国家计委：各种远景规划，如《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制订出大目标；国家经委则制订试图达到这些目标的年度高指标，这样五年计划的中期目标就可以被绕过去了。

如果这是毛的意图的话，国家经委第一任主任的人选却是不幸的选择。薄一波与刘少奇交往甚久，刘可能把薄作为他可以施加影响并赞成加速经济发展的很少的几位高级经济官员之一加以推荐。后来，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据说薄的确认为提倡全面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1956年，薄仍可以被算做是中国领导层里更加谨慎的成员，他长期管理经济事务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他在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揭露了因生产运动引起的基本建设中的问题，而且他批评了冒险主义。这时，

计划官员似乎保持了团结，他们虽然不能抵制毛的所有要求，但却成功地保持了对工业局势的控制。

把《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前半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准备与《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过程加以比较是值得的。后者是由毛和省级的官员提出来的，专家们似乎只是在后期才参加了决策过程。在十大关系问题上，尽管省级的官员也有发言权，但政治局作为一个集体，在与中央各经济部门的讨论的基础上，抛出了经济建议。《论十大关系》报告远不如《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那么具体；从整体上说，它所涉及的是原则问题，没有具体规定明确的指标。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是毛意识到他对工业的了解比对农业要少得多；他还可能具有一种未被摒弃的信念，即他不得不在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内进行工作，直到1958年的大跃进为止。

第一节　困难重重的生产运动

毛对工业的指示比对农业的较一般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生产运动开始时制订的，不久它就开始碰到困难；事实上正是这一纲要的制订使得人们头脑发热，从而造成后来出现的许多困难。但当毛开始就工业颁发指示时，生产运动已开始了4个月，难题很明显，所以他不可能制订一个过分乐观的、规定了具体的高指标的工业发展纲要。这些问题据说已在各经济部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作了说明，而且许多问题还在报界提了出来。

早在3月13日，《人民日报》就以《企业领导者的迫切任务》为题发表社论，谈到生产单位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原材料的供应和半成品之间的混乱状态、计划失误、产品质量低、原材料积压等问题。报纸敦促管理人员把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这样

的方面，即“使它巩固地、持久地向前发展，而不是像一阵风似地刮过去。”3天之后，报纸批评负责轻工业的官员和管理人员一味追求增加产量，而忽视产品质量和品种的多样化。3月18日，报纸的社论敦促工业官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为更多地生产产品而形式主义地发号施令。

农业方面的局势似乎更加严重，因为在制订《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已经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如上所述，纲要草案规定，4月1日以前必须将对它的意见收集起来，以便提交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进行讨论。显然，收集起来的意见表明纲要好象是一支兴奋剂，因此4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发表一个《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因对《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抱有错误认识而引起的铺张浪费、滥用民力问题，同时还要解决那种认为该纲要可以在两三年内一蹴而就的错觉。指示指出，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忙于盖俱乐部、修办公室、购置大量的和贵重的文化娱乐用品时，对这种浪费情况还不很在意，当秋后算帐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反而由于这些投资而有所减少时，他们就会极其不满，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低落。指示除了全面谴责在文化和福利设施上滥用劳力和资金外，还批评了忽视副业生产和制订不现实的生产指标等现象。4月6日，《人民日报》就这一指示所发表的社论指出：

> “近几个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巨大的成绩。可是，一定要防止并且反对滥用和歪曲这个口号〔即反对保守主义——作者注〕，防止和反对把它变成强迫命令的工具，变成某些个人主义者出风头的手段。”①

① 《永远要勤俭》，《人民日报》1956年4月6日社论。——译者注

对歪曲反对保守主义口号的人进行批评，是一条新的批评路线。迄今为止，对在生产当中过分挥霍和浪费负有责任的官员——例如忽视质量和品种的管理人员——居然被指控为保守主义者！显然，犯了错误的官员并没有被这一无法令人信服的指控所吓住，因此必须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来对他们施加影响。

尽管农村存在这些困难，毛却不准备搁置《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4月底、5月初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会议上，刘也称这一纲要是“伟大的”，甚至思想保守的邓子恢也被迫对纲要说了几句好话。

陈云认为，仅仅制订经济指标而不考虑具体的财政后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后来财政部长李先念首先批评了操之过急的做法，这是耐人寻味的。

这个批评是6月中旬才提出的。就在4月下旬，根据报告和讨论，毛仍然感到能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并就怎样加速工业发展提出建议。这十大关系讲话的经济部分，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投资政策。在李富春对五年计划做了冗长阐述和费力的辩护之后的10个月时间内，毛就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即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和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的投资分配问题上，把李富春的论点抛到了一边。毛主张对轻工业和沿海工业中心地区给以更多的投资，因为这样受益可能更快。他还要求把资金从国防转向经济发展，尽管李富春可能也欢迎这一点。在向高产的工人提供奖励问题上，毛主张给他们以较高的工资。

第二节　重工业与轻工业

在关于五年计划讲话中，李富春提出，88.8%的工业投资应分配给重工业，仅11.2%的投资分配给消费工业，理由是重工业

的基础特别薄弱，另外他也认为轻工业仍有相当多的未利用的生产能力。他认为轻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增长，而不是投资。因为原材料的短缺是轻工业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如果农业丰收，能向现有的企业提供超过它所能使用的原材料，那就可以考虑更大规模地扩建轻工业。值得指出的是，李富春的报告据说是在征询了苏联经济顾问后起草的，而几个月之前，马林科夫被解职了，他的错误之一就是强调轻工业而牺牲重工业。

毛以安抚的语调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它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①

他说，虽然我们的生活品并不充裕，但它们的供应也不短缺。但是，他继续说，有必要比现在更加注意并且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会导致破坏重工业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他认为，如果真想发展重工业，就应该对轻工业和农业多投一些资，因为这样比先在重工业上投资能更多更快地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因为〕使得生活品更多些，〔资金〕积累就会更多些。”②毛没有论及李富春关于轻工业更多地依赖于农业的收成而不是投资以及存在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的论点。他可能设想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必将保证农业的丰收，他无疑受到1955年的好收成

---

①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② 同上第269页。

的鼓舞。

没有迹象表明毛关于给轻工业和农业以更多投资的呼吁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毛的话无疑代表着对正统的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首次有份量的抨击，而中国的计划部门一直是把这一模式当作自己的模式的。这样一来，至少会引起混乱，尽管毛将苏联模式完全束之高阁是18个月以后的事，即大跃进时期。无论怎样，毛在1956年夏天显然占了上风，至少部分占了上风，因为李富春6月1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将从原来的1∶8改为1∶7。

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明，他对五年计划中的这一改动并不十分高兴。在对当前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作完报告之后，他转而在三个问题上讨论并发表了“个人的看法”，而一开始所谈的就是轻工业与重工业的问题。首先，他同意毛的观点：有必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轻工业的确是见效快，他甚至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但是随后，他回到一年前关于原料的极端重要性的问题上，并举出统计数字说明农业收成怎样在过去决定了轻工业的增长率。在这样论证了五年计划原来的比例之后，他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解决了、农业生产稳步而又加快发展的基础上，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就可能而且需要更快一些。然后他从个人看法转向官方口吻，宣布“国家准备”在本年度和下个年度，“在轻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同时扩大的情况下”改变投资比例。然而，他却没有同意农业需要更多的投资的观点。

李富春的让步似乎难以说服他那些接受了苏联正统思想的下级，他们无法轻易接受在轻工业上增加投资的想法。《人民日报》3周以后对这一新政策做了解释，它说：

“有人问，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我国目前轻工业产值仍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更多地增加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使它迅速

占优势，反而要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8：1改变为7：1呢？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和符合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的呢？”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社论接着提出了毛的答案：有必要提高生活水平；轻工业投资能收回更多资金，投资于重工业。

第三节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

毛所讲的第二大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是与第一大关系相联系的。在1955年五年计划的讲话中，李富春认为地理上旧有的工业布局是极其不合理的，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70%以上来自沿海地区的省份。他宣称，必须根据原材料、燃料和消费地区的分布，按照加强国防和落后地区的需要，使工业遍布全国各地。

在这个问题上，毛又一次以安抚的语调说，我们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②。虽然毛并不想大力转向沿海工业，但他建议新建的重工业项目10%应该设在沿海地区。他认为，更多地发展沿海工业实际上可以帮助内地工业更快地发展，这正如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可以帮助重工业更快地发展一样。这与他的前一大关系也有关联，因为沿海工厂很多，都是轻工业工厂，而为内地设计的新的大型工厂主要是重工业工厂。毛强调，有必要利用沿海积累起来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利用工商业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企业最

① 《为什么要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原注

②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译者注

近刚被改造成公私合营的企业。

李富春6月1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个人观点时的第二点就是工业布局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要尖锐得多。首先，他纠正了毛的地理概念，并修改了他的统计数字。毛的“沿海”概念包括10个省和2个市；而李说包括7个省和3个市。毛说全国重工业有70%设在沿海一带；李对此没有直接反驳，但指出80%的钢铁工业是在沿海地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赌气而斗嘴。李指的沿海地区要比毛所说的范围小，但它所包括的关键性的重工业比毛所指出的要多，强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五年计划中的两个重要的重工业项目，就是在武汉和包头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

随后，李富春指出，毛想要的东西已经包括在五年计划之中了。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五年计划的报告以表明，该计划所规定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他还引用了五年计划着重指出的一点：要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①

接着，李转向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建设问题。在生产方面，他首先指出，内地的生产相对来说发展得较快些，因为内地的起点较低。他承认沿海工业的全部潜在能力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但是他把近几年那里发展缓慢归咎于1953—1954年的农业歉收，这特别严重地影响了沿海的轻工业；他还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朝鲜停战后军需性质的加工订货减少；还有在五年计划以前的几年里，沿海地区的发展存在着某些盲目性。但今后，当内地继续进行新的轻工业建设时，沿海工业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

---

① 《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译者注

在基本建设方面，李强调了改建沿海工业的可能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之下，他还列举了一些扩建的例子。但他根本不提建设新厂的必要性，更不提毛所呼吁的建设新的重工业项目的问题。似乎改建（李的意见）和新建（毛的意见，他还提改建）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看法，而扩建（毛提到了，但次于新建）则是妥协的办法。

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不肯让步。所以7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激烈地批评了计划部门，但该报之所以大动肝火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毛不得不在实质性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列举统计数字说明上海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很低（李富春已经承认这个事实）之后，该报暗示，毛对李引用五年计划报告上的话以证实计划部门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一点不以为然：

> "所以发生上述缺点〔即忽视沿海工业——作者注〕，正如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此会刚刚结束——作者注〕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客观的原因很多，而且还有主观的原因，那就是对于沿海工业重视不够。过去订计划的时候对于如何发展沿海的工业没有提出积极的措施，或者有些措施也不全面。"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事实上李承认有些"主观"错误，但并不是像社论所暗示的那样。他曾说：

> "过去由于对充分、合理地利用沿海原有的工业基础这点认识不足，顾虑较多，同内地建设的结合不够，因之就还没有更积极地去加以规划和利用。"②（着重号为作者所

① 《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人民日报》1956年7月8日。——原注

② 《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译者注

加）

李富春的观点是，计划部门在对沿海工业的态度上是十分积极的，尽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他不承认五年计划报告的原文有什么错误，他引用了其中的论述着重为它辩护；当他谈及计划时，他使用“规划”这个词，而不用“计划”（这是“五年计划”中使用的计划一词），他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计划，而不是特指“五年计划”。

然而，如果说计划部门未能推卸掉对发展沿海工业支持不力的责任，他们似乎成功地坚持反对在沿海地区建设新的项目。社论的题目——“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揭示了问题所在。下面的叙述反复声明，起草挖掘潜力规划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基础。”（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社论继续说：

> “如果某些企业只要稍加扩建或增添部分设备，就能增加大量产品或增加迫切需要的品种，那么，在力求供销平衡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进行扩建。”①

这也就是说，即使是扩建项目也要有严格的保障措施，新的建设项目显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第四节 工 资

毛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关系，强调轻工业和沿海地区（轻工业主要分布在这里），目的是使消费者受益。他的第四个论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毛主张提高产业

① 《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人民日报》社论，1956年7月8日。——原注

工人的工资：

> “最近，我们跟各省的同志谈〔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谈得较多。他们谈到工人，〔并说〕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①

讲到农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提出不要让集体过多地积累资金。此外国家从农业收取的积累应该通过税收政策，而不是通过消费品的价格来实现，也就是说，他赞成采取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消费品应该以低利出售给农民。

对此，李富春在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作出了答复——这是他三条个人看法中的第三条——这位计划首脑似乎主要关心的是保护他的计划委员会，使它不致承担吝啬的罪名。他指出，规定的积累比例比苏联计划中的比例要低，工资和福利设施有所改善，对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比例也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但是说了这一切之后，他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做得还不够。显然，在若干时间以前，提高工资的决定就已开始实施了，甚至是在毛作报告之前。他的讲话可能推动提高了增加工资的幅度。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劳动部长马文瑞宣布，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4.5%。除增加工资外，北京鼓励地方政府和工厂的管理人员更多地关心工人的福利，特别是集中精力缓解住房紧缺的状况。6月28日，波兰城市波兹南爆发了骚乱，工人抗议他们贫困的经济条件，与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件事一定使毛相信，他在这方面遵循的政策是正确的。7月12日，《人民日报》

---

①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275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发表社论，①一方面赞同波兰官方的分析报道，把骚乱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另一方面也吸取教训，说干部必须经常密切注意群众的困难。

第五节　给地方更多的权力

毛的第五个经济论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大力主张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

>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②

毛对围着文牍团团转的中央官僚主义的抨击在讲话的第二部分讨论矛盾问题时，变得更为强烈。他要求将党政机关裁减2/3。③这一要求放权的呼吁在中共八大上得到重申，刘少奇强调了这一作法的重要性。据周恩来透露，在毛发表讲话之后，国务院于5月到8月就此问题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但是，显然直到1957年底才真正作出放权的努力。

---

① 指《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译者注

②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277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③ 同上，第280页。

第六节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毛在他的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仅在一个问题上与计划部门观点一致。他建议削减军费开支以增加经济建设的资金。为了安抚军方，他提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造出核武器：

> "你真想要原子弹吗？〔如果你想要〕，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如果你假想要原子弹，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①

虽然毛没有详细阐述这个问题，但他的观点可能是说核武器的计划只能建立在一个更加发达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

这段话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表明当时毛已经决定中国应该拥有核武器——而且中国人将不得不自己制造这些武器。但直到1958年5月，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才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将计划制造核武器。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在一篇文章中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中国人透露，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中苏发生了论战，他们于1957年10月15日与苏联人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包括莫斯科给他们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

生产核武器的决定很可能是在相当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出的。

可以推测，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彭德怀的回国，引起了中国就应该怎样更好地准备应付未来战争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打败了国民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机动性很强，组织灵活，士气高昂。但是它缺乏现代军队的特种武器装备和集中的指挥结构。在初期的伟大胜利

---

①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因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而遭受惨重死亡。从1951年年中起，苏联人开始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炮兵和空军装备，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开始实现系统的现代化。战后，彭继续了这一进程。不过，如果他曾提出中国应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要依靠苏联的核保护的建议，那么显然是在毛发表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前，这条建议就已被否决了。

毛主张中国发展核武器，很可能并非因为他不信任苏联人，而是因为他感到，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拥有核武器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从更直观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认为核武器比用一系列现代常规武器武装军队来保卫中国更省钱。无疑，1956年春，北京有过一次对国防预算规模的辩论。这与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而且1956年初的几个月，这种估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5年夏，中国领导人曾认为，外部局势所构成的威胁，足以使增加国防预算成为合理的事情。可以推测，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包括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署的关于台湾防务条约。1955年，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军队将在台湾海峡运用战术核武器，并增援金门和马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事态的发展是对前不久中国的军事行动和宣传作出的反应（这些事件导致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到1955年中，中国人有充分理由感到他们的军事地位已经下降，因而需要加强。

在1955年7月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①，财政部长李先念宣布，在1955年的预算中将大幅度增加国防费用，理由是帝国主义者包围着中国，侵占着台湾，并用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威胁中国。三位军方的高级发言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强烈支持这一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国防部长彭德怀7月16日说：

① 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译者注

“我国人民和政府，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和保障世界和平，曾经作了而且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美国侵略集团还在千方百计地阻挠着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计划威胁着我们。战争叫嚣者们正在以原子武器威胁着全人类，企图藉此来达到他们奴役全世界的目的……我们绝不能牺牲我国的领土和主权来换取和平。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坚决地迅速地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从各方面加强我国的国防。”①

刘伯承元帅在他7月21日发言时对世界局势作了同样的描述，他总结说：

“我们尤应提高警惕，在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增强保卫社会主义的国防力量，以保卫我国独立和世界和平。”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无论彭德怀还是刘伯承，都没有提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然而，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7月18日至23日开会期间，四国（美、苏、英、法）首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了。这引出了关于在东西方关系中实行缓和的“日内瓦精神”的纷纷议论。叶剑英元帅在7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没有提及四国首脑会议，但承认国际局势“向和平方向发展”。然后，他列举了美国侵略行径和侵略野心的一个长长的清单，以抵消他所作的有关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7月17日。——译者注

②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7月22日。——译者注

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勉强认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为着保卫祖国与人民的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我国领土台湾，并准备应付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继续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①

周恩来总理于7月30日发表讲话，他没有像叶元帅那样对日内瓦会议避口不谈，断言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和缓。”但是即使是他也表达了焦虑的心情，害怕由军事基地和各种军事联盟所包围起来的中国有可能面临突然袭击，他总结说：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必须增强我国的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并且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有所帮助。”②

周恩来和李先念这些政府官员，一致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威胁。在增加了国防预算开支之后，可以设想军事领导人该满足了，其实并不尽然。叶剑英元帅严厉地批评“有些人”，他们“认为现在只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国防建设可以不必那样重视了。”③叶元帅认为，这些人不懂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购置最现代化的设备以抵御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者是多么重要。刘伯承元帅显然同意他的观点。刘把工业化和国防放在

---

①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8日。——译者注

②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55年7月31日。——译者注

③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8日。——译者注

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有了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了物质基础；有了现代化的国防，国家工业化才有了保障。"①彭德怀元帅引用了国家宪法来支持他关于建设更强大国防的呼吁：

"我国的武装力量目前不但担负着巨大的保卫祖国的任务，而且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了担负起全国人民所赋予的为宪法所规定的这种神圣任务，我们必须迅速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彭德怀使用"不断"一词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即为什么在刚刚宣布军费增加之后，军方发言人还认为有必要如此强烈地强调增加国防费用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李先念的预算只管一年。如果武装力量要"不断"得到加强，那就必须在五年计划中做出充分安排。读一下1955年李富春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就可以看到，他对军费开支的关心比军方所希望的要少得多。在论证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时，李说：

"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③

这段话突出的一点是，虽然李富春同意存在一种带有敌意的

①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7月22日。——译者注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7月17日。——译者注

③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译者注

外部环境，但是他却没有象其他发言人那样以此作为增加国防开支的理由，而增加国防开支无疑意味着要从五年计划的投资项目中转移资金。他的确没有涉及国防开支问题，虽然后来披露，国防开支加上行政费用共占五年计划时期全部国家开支的32%。讲话结束时，李富春只是赞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当他提到存在着颠覆的危险和战争威胁时，却仅仅呼吁大家提高警惕，并没有利用这种危险要求增加国防开支，因为这笔额外的开支是可用于经济建设的。

可以设想，李富春在他的资深同事中，一定拥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由他将五年计划提交讨论。不管毛和周恩来原来的观点如何，在1956年的最初几个月，他们显然是支持李富春的。当周恩来1956年1月30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①作政治报告时，中美两国已经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的谈判。到那时为止，并没有使用过多地改变对美国的看法：认为美国侵略者无法阻止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但他们并不甘心。美国人抱着他们的"实力"政策不放，正在加紧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美国"战争冒险"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但在私下，毛对于美国对和平的兴趣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最近的裁军。可能正是中国领导人私下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才能解释为什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与过去截然不同，尽管他的分析与他6个月之前讲的话完全一样：

"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壮大我们的力量，在这里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早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②（着重号为作

①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译者注

②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译者注

者所加）

在1955年7月30日，周还是仅仅从国防的角度来讲话，而现在他从国家自身的实力这一更广阔的范围谈论国防，强调经济实力的至关重要性。这也符合3个月之后毛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所讲的精神。

毛讲话2个月之后，周向195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描绘了一幅比较乐观的关于国际局势的画面。尽管他说美国"还在远东用威胁的办法制造紧张局势"。但他却没有利用这一点为增加国防开支寻找论据，而只是十分温和地说：

> "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如果美国有些人竟然认为它还可以在远东发动一次突然事变，那么，可以断言，这决不会替它带来任何好处。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战胜从任何方面来的武装干涉。"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周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他的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法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②的强调，他在同一天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过去一年国防的开支仅占预算数的90.36%。虽然这一事实使这位将军支持在1956年的预算中削减国防开支5.2%③，但是重要的是，他是唯一公开支持削减国防开支的高级军事发言人。这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三位元帅④发言支持增加

①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6月29日。——译者注

② 指甘泗淇。——译者注

③ 原文有出入，甘泗淇在发言中说："比上年国防费决算数减少5.52%"。《人民日报》1956年6月30日。——译者注

④ 指：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原注

国防开支。

显然，到1956年年中，也许到毛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已就削减国防开支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由于需要挤出更多的资金以促进经济更为迅速地发展，毛和周决定国防可以放在后面考虑。关于国防部长彭德怀所持的不同意见，我们将在讨论中共八大时再作说明。

第七节 毛畅游长江

对毛来说，1956年的前5个月充满了紧张的政治活动。现在他要通过紧张的体力活动来放松一下了。1956年5、6月份，他不顾同事们的反对，三次畅游长江。那时他已62岁，还作诗纪念他的这一成绩：

“才饮长江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诗的第二部分表明，在5月，毛仍然对经济建设事业抱有充足的信心，特别是当他想到将于次年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以及长江流域防洪的前景时，更是豪情满怀。

诗的第二部分是：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①

① 《水调歌头·游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毛主席诗词讲解》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156页。——译者注

第 六 章

解冻的扩大

第一节 放宽新闻限制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作了一系列的讲话和指示，支持毛泽东发起的自由化运动。这些讲话和指示，像毛的两次讲话一样，多数都是在内部进行的。

在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措施中，最重要的可能要算放宽新闻限制了。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讲，可能反映了对苏联影响的解脱，而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带来的结果。在这年的夏天，主持起草1956年4月5日评价斯大林功过文章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其住所召集了一个新闻界负责人会议，会上胡乔木批评了塔斯社。他说：“〔事实表明〕塔斯社的新闻是简单化的、僵化的，并且令人厌烦。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①

① 作者原引自《新闻战线》，1967年5月13日第4期。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而刘少奇在5月28日和6月19日对新华社的两次指示，则为这一新闻自由化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刘认为，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促成一种普遍缓和的政治气氛。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应该使新闻界较少地代表官方，鼓励客观、公正的报道方针，并学习西方新闻界的专业技巧。他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① 然而，刘也说明，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建议暂时将其保留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困难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新闻记者怎样才能摆脱因这种地位而带来的束缚。刘可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由于新闻记者觉得有责任代表国家发言，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记者在政府行政序列中地位很低，因而受到了限制，不便质询更为高级的官员和报道他们的工作。刘似乎认为，如果使记者不受行政级别限制，并给他们以高薪，可能的话，甚至可以高于毛泽东的工资；如果让新闻记者在新闻前面署上自己的姓名，让他们出名；那么，他们就能培养独立性，树立责任感，就能讲真话。

客观地报道全部真实情况，这才是刘对新华社负责人谈话的关键之点。他说：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比如说，美国政府首脑人物骂了我们，这个新闻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

①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1956年5月28日）。作者原引自《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红旗》1968年第2期第11页。——译者注

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①

这种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的关注，显然是刘提倡向非共产党新闻界学习的原因之一：

> “外国新闻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②

刘批评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不如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那样使读者感兴趣，提出要学习西方新闻报道的技巧，反对机械地照搬塔斯社的经验。在讲这番话之前，新华社的一个代表团曾去苏联学习塔斯社的报道方法。刘少奇的指示发出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57年初到了英国和法国，学习路透社和法新社的先进经验。

据吴冷西说，刘的指示“在新华社领导干部的思想上引起了空前的混乱”，他自己也感到这些话走的太远了。尽管吴是在后来的压力下作出这个用以损毁刘少奇政治声誉的评论的，但如果抛开这点不谈，吴的话也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提出的新闻政策是反对毛当时准备同意的新闻政策的。我们知道，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即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方面，一直到了1957年2月，毛还是同意刘的意见的。因为毛曾打算建议印发美国之音的广播和蒋介石的讲话。有充分证据表

---

① 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1956年5月28日）。作者引文有出人。——译者注

② 同上。

明，新华社按照毛和刘的建议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可能是谨慎地出版了一张报纸——《参考消息》。这张报纸主要依赖的消息来源是非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报道，但它的发行只限制在受信任的干部圈子里。关于另一主要的问题，即学习西方新闻报道技巧的问题，刘少奇只是把毛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号召向一切外国学习的指示加以具体的运用而已。1956年8月24日，毛也特别指出音乐工作者要研究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以发展现代的民族音乐。甚至这位吴冷西，虽然被迫给刘抹黑，但也不得不承认刘少奇的指示首先讲到了新闻工作必须在符合人民利益和马列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对刘少奇的指示，《人民日报》立即做出了反应。从7月1日起，该报由原来的4个版改为8个版，尽管当时纸张是相当短缺的。它在《致读者》中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报道生活中许多的重要的新的事物：

> "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①

《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其他新面貌是，自由讨论的空间更大了，文章也更有文彩了。其他的报纸也立即起而仿效。显然，报纸的这种版式的改变或刘少奇指示的原意，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是要"放牛鬼蛇神出笼"——即鼓励反党分子攻击共产党，这大概是指由于从那时起允许报纸有更多的自主权，结果鼓励它们在1957年初夏更自由地发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尽管这些批评是直接受到毛关于矛盾

---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社论。——译者注

问题的讲话的鼓励的。

第二节　加强法制

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削弱警察权力和加强法制的运动。如举行大赦，平反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免除犯有错误的警察头目的职务等等。在匈牙利事件时期，秘密警察甚至被私刑处死。

在中国，政府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在1956年1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由于领导人对政治形势的估计有了根本的变化而产生的结果。变化的第一个迹象是《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公布。《纲要》第5条规定，除了表现最坏的反革命分子之外，其他人都可以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天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全国政协会议①上说，这些“新的”规定是适合农村的“新的”情况的。但是他接着不无矛盾地说，这些规定也是符合“我们所一贯实行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董在讲话中强调了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要继续保持警惕性，不能因为形势缓和及实行宽大政策而有所放松。但总的来说，董的话表明，对那些真诚坦白、悔改自新的人将予以宽大处理，那怕就是罪恶严重的。董还列举了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区别对待，以便让那些自愿悔改并期望得到宽大处理的人知道他们将被宽大的程度。②紧接着的进一步放宽措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56年2月下达指示，要求所属各级检察机关对于1955年逮捕和起诉的反革命分子和案件进

---

①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译者注

② 《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文件》第71—82页。——译者注

行一次彻底复查。

可能是在决定开展这次复查时，刘少奇强调了避免错捕和遵守宪法的重要性。他说：

> “要做到不错捕，不错判，提出这个口号是必要的，……要动员大家努力去实现这个要求，……要为争取做到无错案而斗争。”
>
> “因为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办案，即使捕错了，起诉错了，也是合法的。”①

虽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两段话凑出刘讲话的全文，但看来他用以说服检察院干部的一个理由是，坚持按法律程序办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是在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前，更肯定是在充分地理解这个报告，并以它为基础制定出政策之前，不管使用了什么论点，他们已经明显地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了。

所以，中国在1956年开始的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并不是共产党世界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作反映的一个部分。从1953年开始，中国就已着手建立一个与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建立的相类似的法制体系。但这个体系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几乎被取消了。1955年底，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重建一个广泛的法制体系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条件。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可能鼓励了中国领导人这么干下去。

1956年3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董必武在会上没有发表讲话，按他所处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直接分管法律事务的老资格的政治局

① “1956年2月在高检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译者注

委员的地位，显然是应当让他作为发言人的。董之所以未讲话，可能是因为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流露出他对新政策缺乏足够的热情，或者是因为他在执行原来的旧方针路线时陷得太深了，无法恰当地阐述新政策精神。不管怎样，主要的指示是由彭真作的，陈毅也在会上作了指示。选择他们两人来作指示，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北京和上海的市长，管理着最为集中的城市资产阶级分子，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是负责揭露反革命分子和反对贪污的政法干部的主要打击目标。在大会上讲话的唯一一位高级政法官员也不是负责召开这个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或是司法部的负责人，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① 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检察院的职责包括审查公安机关的逮捕和起诉建议，对政府机构（包括公安部门）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彭真于3月6日在司法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其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比毛、刘和周恩来的分析又进了一步。毛曾宣布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对这种变化作了解释，即：在中国，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刘少奇则在更早的时候就作了同样的声明。彭真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 “今年与去年比较，阶级斗争形势不是越来越剧烈、尖锐，而是比去年好。地主富农奉公守法，资产阶级接受改造了，反革命分子也比去年老实些。……总的形势是改变了，富农解除了武装，资本家过半数都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与合作化说明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去年资产阶级是想和我们较量的，我们把他们打回去了，反革命孤立了，结果就来了个高潮，资产阶级要求改造，要求被消灭（即作为一个阶级——作者注）。……再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已经不

① 指张鼎丞。——译者注

是事实。这是指地主、富农、资本家中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不再是坚决反抗〔我们〕，而是放弃抵抗或争取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说这是越来越尖锐吗？！”①

彭真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这种强调可以说是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种反响。赫鲁晓夫曾强烈谴责了那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阶级斗争仍将很尖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斯大林制造的一个信条，其意旨就是要为社会主义胜利后发生的大量恐怖活动作辩护。但彭真坚决主张阶级斗争已经缓和这一点，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秘密报告”所引起的震动。显然彭真——大概还有他的同事们——认识到，要使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全力以赴地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法干部在一夜之间就理解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是困难的。在讲话的另一部分，彭真以嘲笑的口吻批评了那些可能反对新路线的人。他说：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变化了，减少了。……如果农民要求把反革命抓了，资本家纷纷揭发他们的亲属，你能说这样做不行吗？如果今年你仍要反对对重犯减刑，仍然要求严惩再严惩，那你的唯物主义到哪里去了？形势已经变化了，群众也要求改变政策，而你仍然坚持要照原来的办法去办，那你的唯物主义到哪里去了！……反革命不敢活动了，……自己投案了，表明他们内部瓦解了，不敢反革命了。”②

彭真又说，“资产阶级将企业交给国家，并锣鼓喧天、张灯

① 《摧旧战报》1967年5月25日。——原注

② 作者原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摧旧战报》，1967年5月27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结彩接受改造——难道你能说这一切都是假的？”① 所以彭真在这个讲话中试图传达的基本意思是和毛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意思是相同的——摆在面前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生产：“现在，群众的要求也不在这里〔即：阶级斗争〕，而是心在积肥，打井，搞生产。”②

后面这段话尤为明显地表明，中国的这场解冻是直接导源于1955年后期和1956年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尽管这种自由化后来也确实受到了东欧所发生的事件的鼓励。在政治气候发生全面变化的同时，在法律领域内实行新政策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新政策并不是在看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突然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的产物。当彭真强调法制的重要性时，就是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角度来讲的：

> “在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秩序基本上建立起来，敌人的公开反抗大多已被镇压，剩下的敌人主要是一小部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不加强法制，就很容易犯错误。”③

4月25日——这天正好是毛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对苏共二十大作出个人反应的日子，一位著名的英国律师④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饶有兴趣地了解到一部新的刑法即将完成，这将有助于建立起每个人民都须知的普遍的法律准则。还有公开的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打算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制机构。但在幕后，中国领导人似乎仍然感到要保证法制体系正常运转，关键在于

① 《满江红》1967年5月31日。——原注

② 同上。

③ 作者原引自《政法红旗》，1967年10月17日第50期。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④ 指埃尔温·琼斯。据《人民日报》1956年4月26日。——译者注

必须说服有关干部对此采取新的态度。特别是要鼓励尊重检察机关，因为对于新政策来讲，这个法律机构成功地行使职权是很关键的，用两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为法律斗士涂圣油。"

5月 30 日，当正在作汇报的一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级官员谈到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性时，刘少奇教训他说：

"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人家怕右，不敢说保护，高法院和高检院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现在就要强调质量，要依法办事，要强调办案正确，检察院要防止和纠正错误，一定要做好……现在要强调制约……要找'岔子'，从而多考虑些问题，目的是把对敌斗争搞得更正确。在防止错误、错判方面，检察机关要多做些工作。"①

一个多月以后，在一个同样的场合，刘鼓励正在汇报工作的检察院官员要敢于制止政府其他部门的错误，并就如何进行工作作了指示：

"要检察院，就是为了检察有没有搞错的，它的职能就是求得搞正确。……检察院今后的方针应该是：监督合法，提高质量，抓住重点，经得起检查。这是你们工作的重点。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看哪些方面是可能出错的和容易出错的，要特别抓紧些。……你们可以告诉各省、市，准备让民主人士检查你们的工作，还要让外国人去看。这样检查一下，查出一些问题来，党委就重视了，知道还有不少错误，就会注意把检察院搞起来。要使每个干部都知道：不能搞错是检察院的职责。……关于一般监督问题，留着它有用处，如果省人民委员会有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当然，省委是可以纠正的，但是有些也可以用检察院的方式去纠正。"②

① 《在高检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56年5月30日）。——译者注
② 《在高检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56年7月7日）。——译者注

与此同时，在6月5日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彭真曾试图向公安干部们极力地强调同样的观点。这些公安干部们大概是最不欢迎对其权力加以限制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检察机关看作是法律工作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伙伴。彭说："现在的情况下，所谓健全的法制，关键的因素在于有健全的检察机关。"① 如同刘少奇在2月的讲话一样，彭真也意识到说服政法干部尊重检察院的最好办法，就是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也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说：

"在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没有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公安机关就逮捕了人，即使这个逮捕被证明是应该的，但这样做仍然是非法的。例如，如果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就逮捕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即使他确实是一个特务，但对他的逮捕仍然是非法的。另一种情况，公安机关经检察机关批准后才逮捕人，这样，即使这种逮捕是错的，但却是合法的。"②

由于像刘少奇和彭真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坚决主张依照法律程序办事是重要的，所以，对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③ 在6月末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承认其所属部门在工作中犯了过火的错误，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当然这些领导人仍可安心地去工作，因为毛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坚持认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当时的迹象表明，检查肃反运动的工作，早在2月份就由检察院单独开展起来了。到7月份，主要的法律部门，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都相互配合行动起来了。

---

①② 作者原引自《政法红旗》1967年10月17日。未查到原件，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③ 如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原注

这种情况似将意味着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能受到更大的尊重。

第三节　对解冻的反应

尽管毛建议实行新的政策，并在幕后采取了改善国内政治气候的一系列步骤，但那些即将受益的主要集团，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反应仍很缓慢。1956年6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一个为期3天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议；同时，民主党派也召开了自己的会议，讨论他们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所发挥的作用。在统战部的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认为，互相监督应该加强，政府在发展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受到更多的检查。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会上说，长期共存的方针反映了政治上的民主，百花齐放的方针反映了意识形态上的民主。但他和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小心从事，因为共产党的官员可能会对更加尊重他们的主张感到不满。9个月以后，章伯钧对他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同事们说，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告诉他，要把长期共存方针的精神付诸实施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上，这样就可以为长期共存创造适当的条件。

但是，在1956年夏天，就是百花齐放的方针似乎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当然，在文学上还是有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年轻作家王蒙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批评一些党的中层干部玩世不恭、道德败坏和官气十足。①但是，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并没有积极地投入大鸣大放，而是小心地适应着新的政策。少数敢于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人，通常是来自作家队伍中享有声望的人。当时的气

① 指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原注

氛很轻松，一般地说，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还是增多了。出版了一些新的杂志，独立的见解也可以在讲坛上发表，文学部门还试图恢复30年代的文学繁荣气氛，并使当时那些著名作家再次拿起笔来写作。而就在一年以前，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向党要求更多的自由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不得不更多地听一听，以便确认这是否是真正和持久的解冻。

首先对新政策作出最为引人注意的反应的是各省的党组织，他们毫不含糊地按上面的命令行动起来。在9月中旬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各地纷纷报道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运动的情况，据说领导干部正在检查自身的骄傲自满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最初的报道里，没有提到宗派主义——歧视非党人士——的问题。显然，民主党派人士在扮演新角色时的小心谨慎，是有其道理的。

连这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了将近7年的人都如此犹豫，那么，大陆所发生的这种解冻不会对国民党人造成什么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政策曾通过高音喇叭向台湾作了广播。更重要的是，确信现在已牢牢控制了大陆的北京政府，还正式地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在1月份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政府一年前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并提出了在国共两党之间实行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6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进一步说：

>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

既往不咎的态度……”①

显然，结束内战，以便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新的自由化路线的一个重要的附带的动机。但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作出反应。

①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译者注

第 七 章

第一次"跃进"的夭折

第一节 反 冒 进

当毛1956年6月初回到北京时，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对他发动的自由化运动的冷淡反应，他所焦虑的是经济形势。由于形势非常严重，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高级会议，决定放慢生产运动的步子。1956年6月15日，全国人大召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就扼要地报告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农业方面，集体投资过多，因为农业合作社都期望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工业方面，为了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后果是忽视安全，工业事故率上升。重工业部管辖的8种主要产品，其中有5种的质量在1956年初期下降了。

问题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现在形势更加严重，因此，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事实已证明，单凭要稳重一点的号召来抑制那些不讲好、省的头脑发热的干部，是不可能的；而批评那些对反对保守主义

的口号加以曲解的人，其效果也显然同样不佳，因为批评的同时还允许继续坚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口号。周恩来在1月份曾宣布这个口号将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中心主题。可是，口号往往是具有生命力的。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就变成了不顾一切进行生产跃进的代名词。对那种忽视好、省的曲解这一口号的做法进行批评，并没有说服那些热衷于创造高数量和高速度的官员们。政府要想使需要刹车的想法为人们接受，就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在李先念的报告中提了出来："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①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此加以评论，以确保读者不至于忽视李先念这段话的重要性。社论说："今年预算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这个报告最值得重视的内容，就是它提出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②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社论接着指出，这个新的口号是对前6个月执行计划过程中的经验的总结，并重申了李先念讲到的问题——《人民日报》在这6个月中，在它的专栏里反复讨论过这些问题。

4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就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两方面的问题，专门进行了论述。社论指出，急躁冒进的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以后，一些高级干部为避免被指责为右倾保守而推动他们的下属大干而造成的。由于批判保守主义和《纲要》的发表，以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口号的运用，结果导致许多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片面性，认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

① 《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原注

② 《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社论。——原注

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社论的论述清楚地表明，在继续批判保守主义的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将是更重要的任务。“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将坚持下去，但是：

> “……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②

这篇重要的社论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阅通过并指示呈送毛泽东批准的。毛在送审稿上批示了一句："不看（了）。”18个月后，在训斥财政部的干部时，毛说了他不看的理由：“我为什么要看骂我的东西？”这篇社论看起来似乎是不偏不倚的，但事实上，它的真正目的是反对盲目冒进。对此，毛非常愤怒，以致于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他连财政部的文件也拒绝看了。毛还批评财政部不给政治局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讨论它的建议。但在1956年6月，毛并没有表示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这一事件的描述大都肯定这一点。《人民日报》的社论，预示着重大的政策变化，因此，可能按惯例，刘少奇的职责便是确保社论的起草人没有对最高领导层内部同意的决策作出错误的理解。在毛的眼中，真正的“罪犯”应该是那些

---

①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原注

强迫最高领导层刹车的人，而显然刘是不在其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事实依据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刘提出指控。一位“文化大革命”宣传小组的负责人①也没有用这个问题去质问刘或叫他对此作出解释。而在刘的三次检讨中，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指出这个问题。刘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也许最能说明他在是否停止1956年跃进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在这次会议上，他断然批评了那些对跃进的夭折负有责任的人，因而也就实际上完全排除了他是这些犯错误的人之一的可能性。

第二节　计划部门的胜利

我们还有更好的理由来为刘少奇开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曾承认说：“56年反冒进我负起责任，我是检讨了的。”②周的认错并不令人惊讶。作为总理，他负责全面管理国家的经济部门。在1956年间的不同场合，尤其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的主管各经济部门的副手们，明显表示了对冒进的抵制，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最有效地估计冒进带来的影响。他们中的重要人物包括：陈云，副总理，政治局5人内部圈子里的一员；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邓子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业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国家经委主任；王首道，国务院交通运输办公室主任。如果所有这些人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这种盲目跃进——有证据表明，他们都是反对的——那么毛是很难拒绝他们的意见的，即便他能得到刘的支持。此外，毛本人也不是没意识到在经济事务方

---

① 指戚本禹。——原注

② 作者原引自周恩来1967年4月6日的讲话。——译者注

面是需要现实的态度的，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生产运动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尤其是，在1月份发起生产运动后，出现了脱离实际的计划和指标。看来毛在事后采取了一些使自己免受责难的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以下这段他于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 “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我想，全党在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是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说实事求是。因为右倾保守、机会主义这个帽子难听。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就要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的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完全可行的基础之上。”①

怀疑毛在当时是否讲过这样的话，是没有根据的。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周恩来原先准备在《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向后退缩的原因。在那篇实际上是发起生产运动的著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里，毛也告诫人们“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②实际上，6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据说使毛发怒的社论，引用的正是毛的这段话，并指责搞冒进的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在于，在那篇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里，毛肯定花了大量的时间论述周总理在同一会议上讲的同一个问题，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02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译者注

散发的这篇讲话中的唯一一段，其内容却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毫无关系，而是批评那些可能犯急躁错误的党员同志的。显然，这是企图使毛从1956年的经济冒进错误中脱身，而冒进正是他的政策的直接后果，尽管他对冒进也提出过警告。与他的同事一样，毛从前几年的经验中知道，生产运动会带来冒进的严重风险。他可能打算在继续开展生产运动的局面下，对冒进采取遏制措施；这一点从4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反对让这个运动刹车。他对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为恼火，可能是他对苏联式的工业化相对无知，感到无能为力，他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虽然是以各经济部门的一系列报告为基础写成的，而这些报告肯定反映了许多工业问题，不应把毛的这个讲话仅仅看作是对财力物力进行分配的纲领性文件，而应看作是仍在试图寻找按照苏联式的框架来继续进行工业运动的办法的文件。但在6个星期之后，毛就不得不接受周恩来和计划部门提出的反冒进的要求。

第三节 《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搁浅

最后，毛不得不放弃他反对生产运动刹车的决心，这是因为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这使他很快地意识到必须刹车了。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举出了这样一个盲目冒进的例子：尽管双轮双铧犁根本不适合南方的水稻田，但是仍然规定了过高的生产指标，结果使这种犁在南方大量积压。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下达一个估计是由邓子恢办公室提出的命令："毁犁还铁。"结果有大约70万部犁被销毁了。

这种胡搞必然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像一位西方专家所说的："农业正面临着计划混乱和错误管理的情况，如不采取果

断措施，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危机必将很快影响整个经济。”①《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所有技术革新项目，都被头脑发热的干部们强制全部推行，根本不考虑是否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过分地强调集中抓粮食，导致了忽视那些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作物生产。把私人的土地限制在很小的规模，以及好斗的干部们把农民的树木、农具和禽畜都强制入社（有时不付钱或只付很少的钱）。这些做法使得农民把猪和家禽都杀掉，他们还听任牛马等畜力死掉而不管。结果是农民的收入下降，再加上气候不好，政府要在1956年让90%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保证就变得不现实了。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②，它用这样的坏消息来欢迎与会代表，即中国重要的小麦生产省吉林和黑龙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而河北和河南的水灾甚至比创纪录的1954年还要严重得多。报纸上唯一能给人以安慰的消息是，5月底以来，一些地方所发生的洪水、风雹和干旱，对全国造成的灾害程度和规模比1954年要小。即使如此，后来还透露出，这些灾害也影响了全国7.1%的耕地面积。

甚至在《人民日报》报道整个形势以前，党中央已采取了行动。9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生产和农业合作社组织问题的指示。③虽然这个文件的开头也委婉、简略地讲到了《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但是，很明显的是，它的主要旨意是要整顿在贯彻《纲要》过程中农业经济所出现的混乱现象，如忽视副业生产，给合作社强加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强制推行未经试验的技术革新项目，以及组合了过于庞大的合作社等。实

① 肯尼思·沃克：《中国的农业计划》第63页。——原注

② 《战胜灾荒的最重要办法》，《人民日报》1956年9月14日社论。——原注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译者注

际上,《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显然已经搁浅了。没有迹象表明在8月22日和9月8日及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讨论了《纲要》，更不必说赞同了，尽管原打算要这么做的。由于《纲要》是1956年跃进的核心内容，因此，放弃它以及批判冒进，就象征着放弃跃进本身。于是，毛强使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子前进的第一次努力就此失败了。

附 录 1
陆定一对毛的“百花齐放”方针的阐述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方针所作的阐述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抨击，说他“篡改”党的方针，因此可推测是说他篡改毛5月2日的讲话。弄清这一指责是否有正当理由是重要的。如果这种指责有正当理由的话，这就表明当时政治局外的高级官员在准备公然反抗毛的举动上走得多远。这也会用来支持“文化大革命”期间对1966年前的历史的大量评述，那些评述认为，毛是一贯正确的，相反的背离乃是毛的反对者的修正主义活动的结果。

遗憾的是，由于笔者手头没有毛5月2日的讲话文本，因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我们只能拿毛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详述同样思想的有关部分进行比较。不过，大体来说这样的比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毛讲话的最后文本只是在修改之后才发表的，而且最后文本发表时的政治气氛与作讲话时的政治气氛已完全不同，与毛、陆作“百花齐放”方针讲话时的情况也不相同。如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陆的讲话仍与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强有力地断定，陆的讲话与毛关于“百花齐放”方针的讲话也是一致的。

对陆的讲话的抨击断言，陆关于实行“双百”方针的四个理由，概括起来就是，矛盾已经消失了，阶级不复存在了，阶级斗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译者注

争已经结束了。让我们看一看他讲的这四个理由吧。

陆讲的第一个理由是，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今后几年内，这个国家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毛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就可以基本上建立起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更进一步指出，在195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成了"（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陆与毛两人的提法之间的一个不同点是，陆是在两人共同的假定基础上得出关于未来的正统结论。考察一下俄国人关于在1936年建成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描述，便可看出陆没有说任何非正统见解的话。俄国人说："社会主义体系胜利了……居民的阶级成分改变了。一切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②（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陆讲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③陆还提到周恩来1月就这个问题所作的长篇讲话。周的有关讲话是："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的知识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④（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第二年，毛说：

>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

---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② 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1月，第523页。——译者注

③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④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译者注

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①

人们也许认为毛的表述有点不甚明确，但在基本上，他们三人对知识界的政治状况都表示非常乐观。同样重要的是，比起周在毛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发表的讲话，陆的话一点也不过头；然而，周的讲话却从来没有受到抨击。

陆的第三个理由是：

“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对这些敌人，仍然必须继续坚决斗争，不能松懈。”②

对反革命分子问题，毛也作了类似的论述：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的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③

陆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④这与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的第一句话——准确地说是毛讲话中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4页。——译者注

②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379页。作者引文有出入。——译者注

④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有实质性的第一句话——极为近似。毛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然后，毛接着论述社会上仍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然而，这正是这篇讲话的主题。作这篇讲话的背景是，在“双百”方针讲话以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总而言之，即使按“文化大革命”的抨击所指控的那样，假如陆暗示（因为他显然从未明确说过）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么陆也没有比毛自己走得更远。假如可以把陆的话解释为他认为实行“双百”方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文学艺术繁荣，使科学工作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那么，陆也可以引用毛的同样一段话来为自己辩护。毛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①

“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指责陆定一的讲话完全歪曲了毛的观点，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倘若假定陆曾准备对毛的政策作与该政策的基本精神相抵触的解释的话，那么，毛本来肯定会寻找机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或别的地方纠正这一曲解。然而实际上，有可能的倒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陆最初的讲话可能是即席的，毫无准备，难免有些冗长和繁杂，因而他自己决定在发表之前进行修改。例如，据说陆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两种思想必定要传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将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同样，资产阶级思想万岁！”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一段话。能看到的最接近这个意思的可能是这样一段话：

> “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88页。——译者注

是自由的。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①

在此之前，他还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甚至在阶级消灭以后，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正统的毛的思想。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前面提到的那段没有发表的讲话的第一句，不过是唯心主义思想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已。当然，他讲的“资产阶级思想万岁”，即使在1956年的缓和气氛下，也可能被认为是过头的。但可以推断，陆讲话中的整个这一段话可能如下：

> “有两种思想必定要传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将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同样，资产阶级思想万岁！〔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陆讲的“资产阶级思想万岁”听起来是完全无害的。这并非不象是他过去讲话内容的一种重新组合，它与前面引述的那段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在重

---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新组合的这段话中，“因为”二字之后的部分中的每句话都出自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①甚至就连“资产阶级思想万岁”这句话，也可能是直接引自毛的讲话。一个证据是，毛在1956年后期说过“各党派万岁”，如果他要资产阶级政党万岁，大概他也会赞成他们的思想万岁了。

简而言之，根据迄今为止所能得到的证据，看起来陆定一并没有在讲话中篡改毛1956年5月讲话的思想。如果这个结论正确的话，那么，陆的讲话中一个后来显然被修改了的特别之处就很值得注意了。刘少奇曾指出，“双百”方针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个观点与毛关于是非关系(毛4月25日《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的第九个关系）的论述是一致的。在论述是非关系时，毛唯一直接抨击的就是教条主义者。这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部分专门论述了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陆定一的话是：“但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倾向。”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随着毛对修正主义的发展日益感到不安，这个估价在次年逐渐被全面修改了。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391页。——译者注

②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译者注

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八章

毛泽东的地位

尽管前几个月经济遭到挫折，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仍于1956年9月15日在某种胜利的气氛中召开。自从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11年过去了，共产党人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给中国带来了从上个世纪起就从未有过的和平与统一。他们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却没有造成苏联所遭受到的那种灾难性后果），而且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英勇作战，为中国的新政权赢得了有益的国际尊重；近年来，特别是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国的外交活动在亚洲赢得了新朋友。1949年时，毛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到1956年，这已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事实了。

但是，与会代表并没有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他们面临着一些实质性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怎样根据苏共二十大和此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来看待毛的地位；毛倡导

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在最近放弃1956年的跃进做法后，经济发展的方针。关于这些问题，年初已经作出了决定，但是对于大会来说，重要的是确认它们，并指出前进的道路。正如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早就作出决定了，但是大会乃至中央最高层在这些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随后的年月里继续存在，而且愈来愈严重，从而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许多种子。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中，出现了一些意味深远的晋升和降级，从而立即预示了此后事态发展的某些迹象。

第一节　不提“毛泽东思想”

毛在中共八大上的公开作用并不大。他只致了简短的开幕词，而把主要的政治报告让刘少奇去做。这并不说明毛在党内的地位下降了。1952年苏共十九大时，斯大林也曾经让马林科夫去做政治报告，而当时或后来谁也不认为这表明斯大林受到了挫折。如果按苏联的先例来看，从刘做报告这件事上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正在提携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中共八大从党章中删掉1945年党章中两次提到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成为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刘在政治报告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邓在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种迹象表明，刘可能确实想要削弱毛的地位（尽管并非要用人们所说的那种方式），而邓在报告中则注意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必须捍卫毛的地位。

新党章不必提“毛泽东思想”的建议，最初是彭德怀提出的。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时承认：

“56年开八大时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

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①

彭德怀的交代澄清的第一点是，提议删掉"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参与起草新党章或起草刘少奇报告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国家的政治生活。"新党章据说是刘挑选的一个班子起草的，这个班子由邓小平、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后任部长）、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八大后任书记处候补书记）组成。而刘少奇报告中的"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一部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厉批判——是彭真起草的。

其次，彭德怀的交代表明，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在后一阶段决定的。还有其他证据表明，这些主要的报告是在最后一刻仓促地得到同意的。

刘少奇在一次交代中声明，尽管毛反对决议中的某些词句，但当时"没有时间修改了"。②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是分三天（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开的，这种做法进一步表明，尽管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早在1955年3月就已着手进行，但是直到大会召开前夕，仍然处于相当的无组织的状态。也许，最高领导人在大会召开的前几周被自然灾害和农业问题分散了注意力，这些问题导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9月12日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联合指示。③

但是，即使决定是在最后一刻作出的，彭德怀和刘少奇若没有同事们的支持，是不能明确地删掉"毛泽东思想"的。看来，毛

---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香港联邦研究所出版1968年，第445页。——原注

②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材料，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译者注

本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了赞成意见。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宣称：

>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他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但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毛曾经有力地证实了陈毅的话，因为有一次在谈到对刘少奇报告的其他指责时，毛说：“我们都看了这个报告，是大会通过了的，不能只让他们俩〔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①

看来，有理由假设，可能就是在陈毅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毛和政治局也同意，作为一个比较正式而重要的步骤，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毛和陈毅的话说明，无论对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仅仅因为在大会上做了冒犯他人的报告，就可以指责他们想贬低毛。如果要想评价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之后，这些人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对毛的地位所采取的态度，就必须寻找其他证据。

第二节　刘少奇对毛的态度

第一个证据是彭德怀的交代，它表明刘少奇希望不提“毛泽东思想”。显然，当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作这个交代时，他可能受到要他控告当时正在遭到炮轰的同事的压力。然而给人以启发的是，他只点了刘少奇的名，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尽管这两个人当时都正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批判。彭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说，在那次关键性的会议上，刘少奇在争取同意不提“毛泽东

---

① 未查到中文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思想”的问题上起到了一种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邓却没有。刘这一次的行为是与他在中共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话是一致的。

在关键的一段话中，刘努力向中共七大以后进入党内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0%）解释了在中共历史上正确路线是如何在1935年取代错误路线的。每一个与会代表都知道，正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刘的大部分听众无疑都看过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对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的评价：

> “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①

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刘少奇既没有作出这样热情洋溢的赞美，也没有重复他在中共七大上对毛的颂扬，这是可以谅解的。他只需要说，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就足够了。②与会代表会把这种话看成是体现于中央决议中的正式立场的一种谨慎的重申——这个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③在问到应该怎样解释从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时，刘否认了那种认为党

---

①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6页。——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译者注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7页。——译者注

完全变得有经验了的看法，然后他接着说：

“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①

这段话也没提到“毛泽东道路”（这是刘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道路，②因而没有把中共的胜利归功于毛。

刘颂扬地提到毛，是在他论述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③

在中共七大上，刘比较强调毛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并没有提到他对集体领导的尊重。强调重点的变化可能是出于把毛同斯大林区别开来的需要。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译者注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译者注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译者注

但是按刘关于遵义会议的话来看，敏感的毛很可能把这段话看成是暗示他行事与人商量的工作作风和他的思想的正确性同样重要。自从1955年毛绕过同事们，以图证明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的正确性以来，毛就不再欣赏这样一种暗示了。

第三节 邓小平捍卫毛

邓在关于中共新党章的报告中，并没有着力去解释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显然，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不能加以公开讨论。但是，他大胆地正视了个人崇拜问题，并且竭力为毛开脱。为此他采取了两个办法。首先，他尽量像《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样指出，中共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采取了保证集体领导的措施，他还引用了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作出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与会的中共代表无疑十分了解这个决定（像《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引用的1943年6月决定一样）是由毛泽东本人起草的。① 邓有力地告诉与会代表，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而且正是毛自己采取了防止出现个人崇拜的措施。

邓把毛同斯大林区别开的第二个办法是阐明：“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② 这段话引自当时的官方译本，它显然是在为对毛的颂扬（“对领袖的爱护”）作辩护，并把这种颂扬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个人的神化”）区别开来。邓接着透露，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中共中央已经根据毛的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52—857页。——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译者注

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命名地方、街道和企业。①

邓并不仅仅满足于这样坚决地捍卫毛，使他免遭可能出现的个人崇拜的诋毁。他还多次主动地提到毛。他在报告的开头，简短地回顾中共自七大以来的历史时，就提到“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打倒了国民党。相比之下，刘少奇在他的简短回顾中，只是简单地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等。在结束段落，邓更加主动地说：“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考虑到新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情况，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邓指示党的各级组织“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②这与刘少奇和彭真发给宣传机关的一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指示要求他们不要提“毛泽东思想”，而只提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是刘少奇却没有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这样重申毛著作（其中当然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持久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遗漏，“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们是会注意到的。

第四节　毛的引退计划

我们可以假设，毛对于他或者可能成为又一个斯大林的任何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02页。

暗示一直是很敏感的。但要是认为他只关心他个人的威信，那就错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揭露，促使毛认真考虑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且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几个月后，他便开始为中国指出新的方向。他还被迫考虑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和接班人问题。他本人的公开讲话表明，他决定从舞台的中心退下来，以便让他的高级同僚确立他们不依赖于他的重要政治家的形象。

毛的引退计划的关键在于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分为“两线”（见附录3）。毛将退居二线，解除自己的职责，从而让常委会的其他人积累经验，树立威信。这是为了确保在毛去世之后，能有一个与斯大林的接班人所不同的、习惯了作出决定和担负责任的、自信的领导班子接班。此外，刘少奇将接替毛的官方职务，这样一来，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内的这种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但实际上是违反党章的两线划分，就随着权力的正式而公开的转移而得以实施。

毛几乎肯定是在1959年4月的政治局常委会中退居二线的，大约就在这时，刘少奇接替他担任了国家主席。但有证据表明，他在1956年9月八大之前，就已决定逐步将权力移交给刘少奇和他的其他同僚了。

我们知道，早在1957年2月，毛就准备向广大党外人士暗示他的决定了。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他把自己比作某个著名歌剧中的主角，但是又说，现在，他年纪越来越大，不能演好明星的角色了；他暗示说，他不久将退为配角。① 这无疑意味着他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已将自己的打算告诉党内的高级同僚了。而中共八大的某些迹象表明，这件事发生在1957年2月的那次讲

① 国内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没有这样的话。这是作者转引的材料。——译者注

话之前。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1956年新党章规定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一职务似乎是为交出实际权力和党的主席职务的毛而特设立的。1956年时，毛可能已经设想了一个为期5年的交接班计划，在这期间，他将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职务。要是果真如此，他将在1959年4月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第一步，即把国家主席一职交给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会中退居二线。下一步是在1961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把中央主席的头衔换为名誉主席的头衔。然而九大直到1969年才召开，而早在这以前毛就对自己退居二线的做法懊悔不迭了。

1956年新党章的另一个有标志性的变化是设立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书记处。过去的书记处是由毛主持的，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它的构成表明，过去的书记处既要制定政策，又要处理行政和组织问题，或者说主要是制定政策。这一点从明确宣布的书记处以前的职责现在将由新设立的政治局常委会接管，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政治局常委会由原书记处成员加上邓小平组成，邓在中共八大上担任了新设立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新的书记处尽管权力很大，但只有邓一个人进入了决策的政治局常委会。

按照邓小平的讲法，“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能够适应需要了”，所以改组书记处是必要的。①从党员数量的增加来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共从七大到八大，党员从120万扩大到了1,200万。但是后来，毛自己把新的书记处的设立同最高领导层分为两线的问题联系起来了。这表明，毛也把他建议组成的新的书记处看作为自己逐步从中国领导事务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页。——译者注

中摆脱出来的计划的一部分。书记处将有助于加强党的组织，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不依赖于自己的主席而存在的实体。相比之下，斯大林则胁迫党的机构仅仅成为他的个人意志的延伸。

中共八大召开时，毛的意图的第三个标志就是前面已提到的让刘少奇作政治报告这一事实。它表明毛正在推出自己的接班人。

即使中共八大的这三个方面，说明毛正在开始有计划地逐步从自己的最高地位上退下来，我们也还不能肯定，他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不提他的思想会抱有热情。显然，已经看到的是，毛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它符合自己避免抛头露面的计划，但是这个建议不是他提出的，特别是从他准备交出权力以后，他很可能私下对赞扬指导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的颂辞被删掉感到不满。毛的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他的支持者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节　党内对毛的地位的混乱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的论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些人认为主席的威信在中共八大上受到了打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可以肯定，毛经历了大会之后，地位并没有变化，声望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党章删掉"毛泽东思想"一词，刘少奇对毛的矛盾态度，乃至毛本人想逐步引退的良好愿望，这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与会代表对毛的地位感到不明确了。如果他们希望从反对个人崇拜的角度得到对毛应当采取的明确态度的话，那么他们是失望了。

在大会期间，与会代表私下已经得到关于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简要指示。据引自刘少奇的话说：

"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党的）七大上确立

的，即使我们现在不提它（可能指“毛泽东思想”），大家依然都知道。此外，要是一个人老是重复地讲一件事，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它就不管用了。”①

中组部代部长安子文也以同样的口吻说，1945年时，尽一切努力来树立毛的威信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毛主席享有这么高的威信，所以没有必要提他的威信的确立了。”这种解释——可能反映了政治局所同意的方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这能否使更加老练的与会代表相信，就令人怀疑了。只要粗略浏览一下发言者谈到毛的开幕词的情况，就能够看出由此引起的混乱。

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个报告人以外，几乎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他们发言的开头，都表示同意中央的三个主要报告。从形式上讲，可能不需要表示同意毛的开幕词，因为它不是中央的正式报告。然而，还是有35名代表表示同意毛的简短的开幕词，另外53人则没有这样做。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到毛，即便是一种形式，也是对主席的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53位代表中，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正是因为这次没有提到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专门批判。②由此，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到毛并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保住了自己在中央的位置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有一半以上留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九届中央，相比之下，没有提到毛的人大约只有1/3幸存下来。

如果把注意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种相互关系就更为有趣了。除三个报告人之外，“文化大革命”前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①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材料，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此处指宋任穷。——原注

选出的12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在中共八大上发了言。这12人中，有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去世。在剩下的10人中，有4人(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曾表示同意毛的开幕词，他们都在中共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有李先念一人仍然留在政治局。还有6人没有提毛的开幕词，他们中间有1人（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被清洗掉了，有3人（李井泉、乌兰夫、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清洗，只有两位"最年长的国务活动家"（朱德、董必武）还留在政治局内。

这并不说明，1966年时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清理党的领导人，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怠慢了毛。相反，"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高级领导人之所以被清洗，正是因为他多年来在许多问题上的行动和态度。他根据批判斯大林的活动所采取的行动，是政治表现表上的项目之一。在毛看来，中共八大就象是一张试纸，可以显示出他的同僚的真实面貌。在胜利地领导了革命21年之后，他很可能由于与会者没有非常广泛地表现出对他的肯定态度而感到失望。

第 九 章

关于自由化的争论

第一节 对毛的开幕词的反应

围绕着毛的地位所产生的疑虑，可能由于他近来的一些政策建议明显地不受欢迎而加强了。这种不受欢迎的状况可以通过分析他的简短的开幕词所受的欢迎程度而感受到。他的开幕词的主题是：为了发展必须团结起来。“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① 其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

只有毛在大会上的讲话，像苏联新闻媒介所喜欢做的那样，被官方新闻报道给予掌声分贝的级别。中国人也许希望以此表明，尽管批判个人崇拜，但是他们的领袖仍然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分贝级别也从侧面反映了毛的讲话的不同部分受到欢迎的程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译者注

度。

掌声分为四类。我这里人为地给它们规定一个分数：

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4分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3分
热烈鼓掌	2分
鼓掌	1分

用这个分数初步分析毛的讲话，可以看出：

讲话主题	占总字数的百分比	得分	占总分数的百分比
客套话	11.1	22	34.3
国际问题	45.7	33	51.5
国内问题	42.9	9	14.06

换句话说，虽然毛把讲话大致相等地分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两个部分，但是从掌声来看，国际部分更受欢迎——在中共取得全国胜利后的第一次大会上竟出现这种情况，岂不令人感到惊讶？

分析毛的讲话的国内问题部分，可以得出对这个问题的某种有趣的启示：

讲话主题	占该部分总字数的百分比	得分	占该部分总分数的百分比
八大的任务	6.7	2	22.2
1945年以来的成就	19.2	6	66.6
从错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11	0	0
同党外人士一道工作	29.7	0	0
克服“三害”	33	1	11.1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从这个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第一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爱听自己的成就，而不爱听自己的失败。

但是，如果考虑到毛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就会出现一个比

较意味深长的结论。这些政策建议包含在最后两个话题中。在这里，克服“三害”是同与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派主义尤其表现在对非党人士、特别是党外人士的歧视；但主观主义（盲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官僚主义（只下命令而不检查它们的可行性），也是与非党人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沾染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缺点的党员，非常自以为是，听不进非党人士的意见，因此也会犯宗派主义的错误。换句话说，毛关于国内问题的讲话的后两部分，实际上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的两个方面。他自那年年初就一直推行这一政策，他想首先在全国生产运动中得到党外知识分子的合作，然后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使他们同中共联合起来进行“相互监督”。但是，尽管用了占国内问题62.7%的篇幅来谈统一战线政策，却只赢得了国内部分所得到的掌声的11.10%。迹象非常明确地表明，党员对统一战线政策缺乏热情，而这种热情的缺乏使全面贯彻这一政策显得更加紧迫了。

考察毛的讲话的国际问题部分，并不能获得许多深刻见解。总的来讲，尽管与会代表对反对帝国主义的话（占篇幅的8.7%，占分数的15%）比对他关于世界形势有利于和平的话（占篇幅的12.5%，占分数的3%）的反应更热烈，但掌声的时间长短与篇幅长短是一致的。考虑到毛后来对苏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冷嘲热讽，那么他在当时有关这一部分的讲话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用来强调苏联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友好、支持和榜样的重要性，而且特别赞扬了苏联，是极为有趣的。关于苏共二十大，他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① 毛在这样公开隆重的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译者注

合没有吐露他对苏共二十大的某些做法是否明智所持的怀疑，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但是他的这些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得因在类似场合讲了类似的话而受到批判的刘少奇及其他人的错误，变得更加不可置信了。

第二节　监督中共的问题

人们肯定会记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谴责了对斯大林的神化，而且揭露了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进行的大规模逮捕、流放和处决活动。因此，它提出了共产党与它所统治的人民的关系的全部问题。在1956年10月到11月的匈牙利起义事件发生后，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尽管就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波兰波兹南的6月28～29日骚乱已经表明了东欧人民对斯大林主义的敌意。

在中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如此严重的事件，但毛后来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确实承认出现了一些动乱：

> “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①

看来，毛提到的罢工罢课事件，其中至少有些很可能发生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5页。——译者注

中共八大之前的；但是，即使没有在八大以前发生，当时中共肯定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清除不安定因素，或者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就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正如所看到的那样，1956年6月，中央指示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都要学习整风文件；而且在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指示高级干部学习同样的5个文件。9月初，山东省开始贯彻中央的指示。

正如这些措施和刘少奇、彭真在夏天的活动所表明的，在最高层领导人之中，对改善政治气氛的必要性显然没有不同意见。大家都认为，中共干部过去犯过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因此应当同错误作斗争。但是，对于产生错误的原因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表现在：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才会被认为是适当的。

刘强调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干部所面临的新条件、新任务，以及随着执政而来的主观主义的危险。刘在谈到1949年以前党在克服错误方面的成功经验时说，这个历史经验说明：

> "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刘还指出，新党员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列主义的锻炼，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译者注

以很容易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

邓小平与其说强调党的任务的新特点，不如说强调党的地位的新特点和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的危险：

>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既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在中共的分析中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可能以为，他们两个人的讲话仅仅是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但是，事实上，强调重点的不同导致了政策的重大不同。

强调主观主义的刘少奇认为，要克服这个缺点，就“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②这主要是指加强理论学习。他还强调了从事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纠正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的重要意义。骄傲自满显然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刘在谈到党员的缺点时却从未提到官僚主义。

然而，邓小平提出了整顿形势的一套不同的重点，这些重点是与他把官僚主义而不是主观主义作为三害中最严重的一害的看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6页。

法是一致的：

> “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刘和邓的政策建议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批评应该来自哪里。刘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自己学习和纠正错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胜利的保证在于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而邓则强调监督，特别是来自党外的监督。

但是，这绝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刘把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同某些国家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相比，但在谈到国家干部时，刘把官僚主义作为一个主要缺点，并不遗余力地说明怎样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然而，刘在谈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提到官僚主义或者提议监督他们。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则特别说明国家干部和党的干部都必须受到监督。

这一区别在刘谈到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必要性时，被着重地指了出来。这一方针是毛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第一次阐明的。乍一看，似乎有关这一方针的任何赞许性的论述都意味着接受党外人士监督共产党的原则。但是对刘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在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在关于党的领导的那一部分中，论述了这一方针。在说完共产党人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②之后，他紧接着指出，这些民主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页。

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职务；然后，他谈到改进这些机关的工作的各种方法。显然，刘所赞成的对党员的监督，并不是以他们的党员身分受监督，而是以他们的国家干部身分受监督。或者换句话说，刘准备让他的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人士批评周恩来政府中那些正好是党员的国家干部的错误。的确，在以后几个月里，刘和彭真起草了建立8个人大常设委员会（在地方也设机构）的计划，它们将组成一个监督政府工作的最高监督系统。但是，刘根本没有表现出赞成民主人士批评党的专职干部的任何愿望，而潜藏在7个月后开展的整风运动背后的正是毛的这种愿望。

刘少奇等人的观点反映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这个决议很可能是彭真起草的，因为彭真负责刘的报告中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那一部分。决议强调了监督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包括采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①的方法。（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决议尽管承认党的干部也可能犯官僚主义的错误（这虽然与刘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它只是说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他们的批评和建议……"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显然，党的机关干部有权保持主动性，这与国家机关干部不同。毛和邓在使中共干部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监督方面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第三节 加强群众路线

毛在政治决议中关于监督问题方面的失败，由于新党章强调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820页。

"群众路线"的作用，而得到了部分补偿。毫无疑问，这样特别引人注目地扩充1945年党章中的群众路线，是由于对官僚主义的担忧所促成的。在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阐述说：

> "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

邓还说明，加强"群众路线"是与中央提出的党外监督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②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全心全意地服务"，就是说，党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指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二是"领导方法"，就是说，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邓引用毛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把这个方法解释为，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83—84页。

邓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服务”若不讲“领导方法”是不行的：

> “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①

邓用他的报告的相当大的篇幅来阐述群众路线，而且用两个理由来为此进行辩解。第一，他指出中共七大以后大批新党员入党。第二，他断言，由于1945年以来的斗争，群众路线被赋予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②第一个理由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第二个理由，似乎是在为新党章中的群众路线对“全心全意地服务”和“领导方法”这两个方面的强调重点的根本变化打掩护，这一变化反映了以毛、邓为一方和以刘为另一方的不同意见。

在中共七大关于新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也详细地论述过群众路线，但是，他更强调“全心全意地服务”的方面。他说，为了彻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必须在每个党员心中牢固树立几个“群众观点”，③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只有第四个观点涉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方面。

在刘提出的1945年党章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7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译者注

领导方法并不是这样提的。在党章总纲论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一段话中，大部分篇幅是谈“全心全意地服务”方面的，没有出现“群众路线”的提法，而“领导方法”问题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而且还是在指出教育群众同向群众学习一样重要时提到的。它说：“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56年的党章中，这段话——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给予了较大的扩充——详细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它首先论述了“领导方法”，仅仅在随后才用与1945年党章一样的话，阐述了“全心全意地服务”的重要性。而且，它将“领导方法”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

> “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②

1945年党章和1956年党章对群众路线的不同态度，背后潜藏着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毛在1943年所确定的、刘在1945年报告中所相当准确地论述的关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内容，没有被正式写入1945年党章呢？答案似乎在于对先锋队的党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在刘看来，重要的是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这种献身精神的纯洁性是他们能够正确行动的最好保证。而在毛看来，仅仅有献身精神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在党巩固了执政地位以后，情况尤其如此；他要求经常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3页。——译者注

向正确的思想来源——群众学习，并认为这是正确行动的最可靠的保证。刘的态度带有精英主义的味道，而毛的态度则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这些不同态度清楚地显示出两人在监督中共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刘显然认为，党的精英大公无私，应当不受外部监督；党员可能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最好用党内办法——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在毛看来，监督是深入群众的又一个办法。

第四节 毛对政治决议的不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在一次交代中透露，毛曾经反对中共八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的某些词句，但是"没有时间修改，就以这种形式通过了……"。刘所指的这些话出现在下文中（令人不满的话用黑线标出）：

"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①

"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9页。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刘没有明确说毛究竟反对什么，但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可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断。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说，在上次大会以来的11年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重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的结论。但是，他指出，“基本上”解决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些问题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加以彻底解决。因此他否认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提法符合苏联的正统理论。斯大林在关于1936年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就曾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意味着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②

问题是，斯大林主义的正统理论并不是毛的正统理论。就在近6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中国人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译者注

②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6页。——译者注

曾重申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将继续存在。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的不完善方面以及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缺陷仍然会阻碍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决议（在毛所批评的那段话中）却与此相反，认为是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

毛的不满并不是由于爱死抠教条的吹毛求疵而引起的。两种观点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政治决议有力地阐述了中共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治结构不需要进一步修改了。这就反过来暗指中共不需要整风了。毛的意见截然不同。正象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所主张的那样，他认为：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正是这些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给毛提供了要求中共整顿自己的理论依据。由于到中共召开八大时已经有迹象表明毛已经在考虑发动一场党的整风运动，以防止中共走上斯大林的老路，所以他对把一个相反的理论表述写入象政治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感到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想象（尽管不一定对），政治决议中引起不满的那段话是教条式的纯真性的产物。毛毕竟早在10个月前就把生产力问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374页。——译者注

放在他的“序言”①的显著位置上了。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甚至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他还阐述说：“我们的基本任务不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它们”。（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但是，他从未说过基本矛盾已经改变了；只说过它的性质已经从对抗性变为非对抗性的了。再说，尽管到中共召开八大时毛尚未详细阐述他的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但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里已经为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

不管是谁负有责任，显然，政治决议在两个重要方面——没有说明对党的干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改变毛在国内基本矛盾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想阻止毛提出关于中共整风的任何要求。党的主席要在这个问题上达到自己的目的，尚有待于匈牙利动乱发生之后。

---

① 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译者注

第十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节 发展速度问题

毛在中共八大上受到的第二个挫折是在经济政策领域。"跃进"的发展方式受到坚决的反对。由于周恩来和他的内阁成员在那年夏天胜利地抵制了冒进做法，所以这种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周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对速度问题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不冷不热地承诺这个计划将是"积极的"。报告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充满了稳健甚至是谨慎的态度。按照周的话来说，必须从执行第一个计划的过程吸取四个主要教训；第一个教训就确定了调子：

>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

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周指出，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1955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被大大缩小了。结果造成钢材、木材、水泥的过剩。由于没有准备预备项目，这些多余的钢材和水泥被出口了，而这又造成1956年各种建筑材料的严重不足。但是，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因而把1956年的基建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许多事情急于求成。于是国民经济各方面出现紧张局面。今后，一方面必须防止急躁冒进，另一方面必须防止“裹足不前”。他先提“急躁冒进”，后提“裹足不前”，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周在总结他的观点时说：

“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半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谈到从经验中必须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时，周强调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这就再次抨击了跃进的做法：当有些部门和地方急于求成、到处铺开、“不顾条件，盲目冒进”时，就会犯错误，从而影响重点建设，造成财政紧张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周还轻轻地捅了一下跃进的痛处，强调了刚刚搁置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有害影响：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8页。

“在1956年初，当《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①

周以1956年上半年过分突出某些重要任务，以致损害了其他工作的例子，批评了另一种倾向。他提到那年年初关于生产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计划制定得过高的情况。计划虽然一再压缩，但计划仍然过高。结果造成其他建设所需要的钢材严重不足。

第三，周强调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质储备制度的重要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平衡必然经常会被打破。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是消除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所必不可少的。

最后，周认为，尽管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但是财政计划是不可缺少的。这里，他似乎对毛和陈云在那年年初发生的争论作了定论。虽然他企图平衡两种观点，但他明显地倾向于陈的观点：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21页。

周恩来得到他的计划部门的支持。副总理李富春同样稳健。他声称各级计划机关的基本职责是：

> "做到'心中有数'，保持客观的、全面的态度，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作好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的工作。"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刚刚建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薄一波，在谈到他对积累与消费的正确关系的看法时，支持了他的同僚。他提议把发展速度保持在低于1956年的水平。

显然，到这时为止，毛已经被迫承认当时的局面了。在开幕词唯一一处提到经济发展速度的地方，他说要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的经济部分也反映了经济计划部门的观点。但是，在这一部分里，他对周恩来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从而表明刘和毛一样，对计划部门所提出的低速度是不满意的。

周恩来只在一个地方不像上面那样提到《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透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农业指标之后。总理说，指标是考虑了下面的情况而提出的：

> "一方面，除了个别的地区以外，农业将会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广泛地采取各种增产的措施和推广各种增产的经验；同时，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将会有所扩大，化学肥料的供应将会有所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将会有进步，这些，都将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2页。——译者注

展。”①

简而言之，周把“纲要”看成是列举可以取得高产的各种技术措施的一个文件。然而，他接着警告说，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垦荒工作的困难、机械化水平的低下，这些“又使我们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②

而刘少奇却重申《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直接关系到产量数字的文件的作用：

>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1962年，要求生产粮食5000亿斤左右……”③

换句话说，刘认为，计划指标应当被看成是完成《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产量建议的努力的一部分。刘的言外之意是，尽管“纲要”可能已经被束之高阁，但他，也许毛，可能还有其他领导人，却拒绝彻底地把它抛弃掉。

周和刘的表述之间存在的一个有启发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要取得的成就的描绘。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两个人都说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与周不同的是，刘并没有马上强调所遭受的挫折。

周说：“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克服。”④

---

①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0页。

④ 同上，第112页。

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种成就了"。①

周的表述强调要避免对第一个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过分自满；言外之意是第二个计划的制定必须极其慎重。刘的表述则很不谨慎，含蓄地暗示同志们不应当成为怀疑者。

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提出并写入计划草案的基本原则是，计划是"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它所规定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刘虽然用不冷不热的"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话描绘了发展速度，但在前一段话中则把计划所设想的经济发展速度说成是"巨大而迅速的"。在刘背离计划机关的基本原则的话的背后，似乎是在批评规定的速度太慢，并且暗示什么是他所乐于看到的那种（"巨大而迅速的"）增长。周的话题是，计划既是切合实际的，又是有进取性的。

如果孤立地看，周和刘对《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评价和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叙述方面的每个分歧，可能看上去都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放在一起看，而且放到众所周知的关于1956年和1958年跃进的争论的环境中来看，那么刘可能是在表露自己对1956年夏天计划部门所强制实行的放慢速度是不满的。换句话说，刘在经济发展的速度的问题上似乎是和毛站在一起的，尽管他像毛一样在这一阶段不得不接受了周及其计划部门的建议。

第二节　各省关于1956年跃进情况的报告

周恩来和计划部门如果没有大量证据使毛和刘相信他们是正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译者注

确的，是决不能达到结束1956年跃进的目的的。计划部门争辩的依据在各省委书记的大会发言中反映出来了，这些发言详细说明了跃进对经济的影响。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发言，也许提供了1956年总的生产运动，特别是《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影响的最清楚的例证。他说，在制定计划时，层层盲目地提高粮食增产指标。省里计划增产16%，但到了区、乡，这个数字被普遍提高到40%。谭启龙代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发言时说，由于他的省在1953年犯了右倾保守错误，① 1956年省委的指示对农业生产要求过高过急，所以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增产运动造成基层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有些干部认为，集体化后，"社员的小辫子抓在我们手里，今后的事情好办了。"他们不想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担心陷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他们把这种情况形容为"百姓百条心"）。②

江渭清举例说明了急躁冒进的偏向：生产指标订得偏高，耕作制度改革要求过急。推广双轮双铧犁、扫除文盲的工作不从群众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压在合作社头上的任务太重，造成干部采取强迫命令手段。这些方法在一个村造成了一起自杀事件。这件事促使全省开展了关于方法问题的讨论，从而抛弃了乱戴帽子、滥扣工分的做法。③

在湖南，干部们热情地追求更大的集体化。据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有些干部认为，既然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连一些零星的家庭副业，如

---

① 作者有误。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谭的发言原话说是"1955年秋前"，而不是作者说的"1953年"。——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7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668页。

打草鞋、捉鱼、捞虾，都统一归社经营。社员的时间被卡得太紧，完全给合作社的活动占用了，致使某些社员抱怨："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①

在河北，第一书记林铁报告说，领导在增产运动的鼓舞下，企图迅速解决本省的粮食自给问题，规定了粮食生产增产36.39%的指标，从而造成打井求快而出现不少废井，不合理的密植使玉米出现许多空棵，在不适宜的山区种植各种高产作物。②

陕西的情况可算是最典型的了。高指标的确立使干部不关心社员的健康和休息，有的甚至号召社员"把黑夜变白天，把月亮当电灯"。据第一书记张德生说，在集体化运动的胜利面前，干部滋长了盲目和急躁情绪。他们过高估计社员的热情，认为"我们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了。"③

值得注意的是，连山东谭启龙这样注意指出过分热情的危险的党的领导人，也感到有必要在代表面前预测颇为乐观的产量指标。直到9月26日，他还预计，1956年粮食生产增加11%，棉花生产增加19%；而实际增加分别为8.8%和3%。④

但是，其他省委书记吸取了教训。陕西的张德生说："我们体会到：越是胜利就越需要谦虚谨慎，越需要发扬民主；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就越需要十分爱护和正确地发扬他们的劳动积极性。"⑤张还批评了那些轻视老农的经验的干部。河北的林铁认为，应当从本省过分热情的生产运动中吸取四条教训：不应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过高估计客观条件，尽管也不应犯保守主义错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3—73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05—206页。

③ 同上，第293页。

④ 同上，第692页。

⑤ 同上，第293页。

误；冒进的增产计划和保守的计划同样会影响社员的热情；上边的计划必须与下边的计划相结合，要给下边留有余地；技术改革是逐步前进的，不能一步求成，先进经验在推广之前，必须与当地农民的经验相结合。①

也许，最全面地谈到1956年"跃进"的有害影响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他的话在前面已经引用了一些。他建议：把一切不利于集体经营的东西划归社员自由经营；对社员自留地要适当放宽一些；对劳动力的管理要适当，使每个人留有活动的余地；对劳动力的使用要合理，不能过分地增加劳动强度，对妇女和体弱者尤其要注意照顾；对定额管理要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地适应农村自然条件和习惯的差异。②

第一书记们特别指出，1956年生产运动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过分注意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正如周小舟所说，这种"单一化的倾向"严重地影响了一些社员的收入。在湖南，这一倾向由于农民对前两年的粮食紧张的担心而加强了。周举例说，有个农业社，主要收入要靠苎麻，但是，由于劳力和肥料集中用在稻谷方面，以致苎麻减产20%。周说，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少。他强调了经济作物和副业的重要性，指出在湖南山区，经济作物和副业一般占总收入的40%—50%；在该省其他地方，这个比例也要高达30%。③

在福建，据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说，劳力、土地、肥料和资金都集中地用到粮食增产上了，甚至用缩小和限制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办法，来完成粮食增产的任务。有的地方甚至宣传："种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35页。

③ 同上，第736页。

什么吃什么，种粮吃粮，烧砖吃砖”。爱搞副业的不时受到批评，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因此，砍掉果树、茶树改种地瓜；平掉瓦窑种粮；“建莲”莲田改作稻田。由于忽视山区多种经济，几项山区特产的生产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1956年上半年副业减产的情况更为突出。毛猪比1955年同期减少了20%，砖瓦减产了27%，鸡、鸭、蛋也减产了。①

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在福建，粮食占农业生产总值的48%，经济作物占28%，副业占24%），以致于在有些情况下，社员没零钱花，买黄烟都要向合作社借钱。副业产品和燃料价格的自然上涨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叶飞引用不满的农民的话说：“去年是有钱买不到粮，今年是有粮没有钱用”。②

在四川，农业合作化后，生猪饲养和土特产如中药材的生产减少了。但是，在谈到副业减产时，李井泉还批评了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过去的自然流转路线。③

有一位党的领导人，担心本省对粮食生产注意不够，这就是谭启龙。在指出山东省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80公斤粮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后，他说增产粮食一直是山东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④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52页。

③ 同上，第168页。

④ 同上，第692页。

第三节　各省对中央的经济要求

各省委书记所提供的经济问题的证据，支持了计划部门反对跃进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书记对中央经济部门的做法是完全满意的。他们的发言充满了请中央注意本省的问题的恳求。书记们似乎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周恩来将主持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他们在这个时间和场合对全国资源公开地提出地方上的要求是非常适宜的。

一个主要理由是需要更多的钱兴修水利。谭启龙在详细谈到解决山东省的粮食问题需要增加单位面积产量（1955年，山东省每亩单位面积产量为241斤）之后，接着强调了水利和肥料的重要性。该省可以发动群众扩大灌溉面积，但"同时希望中央水利部门对治理以上几条主要河流①有关省与省间的统盘规划，以及在技术、投资等问题上给我们以支援。"②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出了国家资助兴修水利的同样要求，③而林铁用海河作为论述河北问题的结束语，他说"我们迫切希望、也深信会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④黑龙江省在年初遭受松花江特大洪水之后，尤其有理由强调水利问题。由于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主要谈的是党的领导问题，另一位书记强晓初受权宣布，水灾过后，省委已拟出一个方案，建议在松花江修建11个水库，其中4个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⑤他在结束时说：

---

① 指治理卫运河、涧河、沭河、万福河等主要河流。——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740页。

④ 同上，第210页。

⑤ 同上，第655页。

“为了作好根治松花江的工作，我们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区，共同研究，全面规划，并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此项工作。”①

粮食产量太少的山东省对中央要求它大量生产棉花、油料、烟草感到不愉快。谭启龙为自己的省辩护说：

“我们认为，目前不宜过多过猛地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应积极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着手……因此，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规定种植计划时，不要限制过死，使我们能够根据国家需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②

有些书记只是泛泛地请求帮助。广东省海南区委第一书记张云告诉大会，大家都同意开发海南的资源。他接着说：

“不过问题还在于开发的时间，也就是大规模开发，迟些好，还是早些好。根据我们的看法，是早些开发的好。因为，很多特种经济作物，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因此，我们要求中央把大规模开发海南岛农业资源，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③

杨尚奎请求帮助江西，既以需要为理由，又以感情为理由。他指出，老苏区占全省面积的2/3以上，占全省1700万人口的1/2以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到毁灭性破坏，经常缺少劳动力。他声称，在国民党时期，全省人口减少1/4，因此出现了大量鳏寡孤独。总的来讲，生活水平相当低。老根据地瑞金平均每年的实际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94页。

③ 同上，第731页。

收入只有42元，鳏寡孤独一直依靠国家的救济维持生活，但是在实现了合作化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合作社生产的好坏。然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五保户（合作社管衣、食、柴、育儿、丧葬）太多，社员负担不起来。在较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国家给予救济帮助。杨承认，国家已经给了江西某些特殊照顾，但是他声称，尽管在其他方面减少了一些负担，但江西的公粮负担从1951年以来历年都超过全国的平均负担率。"总的说来，老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是重了一些，以致引起了某些群众的不满，并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①

杨尚奎联合其他一些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的省委领导人，如四川的李井泉、福建的叶飞一起强烈要求重新考虑价格政策——既要对偏僻地区的人民降低商品销售价格，又要提高他们的产品的收购价格。

叶飞在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更关心的是为福建争取一些工业发展项目。他指出，1949年以前，福建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工厂也没有。唯一的现代工业是福州造纸厂。1949年后，发展了一些小型的榨油、制糖、锯木和食品加工工业，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1.32%。但是，福建的大量木材、煤、铁、水力和渔业资源基本上没有开发；由于当地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地方开发能力有限，需要国家给予有力的支持。几年来，中央各有关部门对此是关心的，但是仍嫌不够，而且对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和财务预算控制得太严太死，只偏重于消极的限制，缺乏积极的指导。他以南平造纸厂为例。由于设计文件的反复核审，建厂计划作了八次大的变更，厂址三迁，前后为时6年，直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1页。——译者注

到1955年第四季度才正式开工。古田水力发电站远远不能满足福州、南平地区的需要，如果它的第一期工程不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完成，即将使福建的工业发展计划无法实现。①

> "为此，我们要求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对福建应采取支持落后地区的办法给予帮助，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在福建办几个大型的轻工业，完成古田第一期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工程，以便逐步地改变福建的经济落后面貌。"②

与叶飞不同的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对工业发展的要求主要是以工业实力而不是以其薄弱为依据的。尽管他也说："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北京不仅应该是政治中心和文化科学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建设成为一个有相当的近代工业的城市。"③刘就象美国一位努力吸引北方工业家去投资的南方市长一样，列举了北京的优越条件。他指出，首都有科学院，有中央各部的许多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新的科技部门的建设将为北京带来更多的专业人才。此外，各高等院校已经有将近10万的师生；充分发挥这支技术力量，必将大大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和加快工业建设的速度。刘说，"我们认为，北京可以着重建设一部分精密机器和仪器工业。"④他指出，这些工厂可以取得研究部门的帮助，从而保持先进水平，而研究部门也可以更好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刘还指出，北京在气候、自然资源、现有工业基础、交通运输和通讯方面，也都有比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4—75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755页。

③ 同上，第305页。

④ 同上，第306页。

较适宜的条件。如果刘不在自己发言的前一部分，详细说明首都由于自1949年以来人口增加90%和政府部门在工厂扩建上未下决心，或在联合项目上缺乏相互协调所遇到的困难，他的论点看来会更有力些。他企图避开那种认为工业太多只会给首都服务业增加压力的反对意见，他争辩说，要想控制北京人口的发展，就必须有计划地分配工业，而不是限制工业人口的增加。

看到各省委书记的大会发言，人们会得出地方对中央不能迅速满足自己的要求感到不耐烦的印象。当然，这不是中国甚至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源严重缺乏，使分配问题显得特别尖锐。但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所有这样的问题都将因官僚机构的庞大和效率的低下而变得更为复杂。

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毛才在这年年初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要求扩大地方权力。在中共八大上，刘强烈要求扩大地方权力，而且周透露，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案已经拟出，当时正在征求意见。①但是，地方权力的扩大直到计划部门的控制大大减少之后才得到认真贯彻，各省省委书记也在“大跃进”中得到了行动自由。

第四节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问题

可能为了照顾毛的面子，计划部门在那年年初取得的一个胜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被冲淡了。这就是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发展问题。在大会发言中，李富春在谈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时承认，“对沿海工业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注意得不够。”②

---

①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452页。——译者注

这并没有超出他在那年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承认的界限。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只是宣布“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①周也在强调了要合理利用沿海工业之后解释说，这种合理性就是：

> “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②

周的表述是清楚的。它没有专门规定沿海城市进行新的建设；事实上，它说明沿海地区（譬如象上海这样已经有许多工业企业的地区）不是建设新企业的理想场所。从他所建议考虑的那些因素来看，情况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排除在那里可以建设新企业的可能性。

从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所采纳的表述来判断，周可能只是为了顾全毛的面子而没有改变政策。大会的建议说：“在内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利用并适当地发展近海各地原有的工业……。”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显然，“发展”既包括扩建，也包括新建。《人民日报》7月8日的社论④称，某些扩建应当进行。在谈到“原有的工业”时，《建议》的拟定者表明，他们也只考虑扩建，尽管也许为了再次照顾毛的面子而措辞有点含糊不清。如果毛已经设法说服他的同僚接受了他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同上，第847页。

④ 题为《发展沿海工业的潜力》。——译者注

关于在沿海地区新建企业的倡议，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周和《建议》都会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李富春几乎可以肯定会因为没有推动新建，而不会只因为没有充分地利用沿海原有的工业，作出自我批评。

第五节 国防开支

虽然毛在沿海工业的问题上未能如愿以偿，但他在另一个问题上却保住了胜利，这就是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的降低军政费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计划部门的支持。周总理在中共八大上宣布，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将国防和行政费用从占财政支出的32%降低到20%。现在，国防象毛所要求的那样，非常明确地处于次于经济发展的地位。“二五”计划的五项基本任务的最后一项是，“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减少国防支出的背景，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持续乐观的估计。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发言并在1958年担任了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说：“世界上争取和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执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国际反动势力处于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①他承认，“美国侵略集团”绝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战争和侵略阴谋”。②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国防必须进一步加强；而只是说，必须保持警惕性，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起做出更大的努力。陈毅在别的地方谈到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3页。

过去7年的中美关系时说，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只有坚决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①但是他还是没有继续论证下去说，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国防。

除陈毅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外，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一位元帅，这就是国家副主席朱德。他支持陈毅的分析意见。美国正在日益暴露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而陷入愈来愈孤立的地位：

“这些情况，就使得国际紧张局势有了和缓。当然，我们不能丧失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性，但是，只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继续加强团结，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而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那么，目前已经出现的国际局势的和缓，就有可能转变为持久的和平。”②

那两位在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支持彭德怀的元帅（中共八大后这两人都进入了政治局），这次都没有发言。彭德怀以人们所熟悉的帝国主义可能背信弃义行为作理由，恳求加强国防：

“为着保证实现我军战略防御的方针，抵抗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几年来我军在国防前线和纵深战略要点进行了现代的国防工程建筑。如果帝国主义集团一天不肯放弃侵略计划，我们的国防工程就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坚信，这种国防工程与掌握现代武器的人民军队相结合，任何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都不可能达到他们所幻想的目的。”③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1—162页。

③ 同上，第219页。

面对党关于减少国防经费的决定，彭不能要求更多的钱。但是，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要避免游击战，而用防御工程和现代武器保卫中国，那么在它感到有信心抵抗美国的进攻之前，显然需要大量的投资。彭对国防支出与国家建设的关系的看法与计划部门有所不同，这并不令人吃惊。计划部门宣称，国防建设有赖于经济建设，而彭认为：

> "我们人民需要一个持久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因而我们既要抓紧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又要在军队的建设中，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尽量节约，反对浪费……。"①

在彭的发言中，军队现代化被放到经济发展之前，而且不依赖于经济发展。

彭的要求几乎是孤掌难鸣，但也不是完全无人响应。在政治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部分中，刘少奇的分析与陈毅的分析相似。可能这两个人的分析都出自周恩来的外交部之手。在台湾问题上，刘和陈都谴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他们都重申中国愿意就台湾问题举行外长级会谈的立场。无论陈还是刘，这时都没有把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说成是对中国安全的一个威胁。但是刘在他的报告的前一部分，即彭真起草的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谈到了台湾问题。在这里，他把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说成是"对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威胁"。就在谈到这个观点之前，刘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他的话音听起来象彭德怀而不象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页。——译者注

陈毅：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①

刘的话似乎是为了在不偏离党的正式路线的情况下，小心地表达这样一个暗示：他同情彭德怀对削减国防经费的抵触情绪，而且对和平共处表示怀疑。刘把加强国防的要求和台湾是对安全的威胁的说法并列起来，这肯定会被与会代表认为是在表示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刘并没有提到这种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尽管刘在谈到加强国防时听起来象彭德怀，但他并没有提到"现代武器"，即尖端常规武器。固然，两个月之后，刘竭力推行毛强调原子武器的相对重要性的方针。但是，11月16日，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第五机械工业部（据认为，政府的这个新部是为了负责原子规划而建立的）时，刘对常规武器的重要性表示怀疑：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国防工业，但是它们是否有用还令人怀疑。我们已经制造了许多飞机、坦克，花了许多钱，费了很大力，但是如果它们将来用不上，我们不就犯了一个错误吗？"②

据说，刘表现出对核武器的盲目信任。但由于没有材料证实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译者注

②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册子《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这个说法，我们只能假设，他可能只是重复了毛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赞成核武器的观点。简而言之，刘接受了毛在国防政策上的方针，但他这样做，是想对彭德怀表示同情——这可能是他对彭提出的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所表示的感激之情。

第十一章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八大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由于党员从七大的120万发展到了八大的1070万，因此，毫不奇怪，成员之多是新的中央委员会最明显的特征。它包括中央委员97名，（上届44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上届33名）。八大之后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紧接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新的政治局委员。

1945年的政治局的确切组合从来都没有公开过，并且从那以后又选进了一些新的政治局委员。不过到八大时，人们就很容易辨认出政治局的13名成员是谁了。八大之后，政治局扩大到了17名正式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

新的政治局反映了某些重大政治现实，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革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曾经是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①。八大之后，在新

① 指朱德、彭德怀、林彪。——原注

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有4位元帅被选进政治局。①这就是说，至此四大野战军的总司令都成了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②上届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位是主管经济计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和陈云），八大之后，又有3位被选进了政治局，其中两位（即李富春和李先念）为正式委员，一位(即薄一波)为候补委员。这次，党的系统本身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其在政治局的成员数量，而只是增加了一名候补委员（陆定一）。这也许是因为上届政治局已进入了一大批被主要看作是党的官员的成员，尽管他们还有其他的头衔。总而言之，八大后出现的政治局似乎是要在党、政、军三方面之间保持大致的平衡（见附录6）。在政治局组合的这种基本平衡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委员的排名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趋势。

第一节　邓小平的晋升

在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最引人们注目的是邓小平的晋升。八大以前，他在政治局排名最后；而八大之后，他上升到了第6位。在新设的6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此后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提升邓小平最不寻常之处或许是他由以前的秘书长变成了总书记。

毛上台以前，总书记一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职务。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击败了对手，转败为胜。但当时他的实力还不够雄厚，不能将总书记的职务弄到手。张闻天当上了总书记，毛只是取代周恩来，当了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③。据说

① 指贺龙、罗荣桓、陈毅、刘伯承。——原注

② 指贺龙（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第二野战军）、陈毅（第三野战军）、林彪（第四野战军）。——原注

③ 原文如此，有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并未成为军委主席。——译者注

张闻天的地位在1937年底受到了削弱。共产国际揭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与托派分子有联系，并暗示张闻天不应继续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据说，毛也趁此机会废除了总书记这个职务，后来书记处变成为对政治局常委会负责，而不是对总书记负责。

不管这个过程究竟怎样，有两件事情是肯定的，一是遵义会议上，总书记这个当时被认为是党的最重要的职务落到了毛的对手的手里；二是在此以后九年的某个时候这个职务不存在了。这样，即使毛还没有当上党的主席，但在组织上也再也没有任何能够左右他的职位了。

到中共召开八大时，毛已担任了党中央主席的领导职务，这比30年代后期不知强了多少倍。但是，如果将总书记这个重新恢复的职务给一个象刘少奇这样资格很老的人物，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潜在危险，即这个人物可能会显得和党的主席同样重要。此时，毛已意识到有必要扶植他的同事独立担任职务，但他当时和过后的行动都没有迹象表明他想树立竞争对手。他似乎没想过，当他逐渐引退下来时，刘少奇将继他之后而升至高位。

因此，在毛的眼里，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这一职务的人，在政治地位上应该比法定继承人低一些，而且不能威胁到自己。于是，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1954年推选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而两年之后他又当上了总书记？彭真应该是更自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已经是政治局委员，而且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富有经验。彭真的问题以后将全面讨论，这里我将集中讨论毛为什么如此器重邓。

邓1904年出生于四川（除了毛、刘的家乡湖南省外，该省在中共第七、八两届的中央委员会里所占的名额要比其他任何省都要多）。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为旅法中国青年中最大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后来该团体的一部分人（包括周恩来、李富春、陈毅等）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也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

他负责团的出版物的技术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因此被称呼为“油印博士”。他在法国呆了6年（1920—1925年），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儿度过了几个月。回国后，他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为党工作。最后于1930年来到了毛领导的江西革命根据地。邓参加了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30年代后期，担任了刘伯承部的政委。在整个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时期，邓都与刘伯承在一起，曾参加了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的淮海战役。在刘的第二野战军最终接管西南之后，邓担任了设在他家乡四川省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1952年夏，邓调往北京担任副总理。原先国务院有4位副总理，他们都是1949年上任的。从他们上任到1954年政府根据新宪法进行改组，邓小平是被补充任命的唯一的一位副总理。1953年9月，邓取代薄一波担任了财政部部长，但9个月之后，他就离任了，因为他已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秘书长。1955年3月，他以秘书长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接着，他和林彪在中央全会①上被选入政治局。

邓果断、精悍，其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一位钦慕他的省领导人曾经说，邓“非常英明”，用不了几句话就能解决重大问题②。“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攻击这种性格是一种不做调查研究就乱作决定的倾向。一位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人曾在延安时期见过邓，说他“矮小、结实、身体很棒。他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天下午，我们谈了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知识之渊博令我大为惊讶。”有趣的是，在邓当上总书记时，西方观察家之中所流传的一些有关他的说法，在10年之后基本上由陈伯达

① 指1955年4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译者注

② 作者原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报《辽宁战报》1967年7月21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这位省领导人指黄火青。——译者注

给予证实。1956年11月，英国戏剧导演迈克尔·克罗夫特采访了邓，他对邓的印象和卡尔逊的描述很相近。克罗夫特说邓是一个"结实、面庞圆圆、口齿十分伶俐的人。他比一般中国人的身材都要矮小，但年龄看上去比人们估计的60岁要年轻20多。"

克罗夫特说："据说他喜欢争论，有点高傲，这使他在同僚中间不受欢迎。尽管如此，西方观察家们认为现在他的影响甚至比周恩来还要大。"①

显然，邓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是在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强人。然而在50年代中期，邓为什么会那么突然、那么顺利地超过了他的同辈人，这就有必要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当毛所信任的人邓子恢在集体化问题上使他失望时，毛便指定陈正人（他也是毛在江西时的一个同事）和陈伯达（他在延安时与毛共事）当助手。我们还会看到1958年谭震林被提升负责人民公社；1959年彭德怀对毛的攻击被挫败之后，毛的好友林彪便取代他当上了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受益的是林彪、陈伯达和毛的夫人江青。

然而，并不是说毛从不和最得信任的合作者闹翻。从1955年邓子恢下台到1971年林彪出逃，很多这样的人都垮了台。但是，虽然毛的长处在于他愿意既往不咎，愿意与各种人士（包括以前的敌人）一起共事，有证据表明他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愿意对那些久经考验的合作者委以重任。……

如果邓确实是由毛一手提拔上来的，那么毛是不是在公开地挑选接班人，这一点还没有证据。不过，邓小平已得到了党的机构的关键职务，可以以此作为向更高的目标发展的机会。可以肯

---

① 迈克尔·克罗夫特：《红地毯通向中国》，伦敦，朗曼出版社1958年，第250—251页。——原注

定，报界发表的党的重要会议的照片，似乎是为了突出、甚至夸大邓的地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1954年邓小平接任秘书长到八大的这2年零3个月中，各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更换了15人次，而从八大到50年代末这3年零3个月中，只更换了5人次，从50年代末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6年中更换了13人次……。八大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草案是由彭真和安子文准备的，据说他们俩偏爱刘少奇的追随者。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八大上对在刘少奇和他的同事领导时期吸收党员的工作提出批评。而刘并没有批评发展新党员的政策，他强调说：“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受到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锻炼。”①即使在1949年以后，党员也是按照这样的条件发展的。他准备承认的只是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而已。尽管邓承认绝大多数党员的入党手续是正确的，也承认在群众革命斗争中吸收党员才能保证党员的质量，但是，邓还是严厉地批评了吸收党员的方法，并说在吸收党员的工作中发生过“多次”错误。他接着说：

> “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②

邓还批评了一些党组织以前没能从工人中吸收新党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毛在1950年6月命令多吸收一些工人为

---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3页。——译者注

②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151页。——译者注

党员，但刘少奇和安子文破坏了他的意图。八大时，邓在这方面所提出的批评证实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这一说法。

第二节　彭真受挫

八大以后，彭真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地位显然是很有实权的。但是，他本应该获得更高的职位。

但是，彭不仅未能达到这些目的，而且实际上，他还被贬了职。1955年秋，他已从政治局里的第11位（刚好排名在林彪和邓小平这两位新委员的前面）上升到第7位（刚好在毛、刘、周、朱德、陈云和排名第6位的康生之后）；1956年初他曾一度排名第6位，在康生之前；在八大主席团名单上（和上届政治局名单一样）他排名第7位，仍然靠前。但是在八大之后的政治局里，他下降到了第10位。以前排名在他之后的邓小平和林彪被提到了他的前面，还有林伯渠和董必武这两位党的元老恢复了职务，也排在他之前。为什么很有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彭真排名落后了呢？……

彭被贬职，这可能是他和林彪长达10年的不和所致，据说，彭和安子文试图以林彪懒散为理由，把林挤出中共八届中央的领导圈子。但彭之所以被贬职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草率地制定了关于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彭希望毛早日退居二线，因此毛很生气。“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说，在1956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彭说，老旦退出舞台的时候到了。这很有可能指的是毛。但是由于毛在几个月之后也用了这个比喻，所以彭也有可能只是对他的官员作些毛准备引退的思想工作。

不过，有人引用八大闭幕后还不到一个月彭真的一段话：“主

席的话并不一定是结论……”“我今后不管你是谁，我都不迷信，要独立思考。”来抨击彭真。①然而，这里我们应该记住，1956年的气氛并不象1966年那样（1966年时主席的每个字都是神圣的），彭真的话可能是毛批准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为了逐步使中国共产党摆脱对其缔造者的依赖。

刘少奇和彭真在一起紧密合作了20年，在“文化大革命”的论战当中，彭被说成是刘“集团”的心腹，而不是邓。有这样一种评论：“刘少奇和彭真关系密切。……”如果按刘的意愿，他会毫无疑问地要选彭真当总书记。任命邓为总书记，这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整个时期，特别是对1957年有着极为重大的政治影响。……

第三节　彭德怀、康生、张闻天被贬职

八大以后，还有3位政治局委员在地位上遭受了比彭真更为沉重的打击。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元帅被提升了，远远地超过了彭德怀。这证实了1954年9月政府官员的任命所传达的一种意向。在任命的副总理的名单上，林彪排在了彭德怀的前面。这就说明有一点是重要的：不管林彪如何懒散，也要公开地把他排在彭德怀的前面。

曾经当过11年（也可能是21年）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他所蒙受的屈辱远不止这些。政治局中的3位新委员都排在了他的前面。他们当中有两位是元帅，即罗荣桓和陈毅。和林彪一样，他们的地位曾在彭德怀之下；第三位新委员是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鉴于有关1955年至1956年国防开支的争论，任命李富春为政治局委员意义就更大了。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损害彭德怀这

① 《北京日报》1967年6月10日。——原注

位中国第二号军人（朱德为第一号）的地位，并强调经济建设比国防建设更为重要。

彭德怀遭受此难不仅仅是因为他与毛、周以及李富春在国防开支上有分歧，还因为他曾建议从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删掉（毛恐怕是不会对这一作法表态的）。更公开合理的原因可能是彭在朝鲜战场上的错误。1953年后的某个时候，他说：

> “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人上来了，我不要挡道了。我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吧！”①

彭德怀所说的“年轻人”也许指的就是1954年末至1955年初在政府和党的机构里青云直上的林彪。同样，林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彭不满，特别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彭在1953年曾和高岗搅在一起。彭和毛不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彭强调中国在现代武器方面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八大以后彭德怀这颗星明显暗淡了。对此的愤慨可能是这位国防部长在“大跃进”之后对毛的做法发起攻击的一个因素。

尽管受挫，彭德怀还是以党的主要国防发言人在八大上讲了话。他毕竟不仅仅是国防部长，他还负责着军事委员会。但康生和张闻天被贬职的程度就更为严重了，他们俩都没有在八大上讲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康生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不清楚。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他没起什么重要作用，不过他被降职的直接原因可能与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之后，共产主义阵营中对秘密警察的厌恶感有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成了毛最主要的追随者之一。这说明康和陈伯达一样，与毛有长期的私人交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有可能

---

① 《彭德怀案件专辑》第475页。——原注

毛在八大时没让康受更大的屈辱。要清楚地说明毛和康生究竟有什么关系并不容易。一种可能性是，40年代初整风运动期间，当时任中央社会部（党的安全部）部长的康生曾给毛提供材料，让他分析干部是否忠诚。作为留苏的“归国学生”，康生对毛同王朋（和康生一样，他也是归国学生）那样的对手作斗争中，是特别有用处的。

张闻天为什么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明显的直接原因。不过，尽管张闻天曾经对毛有过很大的用处（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但是他也是毛的对手，也许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位主席的完全信任。实际上，即使是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也许还夸大了张的真正力量和影响，尽管他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但他却不能在大会上做报告，而且当周恩来1958年卸任外交部部长时，继任的是陈毅而不是他。他之所以留在政治局里也许只是因为承认他在遵义会议上帮助毛的历史性作用。

附录 2

“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八大报告的抨击

如前面所述，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实际上是想维护和颂扬毛泽东的。因此，我们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完全相反的说法，特别是邓小平本人在检讨中违心证实的那些说法，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邓在检讨中说，他曾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了。从他作为党章起草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点上说，他的话也许是事实。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除了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外还作过任何事。

邓还从他的报告中挑出三段话作为例证，说明他曾如何赞扬苏共抨击个人崇拜。事实上，他的这三段话并不比我们知道毛所认可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有关论述走得更远，这从下面的对照中就可以看出：

> 邓：“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

---

①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第377页。——译者注

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①

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②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③

邓：“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④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⑤

---

①③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② 《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见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第384页。——译者注

④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384页。——译者注

⑤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译者注

上面那些引自邓小平八大报告的被认为是攻击性的话，和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引来作比较的原文一样，显然旨在说明个人崇拜在中国存在于一般高级领导人中，而且正是毛泽东本人领导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在他的检讨中提到了上述引自他的报告中的论述，但他并没有试图分析他的罪行或说明他的动机。他仅仅承认自己曾在八大上说过这些话，就好象他知道别人会抓住这些论述来反对自己，因此就把这几段话罗列出来。有必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到邓小平的八大报告时，仅仅说它不过是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作出反响而已，——这是事实，但这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理由——并且没有打算指出邓小平个人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不仅抓住邓小平有关个人崇拜的言论来批判他，而且还无中生有，给他那些肯定毛的话抹黑。有一个抨击不提他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张，却只说他“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抨击材料表明，为了给邓小平的八大报告抹黑，他们竟不惜采用歪曲的手法。该材料宣称，邓“非常不情愿地提到毛主席的名字四次，然而他却宣传和吹捧刘少奇三次。”①事实上，邓在报告中七次提到毛（包括提到毛的著作），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他是用肯定的、有时甚至是极为赞美的措词提及毛的，而另一方面，邓提到刘的言论，很难看到任何赞美的意思。

邓第一次提到刘时是这样说的：“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作了详细的报告。”②

---

①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册子《他们多么恶毒！》，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73页。——译者注

邓这里提到刘少奇是为了说明他的报告的主题将不同于刘少奇的报告所论及的范围。稍后，邓又说道："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① 事实上这也是为避免重复起见而作的说明。邓的报告中唯一可能被看作"吹捧"刘的话如下："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② 人们要有真正的敏锐力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这段话中对毛、刘的称赞用词都是同样的，但前半句是"非常情愿地"说的，后半句则是出于"宣传和吹捧"的目的而说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在试图证明邓小平的报告反毛方面遇到的困难，还可从他们露骨地篡改邓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他们说邓在其报告的开头说过这样的话：

> "1945年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只是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从1953年起，是刘少奇同志对党的工作和任务作出了重要的指示"。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报告中的这段原话是这样的：

> "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

①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76页。——译者注

③ 作者原引自《中林东方红》1967年7月1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民，在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从一九五三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①

附录 3

中国领导层中的“两线”

中国高层领导分为“一线”和“二线”的情况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②

在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划分一线、二线的第二个原因：

“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主席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359—360页。——译者注

②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240页。——译者注

落。”①

显而易见，毛的这些话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他一方面说自1949年以来（即在他讲话之前的17年中）两线就已存在；另一方面又说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使他充分地相信需要搞两线。此外，毛有关马林科夫的话暗示，正是由于马林科夫在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中失败——他在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党内斗争之后，于1955年2月失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大概由此还联想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如何在政治局实行恐怖统治进行的揭露，促使毛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作为一项紧迫的事情提了出来。

毛的另一段话进一步证明，中央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并不是始于1949年：

> “我们进城〔即1949年——作者〕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后，我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这里，毛将早期“各搞一摊”的时期与后来分一线、二线的时期加以区别。“各搞一摊”时期大概是指1949年到1954年间。当时，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分散全国各地，管理着中国当时划分的几个大区。按照毛的说法，1953年财经会议好像还属于各搞一摊的时期；因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不是领导人之间缺乏相互通气，而是他们不向毛通气。

搞一线、二线并非始于1949年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是毛泽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235页。——译者注

② 《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343页。——译者注

东的下面一段话提供的：

> “为什么说〔对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我有责任呢？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的……。”①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一个责任更重的和更有权威的中央书记处是自八大开始设立的。它们都根据新党章进行了部分改组。因此，中央高层领导划分为两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后来晋升的林彪在第一线，毛居第二线——不可能始于1956年9月以前。毛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分一线、二线和建立书记处联系在一起讲，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不过，它们之间显然有紧密的联系。建立一个更有权威的书记处肯定会使党更能够独立地崭露头角。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毛在中共八大期间开始准备退居二线。就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职务。不言而喻，唯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能是毛。毛退居二线，担任党的名誉主席，本来会使他在继任者得到中国共产党主席这一令人敬畏的衣钵时，自己不致于从领导权力的顶峰一下子退出，在形式上完全失去在党内的地位。

1957年初，毛对一批各阶层的听众明确地暗示了自己的计划。据一位听过毛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原始录音的中国工商业者说，毛“把自己比作某个名剧中的主角，但说自己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不能演好明星角色了，他暗示说自己不久将降为配角。”②

---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347—348页。——译者注

② 作者引自罗伯特·洛和汉弗莱·埃文斯合著《逃离红色中国》。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就在同月，显然是在彭真监督下起草了宪法修改文本，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一届。这个宪法修改文本从未颁布或发表过。毛1958年2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正式表明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心意时，暗示了放弃这个宪法修改文本的原因：党希望在国家处于危急时毛可以复职。毛在第六十条中说道：

> “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①

似乎在“大跃进”狂热的第一年并没有对毛即将到来的退位进行范围广泛的讨论，不过毛仍明确坚持他的意愿。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在1959年任期届满时，不再提议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全会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总的方针和理论问题；但只字未提他的身体健康。

在1959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7—158页。——译者注

刘少奇接任了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他已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我确信，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毛正式退居二线。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一项指控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日期：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趁毛主席已退到第二线的机会，一跃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不时地自吹自擂，说他很忙，担子很重，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离不开他。"

这个证据清楚地表明，毛是在1959年4月退到第二线的。为了突出刘的地位的上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从这一年起，在国庆节的报纸上要并排登出规格相同的毛、刘照片。

看来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打算还要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按照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九大将在1961年召开。）从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担任党的名誉主席。中共九大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69年才得以召开，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表明，在60年代初，毛的地位实际上已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可以从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的一段话看出：

"1963年提出了一线、二线的问题，主席退到第二线。这是一个组织措施。但邓以为他现在大权在握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仍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可是刘、邓两人乘毛主席休养之机，在基层推行了他们的错误路线。"① （着重号为作者

① 作者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报《革命工人报》1967年1月12日。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所加）

毛的地位的这一变化是不是作为他最后引退，即担任党的名誉主席这一计划的开端？如果是这样，这里所说的邓对毛象征性引退的误解是不是指邓打算与刘分享毛之后的最高权力，即刘担任国家主席，而邓担任更有权力的党的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的预计第三卷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但有一点肯定会引起争议的，即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名干部大会上的行为是否使毛对自己的继任者刘失去了热情；有一个克里姆林宫学式的证据显示，在1962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与刘相比，邓的权力加强了。但无论这个计划如何，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附录 4

八届中央委员在八大发言时提及毛泽东的开幕词的情况一览表

在下表中，“＋毛”一栏下列出在八大发言开始时提到毛的开幕词的八届中央委员，而“－毛”一栏下则列出未提及毛的开幕词的八届中央委员。字母“C”和“P”表示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或即将从舞台上消失（政治上或身体上）时，他是在中央还是在省里。

[1]表示该人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2]表示该人未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3]表示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被清洗；[4]表示该委员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被选出前已经去世。姓名用粗体字的是在八大一次、二次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	
陈　毅	C^1
陈　云	C^1
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C^1
江　华	P^2
江渭清	P^2
蒋南翔	C^2
李富春	C^1
李立三	P^2
李维汉	C^3
李先念	C^1
林　铁	P^2
欧阳钦	P^2
钱　瑛	P^2
赛福鼎	P^1
谭　政	C^3
陶鲁笳	P^2
陶　铸	*C^2
滕代远	C^1
王恩茂	P^1
王鹤寿	P^2
王任重	*C^2
吴玉章	C^4
曾　山	C^1
张德生	P^4

−毛	
薄一波	C^2
蔡　畅（李富春夫人）	C^1
陈漫远	C^2
邓子恢	C^1
董必武	C^1
黄火青	P^2
黄　敬	C^4
贾拓夫	C^3
柯庆施	P^4
奎　璧	P^2
赖若愚	C^4
李井泉	P^2
李雪峰	*C^1
林伯渠	C^4
林　枫	C^2
刘澜涛	P^2
刘　仁	C^2
罗瑞卿	+C^3
彭德怀	C^3
宋任穷	P^2
谭启龙	P^1
王首道	P^1
吴　德	*C^1
吴芝圃	P^1
乌兰夫	P^2
谢富治	C^1
谢觉哉	C^1

—毛	
姚依林	C^2
叶　飞	P^2
叶季壮	C^4
曾希圣	P^2
章　蕴	C^2
张仲良	P^2
周小舟	P^3
周　扬	C^2
朱　德	C^1

注：＊表示这些人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便调到中央工作。

＋罗瑞卿究竟是正好在“文革”开始之前还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清洗的，目前仍有争议。因为毛本人在同一个讲话①中，一方面说“文革”开始于1966年1月之前（这大概是以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时又说“文革”开始于1966年5、6月份（即他于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的5个月前，大概从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透露彭真下台开始）。

浏览一下表中两栏的名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第八章中得出的结论存在几个问题。例如柯庆施，从1957年整风运动的困难时期一直到去世，他始终是毛的一位狂热支持者。“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证据、证词表明了这一点。他在八大的发言开始时没有提到毛的开幕词，是不是意味着毛仍在争取他，或者还有某种别的解释？董必武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似乎就一直忠于毛；但他为什么在发言开始时没有提到毛呢？蔡畅也同样让人产生疑问，她是李富春（他在发言中倒提到毛）的妻子，革命烈士蔡和

① 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译者注

森的妹妹，蔡和森曾是毛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这些人的行为看来肯定是意味深长的。在提到毛的12位中央官员中，有7位（占58.3%）继续被选进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在没有提到毛的18位中央官员中，同样也有7人继续留任，但他们只占38.8%。总共有22名中央及省的官员在发言开始时提到毛，其中有9人（占40.9%）在九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有32名中央及省的官员没有提到毛，其中有10人幸存下来，但只占31.2%。从中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毛的地位正处于相当敏感的时候，那些没有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的开幕词的人也许被主席、肯定也被某些"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看作是对毛的某种程度的蔑视。

附 录 5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八大报告的抨击

"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八大报告提出的最为严重的指责大概是说他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并且"美化"民族资本家。这一指责事实上站不住脚。下面是红卫兵小报常引用的刘少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

>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①

---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203—204页。——译者注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①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②

拿上面的引文来与毛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的有关论述进行对照。下面引用毛的这篇讲话中的一段名言：

“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③

毛、刘两人的论述有一个重要区别：刘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毛则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毛这样说可能反映了他1956年9月的观点，但对此无法加以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218—219页。——译者注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译者注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译者注

确定。不过，毛在1956年的一系列言论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是这样想的。恰恰相反，他在1955年12月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了“确实的保证”。一个月之后，周恩来证实这仍然是他的看法。如果毛到中共八大时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那么他的开幕词本来是一个向那些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欣喜若狂的干部发出警告的适当机会，向他们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是最后胜利者的问题甚至现在尚未解决。

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直到1957年6月才发表，此时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拿这个讲话与刘在1956年完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所作的报告进行比较，在原则上是不合乎要求的。在1957年初夏资产阶级右派发动猛烈攻击之后（见本书第三部分），刘少奇很可能同意了谁胜谁负的问题尚未解决的估价。非常重要的是，人们应始终记住：毛本人承认他曾批准了刘的报告；不过对这位主席来说，修改报告中有关他本人的立场问题的部分也许使他感到尴尬，所以他可能轻易地赞同报告中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形势的不大明确的乐观估计。

至于刘少奇所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已经消灭和毛所说的这些阶级的“残余”仍然存在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问题，不必认真地去论证，因为毛把这些阶级本身说成是“被推翻的”。

我们可以引证刘少奇报告中的几段话来证明他对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不是高枕无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引证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的另外几段话来证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例如，刘在宣称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之后，紧接着以告诫的论断补充道：“这不是说，我

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①在报告之初，他强调指出，阶级斗争仍继续存在。他说：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即民族资产阶级——作者）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②

刘少奇还预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在工商业国有化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③刘还提醒大会代表，与反革命的斗争决不能认为已结束了：

> “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实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④

至于毛，他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即使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之后仍然表现得乐观。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1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5页。

③ 同上，第246页。

④ 同上，第255页。

题》讲话一开始就突出强调已经取得的胜利：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就在他警告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的一段话中，他宣称阶级斗争的状况已有好转：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②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刘少奇为自己1956年的报告进行辩护时，他引用了报告中的一段话为例，替自己辩护，以便表明自己在报告中确实谈到了国内阶级斗争问题：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③

令人奇怪的是，刘为自己开脱而引用的一段话只有部分不正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中遗漏了一句本来会对他较为有利的话。正确的表述是这样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89页。

③ 《保定红卫兵》1967年8月5日。——原注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〇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刘在检讨中所引用的那段话除了一些不重要的措词上的变化外，最重要的一个错误是明显地将1950年开展的反对资本家投机活动的斗争与1951年8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混为一谈。正确地说，在他原来的报告中，刘并没有将“三反”运动列为一场反资本家的运动。

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刘在检讨中略去了加了着重号的那句话，因为就在这个用来为自己开脱的引文之后，刘接着承认他的报告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个断言显然否定了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主要的阶级矛盾的提法。如果说别人为了诋毁刘少奇，而要将刘少奇关于国内主要阶级矛盾的内容略去不提，那么刘为什么要在原来的报告中作这些相互矛盾的论述呢？答案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我始终没有能在刘的八大报告中找到任何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的论断。相反，刘指出至少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将继续存在；而按照政府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15—216页。——译者注

的赎买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再过12年才能完成。

为什么刘在他1967年的检讨中会造成这样的错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记错了。初看起来，事隔11年之后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假定他没有自己的报告文本），但刘绝不会连“三反”运动的性质都忘记了。而更不可能发生的是刘会忘记1956年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

如果刘对这个检讨真正负完全责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他故意把自己的话引错，试图以间接的方式来嘲弄对他的指责。不过更有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是刘被迫在红卫兵口授的检讨上签了名，而这些红卫兵太年轻，不记得“三反”运动并不是反资本家的运动；或者是刘有可能在检讨中准确地引用了自己八大报告中的话，但这些引文可能被检讨的传播者篡改了。

很明显的是，在指控刘少奇1956年宣扬基本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之前，这种严重的歪曲是必不可少的。

附 录 6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八大之前		主要构成
1 毛泽东	……中共中央主席	
2 刘少奇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
3 周恩来	中央书记处书记	政
4 朱　德	中央书记处书记	军
5 陈　云	中央书记处书记	政
6 康　生		党
7 彭　真		党
8 董必武		政/党
9 林伯渠		政
10 张闻天		政
11 彭德怀		军
12 林　彪		军
13 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	党

八大之后			主要构成	“文革”之后
1 毛泽东	……中共中央主席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2 刘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党	“文革”中被清洗
3 周恩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政	政治局常委
4 朱　德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军	政治局委员
5 陈　云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政	中央委员
6 邓小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党	“文革”中被清洗
7 林　彪			军	政治局常委
8 林伯渠			政	“文革”前去世
9 董必武			政/党	政治局委员
10 彭　真			党	“文革”中被清洗
11 罗荣桓			军	“文革”前去世
12 陈　毅			军	中央委员
13 李富春			政	中央委员
14 彭德怀			军	“文革”前被清洗
15 刘伯承			军	政治局委员
16 贺　龙			军	“文革”中被清洗
17 李先念			政	政治局委员
1 乌兰夫		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	“文革”中被清洗
2 张闻天		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	“文革”前被清洗
3 陆定一		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	“文革”中被清洗
4 陈伯达		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	政治局常委
5 康　生		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	政治局常委
6 薄一波		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	“文革”中被清洗

注意：在八大前后，除邓子恢外所有的副总理都成为政治局委员。邓大概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保守思想而受到冷落。

第三部分

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的影响

第一节　东欧动乱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紧接着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把如何改造执政党这一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由于其他原因，当时改善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所以这个问题提得正是时候。1957年整风运动前的那段时期与1942至1944年整风运动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大体上说来，两个时期都是统一战线时期，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都在寻求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1942年是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人，而1956年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要得到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就有必要整顿干部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简言之，就是要教育他们更好地对待非共产党人士。在这一点上，中国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中共八大所表明的，他们之间在具体的形式上有分歧。是应当限制在深入细致的党内思想教育上呢？还是也应当邀请党外人士监督，批

评党员干部的工作呢？此时东欧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做出整风决定的要求更为迫切，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更趋严重。

1956年由于非斯大林化倾向的发展，波兰和匈牙利开始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中共领导人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情。他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经历了“共产国际”的干涉，从而确信苏联共产党领导别国革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与斯大林打交道的经验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东欧各国的不满情绪。

在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会见了苏联和波兰兄弟党的代表——米高扬和奥哈布，明确表示支持波兰提出的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毛泽东故意冷落米高扬，据报道，结果这位苏联代表没有按照惯例等到中共八大闭幕，而是当天就乘飞机离开了北京。在同奥哈布会谈时，毛泽东还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表示同情。哥穆尔卡1949年被开除出党，1956年8月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引起的骚乱中恢复了党籍。

1956年10月19日上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华沙举行全会。哥穆尔卡和其他几个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新增选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全会。全会宣布，波兰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哥穆尔卡的长期对手希拉里·明兹被解除职务；国防部长，即由苏联任命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不再进入波党政治局。苏共领导人对此深感震惊，当天就派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到达华沙，企图阻止一个新的致力于摆脱苏联控制的“自由的”波兰领导集团上台。苏共代表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20日一早便离开了波兰。当天晚些时候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并于全会的最后一天即21日被选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和平进行的“十月革命”刚刚过去，10月22日匈牙利又发生了动乱，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的群众示威，要求撤走苏联军队，实行自由选举。示威领导人试图广播他们的要求，从而导

致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外面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第一批匈牙利人流血丧生时，几乎可以肯定刘少奇正在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就波兰事件举行会谈。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据猜测也主要是对波兰事件进行磋商。中共领导人想阻止苏联对波兰采取急躁行动，尤其是想防止武装干涉，如果苏联有此想法的话。苏共领导人在起草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关于巩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的宣言时，肯定征求过刘少奇的意见。11月1日，中共领导人在一项政府声明①中宣布支持苏联的立场，其速度之快表明他们事先已经知道苏共要说些什么。

中共领导人支持波兰是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权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如果执政，还有权治理自己的国家。然而，尽管中共领导人赞成各党独立，但他们并不愿意支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或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行动。当匈牙利事件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时，尤其是纳吉·伊姆雷宣布匈牙利政府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时，中共领导人便放弃了对匈牙利谨慎支持的态度，转而支持苏联武装镇压匈牙利动乱。

匈牙利动乱和苏联的武装镇压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许多国家的党员宣布退党。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支持苏联的第二次武装干预，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维护的唯一手段，然而他强烈地批评造成使干涉成为必要的这一形势。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波匈事件归因于斯大林制度的恶劣影响，指出"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官僚的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的一人独裁，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②

①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译者注

② 《在普拉市向伊斯特拉地区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的讲话》，《铁托选集》（1952—1960年）第117页。——译者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从11月10日到15日举行二中全会。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就目前形势和中国政府对苏伊士运河、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立场所做的报告。据推测，刘少奇汇报了他最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强调了为更好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加强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重要性。无法证实当时中共领导人是否打算更深地卷进东欧事件中去，但是全会期间，毛泽东同一大批领导人谈到他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的含义愈来愈加关切。他说：

>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泽东当时似乎没有同苏共领导人交换他对"和平过渡"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中共领导人后来指出他们在同苏共同志举行内部讨论时，通报了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看法，然而没有说明内部讨论的具体日期。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中共领导人使用苏共"同志"和苏共"领导同志"时的细微差别，就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还没有直接向苏共政治局成员提出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后来还声明，面对帝国主义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困难，需要维护团结，所以他们避免公开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他们还希望苏共领导人能够认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然而，中共领导人解释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中国革命的教训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译者注

已表明“和平过渡”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认真阅读一下刘少奇报告中的有关段落就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对“和平过渡”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并不像他们后来解释的那样明确。毫无疑问，即使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作的论述，确实是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进行的较为谨慎的批驳，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在同苏共政治局“领导同志”举行私人会晤时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然而，中共领导人在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后的几星期里，一定认识到了他们最为紧迫的任务不是批评苏共已经犯下的错误，而是确保这些错误的后果不会再发展得比当时更严重。结果，12月29日，他们就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发表了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长篇反驳文章，1957年1月初，周恩来中断对亚洲各国的访问，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这是中共为“维护苏共的威信做出的极大努力”。

第二节 中国驳斥铁托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项任务是重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主要内容，即斯大林功大于过。然而现在有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的9个月里，受铁托的鼓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斯大林，而必须重新评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制度。中共领导人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驳斥了这种论调，认为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可能被某个领导人（如斯大林）忽视或处理不当而加剧。中共领导人指出，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然而对这些矛盾的错误解决有可能将它们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正如文章指出的

那样：

> “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①

中共领导人坚持认为，缺点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一制度的“某些环节”。

文章为其他各国共产党列举了几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其中第二点就是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即使中共领导人当时还没有向苏共领导人提出“和平过渡”这一问题，但他们最终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声明了对“和平过渡”的怀疑。

文章中还有其他三个重要之处与中共第二年的政策发展相关。第一点，在引言中就矛盾进行讨论时，中共领导人列出了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人民内部”产生的那类非对抗性的矛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中共领导人重申苏联和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更为关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一观点为1957年的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赫鲁晓夫对此加以反对。

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第二个重要之处在于，它不只是提醒反对教

---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译者注

条主义。在铁托和其他一些人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提出疑问时，中共领导人反而提出了修正主义的危害。文章强调说：

“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尽管中共领导人此时转向警惕修正主义的危害，但他们仍然认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仍然明确认为教条主义比修正主义危害更大，虽然后来曾试图说明修正主义危害更大。

第三个重要之处是，文章还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为以后几年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感到不满，从而进行攻击打下了基础。在一段解释性的引言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文章接着又说：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②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译者注

② 同上。

第三节　邓小平阐明中国的立场

1957年1月的某个时候，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进行了阐释。他不得不为这篇文章进行辩护，以批驳那种认为文章没有批评苏联的观点。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对苏联基本上感到满意。”而且，对苏联的批评已经够多的了，中国方面不想再进一步批评苏联。因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一个领导，只有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苏联能够承担这一重任。谈到斯大林，邓小平只是重复中共领导人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他进行的公开批评——在应当允许缩小阶级斗争的范围时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尽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驳了铁托的观点，邓小平仍然承认南斯拉夫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阐明的立场相比，他甚至容忍偏袒铁托的观点，前提是不要把铁托的观点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似乎并不认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他这样提醒清华大学的听众们：

> “不要盲目相信和过分夸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你们不要希望说服所有的人……不要期望这篇文章一发表，国际上就能感到其影响。”①

第四节　周恩来出访东欧

即使邓小平对中共领导人理论说教的影响抱有怀疑是正确

---

① 《在清华大学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作者原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报。——译者注

的，1957年1月周恩来对东欧的访问仍具有历史意义。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东欧内部事务中担任主要的外交角色。俄国人可能对不得不要求中国干预东欧事务感到不高兴，但是，他们在东欧的威信下降，只有依靠中国的干预来维护其地位。

周恩来中断对亚洲各国的访问，出访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出现了麻烦的国家。据推测，他此次出访的目的在于运用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和个人影响迫使波兰和匈牙利接受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所阐述的观点。然而，他的成功是有限的。周恩来1月11日到达华沙机场时曾发表谈话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但他与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签订的最后公报并没有提到苏联的领导地位。而且，公报甚至没提及这一点，更不要说表示支持苏联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了；它仅仅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在那里的干涉，并支持新的卡达尔政府。公报并不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强调的那样，把匈牙利的动乱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干涉。

据推测，周恩来愿意就中共领导人认为关键的问题做出让步，部分原因在于他相信新的波兰领导人完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疑问，波兰领导人已向他说明，在当前的波兰舆论中正式表示尊重苏联的领导地位是行不通的。更为重要的是，中波公报表明毛泽东当时还不认为修正主义的危害有那么严重，所以能就根本性的问题在较大范围内达成妥协。

周恩来出访东欧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波兰度过的，对匈牙利只进行了短暂的访问，第一天到达，第二天就离开了。这表明周恩来的主要任务是在波苏之间进行调解；在匈牙利他只需要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而短暂的停留就能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是因为波兰在处理国内事务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方面比匈牙利人技巧高超得多，那么很有可能中共领导人事先就打算更清楚地向波兰新领导人表明，必须承担义务。而卡达尔毕竟是完全依赖苏联军队

的，中共领导人不喜欢这样的政府。

周恩来和苏联共产党举行会谈以后，结束了他的“修补篱笆”之行。会谈期间，他就解决斯大林问题再次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周恩来结束访问时发表的公报表明，无论俄国人如何感谢他对东欧的干预，但他们不愿意接受《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做出的理论解释，即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公报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显然是不同的：

> “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即使过去在相互关系上有某些错误和缺点，但是这些错误和缺点正在被克服和消除之中。”①

这就进一步表明苏联方面不喜欢毛泽东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发展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① 《中苏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57年1月20日。——译者注

第十三章

同意开展整风运动

第一节　定于1958年开展整风

周恩来出访东欧之后恢复了对亚洲各国的访问。这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人并不只是局限于发表理论上的见解，而是根据波匈事件的发展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中共八大召开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县级以上干部学习会议文件，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害”做斗争。有一个省把主观主义作为主要的敌人；另一个省主张按照整风原则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教育；还有一个省甚至已开始进行整风。尽管北京方面继续鼓励同“三害”做斗争，但各地不同的斗争方式清楚地表明，中央还没有发出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同时，北京方面也强调共产党需要向非党人士学习。1956年11月毛泽东发表文章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①。在文章中他间接地，但是清楚地表明支

① 《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页。——译者注

持共产党员向非党人士学习。谈到孙中山的缺点，他指出共产党对他不应当过于苛求。广而言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赞扬和宽宏大量适用于中国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治家、官员和学者，他们中许多人曾受过孙中山思想的教育。

11月15日，毛泽东对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作总结发言，号召所有干部运用整风的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做斗争。①但是从二中全会公报的措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个人号召，而不是中央的正式指示。然而，在11月中旬和次年1月中旬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同意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1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半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最近中央决定：从1958年起，将在全党进行整风。"②因为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再召开过中央全会，我们认为可能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开展整风的决定的。这次扩大会议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基本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

据推测，做出整党决定的幕后原因，是越来越关注党群关系，以避免东欧式的危机在中国重蹈覆辙。中国领导人采取步骤强调他们对缓和党的统治表现出兴趣。刘少奇在12月召开的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随着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从整体上看大为减少，所以专政机构的数量可以减少，但是工作质量要提高。1957年1月，刘少奇声明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赞成"小民主"，不过愿意支持"一点大民主"，即对于严重的官僚主义事件进行大规模的斗争。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他们不要害怕罢工和闹事。③

邓小平1月份在清华大学做报告时承认前几年无产阶级专政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 纪鲁：《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青年》1957年第2期。——原注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0页。——译者注

是多些，尽管他很快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种专政，才取得了这些成绩。他认为现在不放宽一点就是错误，然而他也反对“大民主”，认为“大民主”将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纪律松懈、妨碍生产的后果，而在党内，将造成违反民主集中制，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的后果。邓小平坚决支持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号召，他说，这个口号很显然给文化艺术带来很大的好处。他接着又指出：“今天提出这个口号是开放唯心主义，目的在扩大唯物主义，因为真理越辨越明……。”①

第二节 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抵制

尽管党的总书记②主张实行百花齐放，一些宣传干部仍极力反对这一方针。这无疑表明，在当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中共党员对他们相对非党人士来说比较优越的地位正在失去而普遍感到担忧。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所引起的反应就反映了党员的这种担忧心情。现在由于匈牙利事件的提醒，中共领导人批评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摇摆不定，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警告人们提防修正主义。这明显鼓舞了一部分军队宣传干部叹惜“百花齐放”方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些宣传干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陈其通为首，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③，抱怨说：公式化应该反对，然而一些人却利用这个来反对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而且人们太热衷于

---

① 《在清华大学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7年1月27日）。作者引自《红色宣传兵》1967年5月23日。——译者注

② 即邓小平。——译者注

③ 即《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原注

恢复旧文学，而不乐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学。

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人发表评论表示支持作者。对这些强硬派观点的支持很显然影响到了上级宣传机构。《人民日报》两个月里没能发表任何有分量的文章，驳斥这种对毛泽东“百花齐放”方针的攻击。结果，毛泽东本人不得不站出来表明他的不快。

1月12日，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刚刚发表5天，毛泽东给即将出版创刊号的《诗刊》杂志编辑们写信，寄去了他能够记得起来的全部旧体诗词。信是这样写的：

>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
>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
>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①

如信中第一句话所表明的，尽管毛泽东早就收到了《诗刊》编辑们向他索要旧体诗的信，他并未打算给他们回信。似乎很可能正是陈其通等人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攻击促使毛泽东提笔回信。毛泽东复信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强调更喜欢现代诗歌体裁，怕他的旧体诗会引起相反的后果，然而他仍赞成发表自己的旧诗，并没有找出任何理由来减轻他的担忧。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想表明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同时，他仍然赞成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尤其是对老作家们来说。从现在起那些希望复苏传统文学的人就可以利用毛泽东写旧体诗这一事实来作依据，而复苏传统文学尤其令陈其通等人担忧。

① 《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1957年第1期插页。——译者注

然而，尽管毛泽东以有关旧体诗的信对“百花齐放”方针的争论进行了干预，教条主义者们仍继续进行反攻击。他们集中攻击王蒙的《组织部里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指责这位年轻作家诬蔑了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疑问，数以百计的评论家们是受了当时苏联对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批判的影响，这位作家在其小说《不仅只是为了面包》中刻画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相似的冲突。

第三节　周恩来的报告和决定提前开展整风

周恩来访问锡兰（斯里兰卡旧称——译者注）后结束了对亚洲各国的访问，2月6日回到云南省的昆明。5天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率领的人大代表团结束对东欧各国的访问回到北京。周恩来3月5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①]汇报出访东欧的情况，而彭真直到3月31日才有机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汇报访问东欧各国的情况。推迟彭真汇报其东欧之行的日期可能包含的重要性很快就将反映出来。

2月7日周恩来在昆明接见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但是他一直到12日回到北京才露面。他和代表团成员有可能一直在昆明休息，不过他们似乎更可能是向毛泽东，可能还有其他领导人汇报访问东欧的情况，当时这些领导人可能正在浙江省的杭州。

无论周恩来是何时何地向毛泽东作的汇报，但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包含了其汇报的要点。他对访问过的三个国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共产党领导机构改正错误是有益的。他在谈到对苏联访问的情况时说：“在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员

① 指1957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译者注

和各界人士的接触中，我们体会到苏联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所进行的批评，对于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① 对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相似的评论后，他接着谈到了帝国主义利用共产党人的失误问题：

>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困难和错误，就幸灾乐祸，就妄想利用这些困难和错误来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通过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一定会更加巩固和兴盛。”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很明显，周恩来试图安慰人们不要担心整风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揭露错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从而引起可怕的后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可能已经引起人们的这种担忧，中共领导人在这篇文章里接受了匈牙利政府的官方分析，即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动乱中“起到了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在私下向同事们汇报时，周恩来可能已要求他们放弃这种轻松的解释；因为只有当他确信国内因素是匈牙利叛乱的主要根源时，他才能够那么确信帝国主义不能同样利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正错误的时机进行破坏活动。

彭真持相反的观点。彭真及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事们从1956年11月15日到1957年2月1日对东欧各国进行了为时两个半月的访问。他们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了南斯拉夫，其余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人较为保守的国家，他们都强烈支持苏联在匈牙利的立场。不同于周恩来的是，彭真不了解波兰领导人比较尖锐的观点

①② 《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3月6日。——译者注

——对中国人来说，波兰人的观点比坚持己见的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更重要——，他本人也没有访问匈牙利。因此，除去个人偏好，如果彭真对东欧事件的教训做出与中国总理相同的结论来倒是令人感到惊奇的。

只有苏联是彭真与周恩来都访问过的国家，但是他们两人对此次访问的看法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彭真没有提到苏联纠正错误。实际上，在周恩来谈到波兰和匈牙利也在纠正错误时，彭真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在纠正错误。尽管没有访问匈牙利，在描述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会见时，彭真确实提到了帝国主义在匈牙利动乱中的作用：

>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这里的匈牙利族人曾经集会谴责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坚决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立场和措施。"①

在总结对东欧各国的访问时，彭真指出，帝国主义也知道他们在任何新的世界大战中都会失败，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不和和分歧上。他补充道：

>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帝国主义者——作者注〕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所进行的挑拨离间活动，就是这种罪恶活动的铁证。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罪恶活动，明白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团结，必须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①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4月1日。——原注

彭真对帝国主义利用内部纠纷的危险性所发出的警告如果引起重视的话，很可能会阻止整风运动的开展，因为整风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开谈论家丑。但是，毛泽东显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提前一年开展整风运动。但即使毛泽东就开展整风发表重要讲话，并公布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新日程之后，彭真仍然发表了不同意见。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表大致如下（括号里表示推测的事件）：

2月1日　彭真从东欧回国

2月6日　周恩来回到昆明

2月9—11日　（周恩来在杭州向毛泽东及其他领导汇报东欧之行）

2月9—26日　（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候，很可能是在杭州会议上，决定提前开展整风运动）

2月12日　周恩来回到北京

2月12—26日　（毛泽东准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2月27—3月1日　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并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3月5日　周恩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汇报出访东欧的情况，强调共产党国家纠正错误的重要性。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文章纪念延安整风运动15周年，指出即将开展新的整风运动。

3月6—1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

3月12日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大鸣大放”。

3月31日　彭真在回国两个月后汇报出访东欧各国的情况。

第十四章

毛泽东分析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节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有1800多位主要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几乎酝酿了整整一年。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的秘密报告，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可能存在着矛盾的理论。在《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方针的讲话中，毛本人已经开始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再次分析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现在，在听取了周恩来东欧之行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打算详尽阐述其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清楚地说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发现这类矛

盾，并提出解决这类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① 尽管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被划为人民的敌人，但并没有明确要求只有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才属于人民的范围。换句话说，只要他参加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似乎愿意容忍其对社会主义持不同的消极意见。

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即工人和农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基本上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所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其解决办法必须不同。即使工人或者学生罢工、罢课也不应当感到惊慌失措，应当认真地加以解决，并把它们作为清除这些问题所在单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好机会。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论是政府或者人民都不必付诸武力而有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和争端。"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② ——这正是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

很清楚，即使正式发表前又加进了若干限制性的东西，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为更人道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即通过说服、教育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可以避免斯大林主义，所有人都能够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后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全篇讲话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广大人口（即人民）可以一同工作。报告的主要部

---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0页。

分一开始就热烈赞扬国家统一：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们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这种团结将保证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顺利开展：

"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②

毛泽东在概述自己的论点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因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9—370页。

盾的。同样地，还有上层建筑——国家制度——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导致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需要一个习惯的过程。在结束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阐述时，毛说：

>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在这里又一次表明了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的论点，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解决好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做这个报告时的毛来说，向自然界开战，显然要比进行阶级斗争更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以及当时的其他领导人的观点与毛是一致的。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深刻地影响了党外人士听众。据报道，有一个人“被毛主席的讲话激动得整整一夜无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译者注

入睡！”一位名叫罗伯特·洛的商人早已计划离开中国，现在却不知究竟是否应当留下来。他说：“我茫然不知所措。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似乎一切都有可能实现。我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有希望了。”① 由于后来发表的讲话删掉了承认错误的部分，而增加了防止言论过于自由的部分，已不可能重温当时讲话的完整风格了。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向各有关部门将近500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主要内容与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接近。这两篇讲话成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确实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罗伯特·洛等人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为什么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让党外人士相信他的诚意，因此，他坦率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严重错误。而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目的是说服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容许更多的言论自由，因此，他必须让他们信服言论自由不仅没有危害，而且具有积极作用。他尤其要让这些领导干部对在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中鼓励批评中国共产党而产生的后果放心。毛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整风这个党员最为担心的问题，再次强调了一星期前周恩来的观点。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拿国内事例做依据，而周恩来拿东欧事件做依据。毛在讲话中说：“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②

---

① 罗伯特·洛，汉弗莱·埃文思合著：《逃离红色中国》第222页。——原注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页。——译者注

正如周恩来一年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所说的那样，毛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在发展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善同他们的关系。自1956年7月以来，毛一直在努力向怀有疑虑的党员干部灌输这种思想，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概括了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1956年下半年东欧事件的发展使这一思想更具有了极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毛的这篇讲话值得我们大量引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讲话比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更长，观点更明确，可能是因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发表前做了修改。毛说：

>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①

毛接着又在一段很著名的讲话中要求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建议，帮助整顿中国共产党：

>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412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泽东清楚地预料到党外人士提批评建议时会犹豫不决，而党员干部则对批评建议持敌对的态度。有鉴于此，毛如能规定几条标准，指导党外人士，并消除党员干部的疑虑，或许会有所帮助。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是尽量让党外人士消除顾虑：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②

毛根本没有对批评的标准做出规定。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共分八部分，在其中最长的一部分中，他主张发表意见时应当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方针。按照毛的说法，“放”就是：

“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译者注

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①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内容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不过两篇讲话的调子大为不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可能会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人士持更加宽容和鼓励的态度。毫无疑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需要加以修改，部分地解释了两篇讲话的调子不同的原因；不过，在主要是针对党内较为正统保守的宣传工作干部的讲话中，毛可能还想对开展正当批评作出保证，即使冒强调过头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在这篇讲话的其中一部分中，毛确实鼓励批评者不要有片面性，不要只看到消极的方面。他接着又指出批评者可能会对此感到担忧：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象就是不让人讲话"。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承认"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③但是他要求人们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然而，在讲话的结尾部分，毛为了鼓励批评，显然愿意容忍片面性。如他所说："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2页。

③④ 同上，第413页。

第三节　整风运动形式上的分歧

中国主要高级领导人都同意有必要进行整党。但彭真，可能还有其他领导人却明显地反对提前开展整风，他们对匈牙利事件之后变化莫测的中国政治气候表示担心。毛泽东排除异议，坚持提前开展整风。然而分歧意见依然存在。其主要分歧在于整风运动的形式问题，不过毛的一些同事们似乎也不赞成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动员全国上下准备开展整风的方式。

毛认为整风应面向所有人，而不应局限于党内。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他还说，整风要求"大家"发表意见。然而党内干部并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整风。3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①纪念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十五周年。据推测，这篇文章是指导第二天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他在文章中并没提到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在对40年代的整风运动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后，他指出整风是"党内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适合于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陆定一稍后转入讨论党内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毛个人创造了整风运动这一方法，暗示了党接受这种运动的限度："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并且从这里开始，逐步地发展了一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方法。"（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文章的这一段清楚地表明：党

① 指《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译者注

首先要整顿自身，然后完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两个阶段的方法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但在1957年，毛把整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当毛要求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时——尽管他允许他们可以不参加——陆定一却对党外人士同整风运动的关系看得无所谓。他只是给"对研究整风有兴趣的人们"列出了相应的学习文件。甚至在文章的总结部分，陆定一也没有对毛关于新的整风运动的观点做出让步：

> "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以达到端正全党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目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从陆定一更强调刘少奇而不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报告可以看出，他更偏向于开展党内整风。和刘少奇一样，陆定一强调学习（显然不要求党外人士的帮助）对纠正主观主义错误的重要性，他还首次指出党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不熟悉。他简明扼要地探讨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然后深入谈论了邓小平关于权力腐蚀作用的看法。然而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仍强调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不熟悉，只是在文章的结尾，陆定一才谈到邓小平的主要观点，即执政这一简单事实导致官僚主义。

陆定一对不同的观点给以相应的强调表明，为确保整风按照他们的方式开展，毛和周恩来、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充分施加了压力，使其接受他们的主张。陆定一不可能无视毛、周、邓的观点，然而最高层对毛的反对足以使他站出来发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刘少奇当时的行为很可能鼓舞了陆定一等人。

---

① 《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译者注

第四节　刘少奇暗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如果说党员干部对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否明智表示怀疑，那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调子一定更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的担忧和不快可能确实与党外人士的异常欣喜成正比；增强党外人士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必然意味着党员干部力量和特权的相应削弱。刘少奇的行为暗示出毛的几个最亲密的同事对此极为担忧。他有意抵制或让人觉得他似乎抵制了最高国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人民日报》在3月3日刊登一幅大会照片时，通常坐在毛右边的刘少奇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因此，全国上下都清楚地知道了刘少奇的态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毛或者其他领导人就政治问题所做的最重要的报告。在这种场合下，刘少奇却不愿意在毛身边露面。《人民日报》的所有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少奇不赞成毛泽东的讲话（见附录7）。

比较有经验的干部可能会更进一步地注意到其他5个政治局成员——朱德、林彪、林伯渠、罗荣桓和彭德怀——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只有林彪一人的缺席可以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为生病（见附录7）。

政治局内部的分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到。很明显，提出开展整风这一主要方针前并没有在党中央内部进行广泛的讨论。从这方面来说，开展整风与1955年秋天实行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1956年1月实行知识分子政策不同，而与1955年夏天毛泽东本人所提出的推行集体化政策更为相似。这或许可以解释陆定一在文章中为什么有意不提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即将开展整风运动——

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正是这样说的——相反，他多少带点辩解的口气写道，条件“促使我们”开展整风。

我们不能真正搞清楚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刘少奇、彭真等人的观点。刘少奇可能原则上勉强同意毛提前开展整风的主张。但他的做法和陆定一的文章表明，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整风运动的形式以及开始整风的具体日期。

第五节　对整风的抵制

党的宣传部门没能果断地制止陈其通一伙反对百花齐放的方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的主张遇到了顽强的抵制。然而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他本人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态度比1月份时更鲜明。他说：

>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些也可以。”①

尽管毛泽东重申了“双百”方针的目的，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人民日报》却没有迅速行动，对他加以支持。只是在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人民日报》才于3月1日发表了署名陈辽（他是一名基层党员）的文章②，批评了陈其通一伙的观点。当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译者注

② 即《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译者注

讲话进一步表示支持“双百”方针，并不点名地批评了陈其通及其同事后，《人民日报》才在3月18日发表了一篇由文化部部长茅盾写的真正有份量的文章，① 批驳陈其通等人的观点。然而，还不能因此认为最终解决了陈其通一伙的问题，因为茅盾尽管是文化部部长和著名作家，但他不是中共党员。

《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报纸对那些不同意毛泽东政策的下级干部没有给予官方有分量的批评，预示着一些更为严重的情况：它没有发表毛2月27日和3月12日两次重要讲话所阐明的思想内容和方针政策；直到4月13日，该报才对毛的讲话发表社论②。如果人们事先知道在两个星期后（即4月27日），中共中央将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那么《人民日报》这种宣传上的失职实在令人感到惊奇，因为中共的宣传机构似乎一直是高效率的。所以人们必然推测毛直到3月12日才说服其同事们赞成在1957年开展整风。然而中央高层领导仍在继续争论，无法确定整风的具体日期。虽然如此，毛对《人民日报》迟迟不对他的讲话进行讨论仍感到十分恼火。4月份某个时候，几乎可以肯定是在4月上旬，毛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③

---

① 指《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译者注

② 指《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译者注

③ 1957年4月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原注

这段排炮般的攻击的话发表于1968年9月，其内容表明毛原来的意图在于批评邓拓——《人民日报》1957年上半年的总编。如果象邓拓这样甚至不是中央委员的干部都要对《人民日报》的失职负责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3月份以前或者3月份不可能对开展整风的具体日期做出最后决定。因为象邓拓这样一个下级干部会与党中央的政策明显的对着干，简直不可思议。结论是毫无疑问的，至少邓拓还没感到有必要对整风发表社论，因为整风的具体日期还没确定；更有可能的是邓拓觉得中央对整风的形式存在分歧，没有确定整风的日期，这足以原谅他的失职行为。邓拓后来在北京市委担任高级职务以及他当时肯定是市委委员这一事实表明，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彭真的影响。对当时首都的党员干部来说，彭真的观点恐怕是人人皆知的。

共产党的官方机关报纸没有就毛的讲话发表社论必定影响了地方干部的行动。4月13日，《人民日报》在对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第一篇社论的同时，第一次报道了各省对毛讲话的反应①。据报道，辽宁省委3月7日已向省委高级干部传达了毛的讲话。其他几个省可能也至少向省委高级干部通报了毛的讲话，但是《人民日报》没有提到这点。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无论其他省采取了什么行动，相对来说也只能是非正式的。直到3月下旬之前，各个省级机构似乎都没有采取任何较大的行动。根据《人民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这期间云南省委已开始组织听毛讲话的传达报告。3月25日，北京市委提议针对毛的讲话召开为期8天的宣传工作会议；第二天，彭真的老家山西省也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可能是接到了毛的亲自指示。从

---

① 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3 月下半月到 4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和其他大部分政治局常委们都不在北京。据报道，从 3 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到 4 月 8 日设宴款待来访的波兰贵宾，毛一直不在北京，4 月 3 日，他在杭州露面。如果这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杭州，那么周恩来 3 月21日在杭州出现就非同寻常了。很清楚，在 1956 到 1957 年间推行"自由化"的方针政策时，周恩来是毛的主要支持者。他很可能到杭州就北京及各地党组织没有对毛的讲话作出反应与毛进行了磋商，然后带着毛的指示回到北京。北京市委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不久即召开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很可能不只是偶然的巧合。

鉴于彭真对整风运动持不同意见，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似乎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很清楚，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不意味着彭真最后作了让步。3 月31日，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仍在进行，彭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了其东欧之行，对放任内部闹不团结的危害性提出警告。更值得注意的是，彭真没有在他自己管辖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而新华社就此次会议发表的长篇报道① 确实也没提到他的名字，尽管有1400多名党内外干部出席了会议，而且会议本身十分重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显然应该光临。毛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的第八点尤其对此作出了严格的指示，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必须"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接着补充说：

> "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

① 指《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 4 月19日。——译者注

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周恩来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彭真显然已认识到召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是比较慎重的做法。

第六节　刘少奇视察各省

对于3月份和4月初这段时间内宣传部门的拖拉行为做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推迟确定开展整风的具体时间，以便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能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做好整风的准备工作。刘少奇行程2400英里，亲自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5个省，而后返回北京。3月5日，刘到达河南省许昌，3月的某个时候又在河南省会郑州发表了讲话。3月24日，他在湖南省会长沙召开的城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4月6日，他已到了广州，因为那天他在广州欢迎波兰总理来访；4月10日，他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给当地干部作了报告。4月12日他已在返回北京的途中，那一天他访问了湖北省的汉口（他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并于当天乘火车离开。从4月15日刘在北京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直到18日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前往东北（这是他访问中国的第一段行程），刘参加了与伏罗希洛夫访问有关的各种活动。4月下旬，刘到上海视察了几天，可能是从22日欢迎伏罗希洛夫访问上海到27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据推测，4月28日他在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向该省的干部

①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8页。——译者注

发表了讲话。至此，刘少奇似乎结束了整风前对几个省、市的视察工作，因为28日晚上他已回到北京出席宴会。

很遗憾，目前只能得到刘少奇视察六省、市发表的讲话片段。其中有一大段是他在上海发表的讲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然而，他在上海发表的讲话中的一段实际上一字不差的重复了在河南省的讲话，这表明刘少奇也许曾有一个标准讲稿，尽管因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讲话内容有些变化。

有关刘少奇视察各省、市的资料尽管很少，但足以说明他此行有两个目的；大概其他几位中央领导视察各省、市、自治区的目的也相同：第一是说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实质以及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引自刘4月27日在上海的讲话片段谈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很值得将这次讲话与中共中央当天起草的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做一比较。第二个目的是讨论这类矛盾在各地的具体表现形式。刘少奇在3月份挑选讨论的实际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本人、彭真和其他一些人对开门整风的前景感到忧虑。

在郑州和许昌，刘少奇试图说服教师和学生，成为第一代受教育的农民是很光荣的。但是教育设施不足会妨碍许多人继续深造。刘想减轻这些人的失望情绪，他拿自己做例子证明在当代中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前途。当时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①，上海的情况对于了解当时全国的教育形势很重要。1957年中学入学率急剧下降，大学入学人数骤然减少。1953年以来，大学招生数第一次少于高中毕业生的人数。一位西方记者从北京报道说，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提到的1956年学生罢课之事是由于学生对工作前途感到不满而引起的。

---

① 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译者注

1957年3月，毛亲自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加强大、中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学校的政治课事实上已经被取消。正如毛向最高国务会议说明的那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未能发表，是因为他的同事们担心会因此引起更严重的学生闹事以及工厂工人罢工。

刘少奇视察各省、市谈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罢工、罢课。他所表现出的毛泽东那样的轻松态度，掩盖了幕后的激烈争论。但是他所提出的工会和党员干部应去参加罢工，以便赢得工人的支持的建议，反映出他的担忧。刘建议工会和党员干部采取这样的行动，说明他担心党已经失去了对工人的控制。1956年已经宽松的政治气候削弱了工厂的纪律。发自上海和其他各地的报道拿年轻工人做例子，说明道德的堕落，这些年轻工人因为在舞会上累得精疲力尽而使工厂减产。放松政治教育导致工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换句话说，他们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鼓励人们发牢骚会使维持纪律变得更难。1956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影响了粮食生产。1956年大规模增加投资（比1955年增加60%）导致工人数量比原计划增加了3倍。1956年普遍提高工资，对农村、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银行贷款增加一倍，进一步加剧了由工人数量激增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结果，1956年底和1957年初消费品严重匮乏。这些因素最终迫使政府投放了也许多达10%的储备商品，并减少了布匹和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号召机关、部队和学校减少15%—25%的取暖和做饭用煤。

刘少奇对在这种形势下开展整风感到担忧，显然迎合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心情；这一点可以从新闻界对广州1600人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清楚地看出来：

“一定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会议就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不少的干部思想转不过来，对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划分不清，有些人认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整风'的方法要比简单的说服教育更有效。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主张'说服和压服并用'，就是说，除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外，还应当有'压服'”。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大多数”干部反对使用“整风”或者“压服”这样的词，因为他们认为激烈的内部矛盾通常是由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引起的；甚至当群众的要求过分时，“整风”和“压服”也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最终只会激化非对抗性矛盾，甚至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毛的观点最后显然占了上风；但是新闻报道表明广东的党员干部很不赞成毛的观点。

刘少奇与毛的分歧并不仅仅是在于两人对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时开展整风将产生的后果有不同的估计。从刘少奇3月到5月间发表的讲话来看，他认为通过经济手段可以驱除匈牙利式的动乱这个幽灵，而毛泽东则坚持采取政治措施。在这几个月里，刘少奇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从得到的资料中看出，刘少奇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研究。他谈到了工农之间，工人、干部之间，新工人、老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引起的不良后果。他还谈到了人们对等级工资制，工作分配专业不对口，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产生的不满情绪。他特别指出了分配中领导干部得到更多的商品和特权这个问题。群众真正关心的就是这些工资、住房、食品和交通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能够就这些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为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提倡实行“一点平均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毫无疑问，毛不怀疑存在这些问题，也不反对实行一点平均

① 作者原引自新华社电讯稿，未查到原作，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主义。但是对他来说，仅仅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够的，为了消除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群众赢得更多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还有必要敞开大门开展整风。另外，刘少奇把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仅仅描述为“政治思想领域最重要的问题。”

刘少奇与毛之间的根本分歧似乎是匈牙利事件后，刘仍然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国民经济落后，而毛更加确信，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少奇主要通过改变人与商品之间关系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毛尽管完全意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却更加关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章

整风运动的发起

第一节 《人民日报》赞成开展整风运动

毛的政策在广东遭到抵制，引起了当地知识分子的注意。据报道，那些在当地宣传工作会议上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讲话的人，都一致认为要使这个方针得以更好的贯彻，首先必须打消许多干部对这项政策的疑虑，然后使他们正确领会这个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双百”方针都快一年了，广东的知识分子才要求“正确领会”“双百”方针。其实也不光是广东的知识分子对此有顾虑。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他本人并不是党员，他说全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上的“早春”天气——费指的是那种乍寒乍暖的天气，是既能带来温暖，但也伴随着气温突降而摧毁早开花朵的霜冻天气——还有顾虑①。显然，知识分子对《人民日报》未对毛的最新思想表示赞同会特别警觉的。4

①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原注

月份头一个星期，《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①可能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疑虑，这两篇社论虽是论述毛在他的两个讲话中提出的论点的，但这些论点正好是毛为党辩护的内容。

在杭州，毛谴责了《人民日报》，质问这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②这是毛在上海局党委会议上的讲话，毛召集这个会大概是认为上海局党委是站在他一边的少数几个他可以信任的党委之一。毛承认自己在"双百"方针问题上是孤立无援的。他估计陈其通一伙代表了90%的党员的观点，他还说："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毛的地位削弱了，但他重申他的"开明"政策，认为党必须"敞开大门"，尽管这意味着党必须硬着头皮，耐心忍受几个月的责难。好象是为采取守势，毛说："我不是在鼓励人家闹事，搞闹事促进会。"③——那些对毛不满的党员正是这样描述最高国务会议的，毛认为，听听反对意见是很重要的——这在苏联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主党派必须存在下去。对"双百"方针的反对，例如，有人认为它提出的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这是不正确的。正如八大所宣告的那样，大规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党必须跨越那条把党同非党隔裂开来的鸿沟。

毛采取的下一个行动可能已在杭州讨论过了。因为4月9日，上海《文汇报》登载了一篇采访周扬的报道。周扬——专管文艺界的最高宣传机构的官员——在答记者问中抨击了陈其通一伙。遭人怨恨的周扬鲜明地坚持毛的主张，但却不死守教条；而比他所讲的更显重要的是，这篇采访报道是登在上海的非党报纸

---

① 指《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人民日报》1957年4月1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谈知识分子的改造》，《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译者注

②③ 《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上，而不是登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形势显然需要毛的个人干预来改变党报的态度。4月10日，也就是毛重新在北京官方集会上露面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①批评陈其通及其他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人。同时也对《人民日报》本身没能更早对这些人做出反应而进行了自我批评。社论公开指出，有人害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导致文化领域的混乱局面。这种误解是由于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双百"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以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险性"，"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在社论的结束语里，《人民日报》指责陈其通一伙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分子。并指出，他们的言论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最后社论又说："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时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周扬答记者问的内容。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后就指责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邓拓受到了很大震动，从那以后，他开始采取行动了。《人民日报》不仅开始捍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尽管有些迟）也开始宣传毛的矛盾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思想。4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关于这两个讲话的5篇社论②中的第一篇。

这第一篇社论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深刻地指出，在5月份

① 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译者注

② 指：1）《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957年4月13日；2）《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17日；3）《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4月22日；4）《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23日；5）《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月26日。——原注

及6月初的事件迫使毛修改矛盾讲话（即修改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部分）之前，他大概已在考虑政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了。社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就连毛本人在他年初的两个讲话中，也习惯地把主观主义列在"三害"的首位。而现在，在中央的宣传中，官僚主义一度作为主要弊病而出现。4月13日的社论清楚地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阐述的毛的观点。并且像邓那样，社论认为，1949年以来党员的缺点错误是中共执政的派生物。刘少奇对主观主义的关注，以及他对党员面临的新任务的强调，显然已被忽视了。社论再次指出，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严格监督；同时，群众也必须不断接受思想教育，因为他们常常不能把握全国的形势。

第二节　彭真让步

《人民日报》4月13日社论所反映的毛的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进行思想教育是各级党的第一书记的责任。与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相呼应，《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 "为了加强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这一工作抓起来，经常了解群众中的思想情况，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都这样作，而不要把这一工作仅仅委托给党委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教育部门。"（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已响应这一号召，主持了4月16日开幕的省委宣传工作会议，陶铸也许是听了刘少奇的建议才这样做

的，当时刘少奇至少于4月6日以前在广州。但陶铸欣然服从毛的指示的行动直到后来才得到广泛宣传。事实上，通过对《人民日报》4月13日到22日的10天的报道方针的考察就可以看出，该报编辑部曾有过一个不报道党的第一书记们的这种活动的决定。

彭真是一位难对付的人。尽管他在公开场合总是面带微笑，但他显然是一个强人。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北方人，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获得了许多组织才能。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在华北军阀和国民党占据的城市里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为此蹲了6年监狱。1937年，他到达延安时，已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40年代初期，毛发动的第一次整风运动中，彭真还是毛的一员干将，那之后他成了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位见过彭真的西方记者冈瑟·斯坦，很佩服他的学识和精力。他曾这样描述过彭真："42岁，高大、健壮，和在延安的其他人一样，很难分清农民因素还是知识分子因素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① 斯坦准确地意识到彭真是党的重要接班人之一，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彭真的知识分子因素。

彭真在那时候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典型。一位长期跟随彭真一起搞组织工作的人②说，彭真具有超凡的能力，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站得高，看得远。他的部属都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10年后，毛抱怨彭真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在1957年，情况可能确实如此，55岁的彭真那时已管辖北京8年了。很明显，要想在首都北京干违背彭真意愿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人民日报》于4月14日举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参加的专题座谈会，一个教授③宣称，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

---

① 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英文版）第119页。——原注

② 指安子文。——原注

③ 指雷海宗，当时任南开大学教授兼世界史教研组主任。——译者注

基本上停止了发展。但是比发表这种批评性意见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次专题座谈会是在天津而并不是在《人民日报》出版地北京举行的。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并没能马上在报上发表。据透露，《人民日报》没在北京举行专题座谈会可能是因为遭到了彭真的反对。

人们记得，彭真并没参加3月25日到4月1日北京市委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但由于《人民日报》还没发表过有关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彭真的抵制行为很少有人知道，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3月26日在彭真老家山西召开的显然并不引人注意的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但其中没提省委第一书记主持会议①。同一天，《人民日报》另一篇报道②披露，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正在讨论毛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这些单位的领导成员，其中有些可能又是中共北京市委成员。

4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③，声称4月10日本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和4月11日转载周扬对《文汇报》的记者谈话以后，北京知识分子对毛有关矛盾问题的讲话精神体会更深了。凡知道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情况的读者，也许会对报道反映北京知识分子对于毛的讲话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时，避而不提本市的这次会议，有理由感到奇怪。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矛盾讲话的第二篇重要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涉及到彭真东欧之行的报告中业已表明的他与毛的政策的主要分歧：

"批评是否有利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有不同

①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作出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4日。——译者注

② 指《中央国家机关进入深入学习阶段》。——译者注

③ 指《在"争鸣"中求得统一和提高——首都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译者注

的看法。他们害怕批评会使内部矛盾尖锐起来复杂起来，会使党和政府或领导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人民日报》承认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也指出，领导者在被动之后就会取得更大的主动；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领导者会处于更被动更困难的境地。报纸再次对彭真以及与他类似的人提出了要求：“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业的领导者，今天首先需要鼓励和帮助群众充分地使用批评武器。”①

《人民日报》4月18日报道，毛的讲话在北京工厂成千上万的干部中得到热烈反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已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矛盾问题的座谈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也主持召开了长达9天的宣传工作会议。但是，《人民日报》在对这两件事及广东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中都避免谈及第一书记所起的作用。例如，新华社4月17日的一篇反映柯庆施在上海的作用的电讯稿没能发表。4月18日，新华社一篇发自天津的电讯稿不仅报道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作用，同时也报道了康生召开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但这篇电讯稿遭到了与前一篇同样的命运。《人民日报》4月19日关于广东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表明，这些失误并不是新闻界的大意造成的，这篇报道也没有提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作用和刘少奇的讲话。新华社4月19日的一篇电讯稿虽提到陶铸、刘少奇二人，但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不过，到4月19日，彭真可能已被说服了。4月18日，他的北京市政府报纸——《北京日报》最后终于发表了有关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很可能是在第一书记彭真决定让步后，这一事实才得以披露。彭真肯定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4月15日回到首都欢迎伏罗希洛夫后做出让步决定的。在以后几天款待宾客礼

---

①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译者注

仪的一段时间里，最高领导人开了碰头会，并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开展整风运动，尽管具体的日期还没定下来。刘少奇的报告也许对彭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刘少奇估计在他曾视察过的5个省市能值得冒险进行整风运动，那么彭真就很难继续置身事外了。在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发生的事看上去都很神秘，很有可能当领导人都被重新召集到北京时，毛仍没能在开展整风运动的确切时间上达成协议，但大家一致同意宣传他关于整风运动的观点。不管怎么说，4月20日，在伏罗希洛夫离京去国内其他地方参观的第一天（这解脱了北京市长照顾贵宾的任务），彭真召集了北京市委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这一次的规模是第一次的两倍，彭真发表了主要讲话。

彭真在会上道了歉。他在会上说欢迎党外人士也参加整风运动。他没有过分渲染国内混乱的危险性，同时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性。但在主要问题上，他显然仍没接受毛的分析。他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主要问题出在党内。

《人民日报》各版当即反映出了彭真让步这一十分重大的事件。该报于4月19日也刊登了北京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这是在《北京日报》登载这一报道之后仅仅一天。4月21日，《人民日报》最后还是登出了新华社4月18日电讯，肯定了天津宣传工作会议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作法——《北京日报》前一天已做了报道。在《人民日报》的另一版，登载了一些讲话，是4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知识分子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4月22日，《人民日报》在有关论矛盾问题的头条大标题下面，第一版全版都登的是彭真在北京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摘要和4月16日到19日上海宣传工作会议的报道。这是该报第一次向读者报道第一书记在当地的带头作用。

如果醒目的大标题没能引起读者对彭真让步的重要性的注

意，那么第二天发表的有关矛盾问题的社论肯定起到了这个作用。社论标题鲜明——《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它第一次重复了陆定一3月5日的文章中的提示：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而且，社论严厉批评了那些犹豫不决的党员干部：

> “领导工作人员看不到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的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了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了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这段话之前，社论再次号召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起带头作用，并批评了一些党的报纸的被动作用，包括《人民日报》自己：

> “现在有许多党组织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也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动作还很迟缓，劲头不足。党的报刊（从本报起）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现在也还有不少报刊没有重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党内除了有一些同志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有怀疑以外，有更多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今天的国内生活中，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现在，《人民日报》的编者不会没有意识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的意义”。不过这段自我批评也证实了这样一点，即《人民日报》的编者曾经对这项方针抱有“怀疑”，因为这篇社论对他们的行动迟缓并没有作出其他解释。

第三节　仓促转入整风

彭真让步之后，毛泽东迅速发起了整风运动。在《人民日报》社论宣称一场运动即将开始后仅仅过了4天，一份有关运动的方针指示就已制定出来。3天后，即4月30日，这个指示就得以发表。这样，整风运动在5月1日就开始了。即使考虑到全国上下几千名干部已经听过毛泽东在4月份的讲话录音或报告这一事实，公众对这次整风运动仍然缺乏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有迹象表明，领导人在4月中旬的碰头会上通过这一计划时，曾设想有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准备阶段。

很明显，4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①发表的同时，中央还向党的书记们发出了一个非公开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对前两篇重要社论引起的反应不够满意。来自上海和江西的报道暗示，这一指示题为《检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贯彻执行情况》，它很可能于4月22日或23日早晨下发。

从各省的反应来判断，这个指示在语气上同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具有一样的威胁性。在山东，省委于23日下午2时匆匆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在同一天，江西省委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继续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尽管四川省的行动更早，该省宣传工作会议在4月19日就召开了，但省委仍被迫于4月24日发出通知，把通常的理论学习暂停一个月，以便集中精力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于4月25日召开了一次由党委书记们参加的电话会议，并制订出了5月3日宣传工作会议的日程。其他省的报告也开始汇集中央，其目的在于公布他们的所作所为，以此表示他们紧跟毛的

---

① 指《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译者注

方针路线。

毛泽东试图向那些行动迟缓的省委书记施加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中央如果事先知道要在4月30日发表整风指示的话，为什么还要在4月22日或23日发出一个指示呢？至少，中央应该就整风指示的紧迫性提醒一下省级领导人，以免使他们产生困惑。例如，在江西，省委就处于很尴尬的境地。4月27日，省委发布了一份详细通知，制订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可行办法；可过了不到10天，省委只得宣布说，现在正在依据中央的整风指示制订新的计划；各级干部应当继续按照省委的通知开展工作，直到省委组织起一个全省范围的整风运动。广东省委也于4月27日向全省人民发表了一个关于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可是仅仅3个星期后，它又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整风指示。

如果说毛泽东确实是在4月份的最后10天才突然决定立即强力推行整风运动的话，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原因可能是学术界对他的意图依然持怀疑态度。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一篇文章①。他在文中论辩说，知识分子的"早春"之感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领导干部对"百花齐放"口号只是喊而不放。结果，知识分子便说："雷声大，雨点小！"知识分子不得不揣摩"百花齐放"的号召是否出于真诚，或是仅仅是挖错误思想的一种手段。这篇文章很显然触怒了毛泽东，原因自然人人皆知。与费孝通论述"早春"感觉的文章不同，翦伯赞的文章是在毛泽东发表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写成的，然而翦伯赞依旧对"双百"方针公开表示怀疑，这些怀疑使人们对毛泽东推行其政策的诚意或至少

① 《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译者注

对其能力显然要打问号。

4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①，报道了在非党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关于毛泽东矛盾问题讲话精神的争论。他们当中的邓初民主张百家争鸣应当有所限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尤其反对这一点——并提出了指导百家争鸣的4个原则。显然，邓初民不可能听过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且他的言论表明，如果宣传部门未能传播信息，知识分子将采取自我审查的方针。毛泽东觉察到知识分子的这一情绪，担心他的讲话效果会受到削弱，他可能已经感到必须快些行动。

很可能在4月中旬，毛只是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同意，要在不久的将来发起整风运动。为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运动以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做好整风的准备；同时同意发布4月22—23日《检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贯彻执行情况》的指示。可能是在此之后，毛做出了立即整风的决定。当时正值刘少奇和彭真都在外地陪同伏罗希洛夫。如果整风指示的日期——4月27日——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它只能说明这个指示是在刘少奇和彭真不在北京时起草并通过的，尽管它在4月30日以前尚未发表。这一事实说明，毛泽东感到在发表之前有必要向刘、彭二人送阅，但即使如此，他们二人也许已经面对着一个难以挽回的局面。早在4月28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就已决定发起一次整风运动，并未因尚未看到中央的整风指示而受到妨碍。总之，当刘、彭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已做好了举行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的准备，这次会议于4月30日秘密召开。尽管此次会议一定是整风运动的策源地，但官方一直未予公开报道。这进

① 指《几位学者对“放”的方针有不同体会——《争鸣》月刊发表如何展开学术界百家争鸣问题座谈记录》。——译者注

一步表明，毛的反对者们对把运动突然强加到党的干部身上的作法深为不满。

第四节　中央的整风指示和刘少奇的上海讲话

将整风指示与刘少奇在上海对党的地方干部的讲话加以对比，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并未向他的高级同事们通报有关情况。刘少奇于4月27日发表这一讲话，整风指示也在同日作出。如果毛、刘两人事先作了充分协商的话，人们应当能发现二者在基本要点上的一致。但恰恰相反，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刘少奇的讲话与整风指示是有分歧的：在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重要性上估计不同。

整风指示指出，社会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党和工人阶级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以完成摆在面前的任务，但是，许多干部对此并不了解。同时，因为党已处在执政的地位，官员们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①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就已着重分析了政权的腐败现象。因此，整风指示继续对近几年来“三害”的滋长加以描述，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在整风指示里，“三害”依次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指示把它们作为发起新的整风运动的原因。

长期以来，毛和邓小平一直把主观主义放在“三害”的首位。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主观主义在受攻击的“三害”中就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译者注

首当其冲。但是后来，邓小平在八大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历次重要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执政（官僚主义的根源）比思想落后（主观主义的根源）更危险。甚至连《人民日报》在4月13日的社论中也开始强调官僚主义的危险性。

相反，刘少奇仍坚持认为，主观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是主要的危险。他在八大的报告中只承认党的干部并未做好知识上的准备，以适应革命胜利后新任务的需要。他的上海讲话表明，直到整风运动发起时他仍坚持这一立场，因为在他关于什么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大段讨论中，他以这样的顺序列举了“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他首先讨论了思想方面的错误，而且其篇幅远远超出了有关官僚主义的篇幅；他阐述官僚主义仅仅是为了巧妙地放弃这一话题并回到思想问题上来。而且在提到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时，他只把它看作为许多矛盾中的一个而已。

刘少奇没有将官僚主义看作主要的弊病，证明他依然不同意毛有关整风运动的目的的看法。此外，刘少奇还强调了党内思想矛盾的性质，并指出党内矛盾应当用党内方法来解决。关于这一点，陆定一早在3月份就提出过。但是，刘少奇的讲话还表明，他并不知道整风运动即将开始。对此人们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因为目前只能看到他的讲话的一部分。但在开头的论述中，他只字未提整风运动。如果说他早已知道整风指示已于当日通过并将于3天内公开发表的话，出现这种失误是不可思议的。与刘不同，周恩来4月24日在杭州向领导干部讲话时，却讨论过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事实上，依照刘少奇讲话的长长的第一部分来判断，他的论述与先前未发表的中央4月22日（或23日）的指示精神是相吻合的。他是在宣传毛的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思想观点，目的在于向党的干部们

解释为什么现在需要温和地对待人民群众。相反，整风指示则超越了这一阶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着重解释为什么需要开展整风运动来保证党的干部们更温和地对待人民群众。

对“和风细雨”方针的不同解释，说明刘少奇的讲话与整风指示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是：

> “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很显然，毛企图向党员们保证，他们将不会经受他们对付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斗争运动。刘少奇也提倡利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但是他这样谈及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主张少来些斗争；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并重视小民主，因为它们〔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

以上论述再次突出地表明，在改善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方式的必要性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没有分歧的。刘少奇在上海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会上的讲话，尽管有些冗长和啰嗦，却似乎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发生争执的是，究竟具体哪一“害”——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应当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负责。由此又产生以下争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整风运动——限于党内还是敞开大门，以及何时发起整风运动——马上动手还是拖后一些时间。

第五节　《人民日报》再次改变立场

既然整风指示反映的是毛的分析，那么，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成为整风运动的指导

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指示把这些讲话说成是毛代表中央所作的，而这一点并未反映在原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公报里，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整风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学习这些讲话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并照此改进本单位的工作，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或许，为了取得刘少奇的同意，这个指示还提出，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以克服主观主义。然而，这一方面的学习计划须在晚些时候才能制订出来。很显然，毛泽东并未把此事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向党员许诺了整风运动中他们不必在斗争会上亮相后，指示接着说，那些受批评的党员也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指示还进一步向党员们说明，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犯党纪国法者外，一概不给予组织上的处分。

整风指示还作了四点重要说明，第一，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毛是在坚持开门整风。第二，重点强调干部要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指示透露，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指示不久即将予以发表。第三，指示强调，党委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整风运动，并指出，应当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整风小组。最后，指示规定："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人们不会不注意到，这里把整风放在工作之前。

整风指示是在4月30日由新华社发布的，并刊登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党报未在同一天发表一篇解释性的社论，或许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在5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这篇社论的内容与整风指示有严重分歧，这些分歧表明，毛的同事们与毛的不和，事实上也就是对毛的怨愤在不断增加，同时也说明，《人民日报》又一次改变了立场。

这些分歧首先涉及整风运动的原因。整风指示对社会关系的

改变和共产党执政的地位作了阐述。《人民日报》社论则只阐述了社会关系的改变，尽管文章也提到指示中列举的一些弊病是由党执政的地位造成的。然而，甚至当提到这些弊病——如不能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时，社论仍继续强调主观主义因素的作用，具体到干部个人而言，则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了解以及知识方面的贫乏等。与4月13日的社论相比，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改变。刘少奇固执地坚持这一分析——因为《人民日报》社论肯定反映了他的观点——暗示出他对毛关于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原因的剖析最担心的是什么。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造成官僚主义的基本原因，并认为官僚主义导致了人民群众同党的可怕的疏远，那么整风方法就可能是公开辩论，以达到不但要改善党的工作方法甚至要限制党的权力地位的目的。在1957年，毛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刘少奇的这种担心无疑是正确的。在9年之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正是对执政党的地位进行了冲击。

整风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二个重要分歧是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方针问题。社论说：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团结、关于工农联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理论，都是我们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指针。"

社论断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不是刚刚出现的问题，并据此为它上面的论述辩解。社论后来也谈到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但并没有明确将它作为整风运动的指导。这一切反映了对毛的公开冷落，这一冷落很可能表明毛的一些同事们对他正在发起的整风运动的方法感到不满。对那几千名听到

毛关于矛盾问题讲话原文的中国人来说，对毛的这种冷落甚至更加明显，因为这位主席在讲话里宣称：

> “这些问题对马列主义来说是新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列宁虽然提及过，但他一生并未对此加以详细论述，由于当时外国干涉的结果，很难单纯仅谈论国内问题。至于斯大林，他的观点只能批判地去考虑。”①

社论在竭力贬低毛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开拓性分析方面走得就更远了。它指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党的八大决议的继续。就八大决议所谈到的国内形势的基本变化而言，这种说法一半是正确的；但是，八大决议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前形成的，而匈牙利事件无疑是整风的主要鞭策力，所以社论的作者也不得不引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如果社论在此也对毛的讲话给以应有的赞扬的话，不会有什么不恰当的。相反，社论比较详细地援引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论述，以此说明毛很重视温和的群众工作方法，然后接着说：“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同这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对毛的前后一致所表示的这一赞扬，是为了再次降低毛关于矛盾问题讲话的新鲜感和重要性。然而，整风指示则把毛的两个讲话作为整风的思想指导，并且宣称，这两个讲话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真正开始。

这篇社论作出这样的分析，其背后的动机可能并不完全出于报复。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们也许已经决定，如果要发动整风运

---

① 作者引自流传到外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动的话，那么运动的指导思想似乎应该出自党的集体决议，而不是出自由党的主席所作的未经认可的讲话。下面的事实为这种假设提供了证据：社论没有照搬整风指示，也没有把毛的这两篇讲话看作为他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而是仍把矛盾问题的讲话作为一个讲话来对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寻找整风运动和八大决议的内在联系，这篇社论的作者不得不重新解释八大决议的有关段落，这很可能以某种党的主席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触怒了毛。众所周知，这项政治决议宣告，由于1955至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中国的主要矛盾已变为落后的经济基础同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不同意这一点，他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说，基本矛盾仍然是不完善的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两种阐述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决议的阐述意味着发展经济是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而毛的论述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改造上层建筑，例如开展党的整风运动。为了把八大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的基础，5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其重新作了解释。社论指出：

> “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犯错误的党员。然而，《人民日

报》5月2日社论则微妙地向人们暗示出：这些党员并非真正都那么坏。社论中援引了毛1949年阐述关于温和的群众工作方法的一段话，这段引文暗示党自那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除此以外，文章没有其他相反的观点。社论对新的社会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真正根源的分析，则更加强了这一印象。社论首先引证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受的不充分的再教育；其次才引证了党员干部的错误，并且这些都是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而不是群众工作中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时，社论用缓和的语气来消除人们对党员的中伤和诽谤。整风指示曾经指出，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甚至沾染了国民党的工作作风，社论则把这些人仅仅估计为“少数”，而用“一部分”这个范围更大的词来描述那些具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的党员。

5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明，在连续3个星期反映毛观点后，《人民日报》又转变到以前的反毛立场上来了。此后在整个5月份和6月初的“大鸣大放”期间该报一直坚持后一立场，怎么会有这种可能？《人民日报》是如何被控制的？

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只能进行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样的：《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首先要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在中宣部，胡乔木是主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他要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负责，陆定一在中共八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说，陆定一应当对邓小平负责，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中央各部。然而，事实说明，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和以后，刘少奇就一直是宣传和新闻工作的最高主管人，并且宣传部的干部们通常都是直接向刘少奇汇报工作的。我猜测，毛并不经常干预这一领导关系，但在4月初刘少奇不在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却插手干预了。4月中旬，刘少奇结束了他在各省的视察回到北京，他与毛达成协议，批准了4月22日或23日中央指示的发表，并继续在《人民日

报》上宣传毛的观点。但毛违犯了这一协议，仓促发起了整风运动。毛的仓猝之举可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知道自己已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少奇就无法阻止整风运动的开展了。不过刘可以保证《人民日报》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会十分准确地反映他本人的疑虑，事实证明，他正是这样做的。而正是由于毛对自己只能断断续续地控制《人民日报》不满，才使他在4月初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建议，即各省应该有自己的非党报纸，来同党报竞争。

第十六章

大鸣大放

第一节　五个星期的大鸣大放

从5月1日到6月7日，整风运动进展顺利。在此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由于相信"早春"天气终已过去，夏日已经来临，便倾诉了压抑在心里的对党的不满。他们的批评证明了毛泽东的必须马上整风，以纠正滥用职权之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不过，许多批评家的猛烈抨击也证实了刘少奇和彭真的进行开门整风很危险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因此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警告，同时党内受到围攻的干部对批评他们的人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了。

在这里，没有必要去把那动乱的五个星期的大鸣大放中所发生的事件都记录下来，也没有必要去分析批评的内容。不过，有必要简述一下事情发展的大致情况，以便了解当时高层领导对整风问题的持续不断的争执和毛为什么最终同意舍弃他所发起的整风运动的形式的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刊登在5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指示的下面是一则新闻，报道中央国家机构的党委已经决定马上进行整风运动。翌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已开始做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和邓小平敦促他们所管辖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然而，刘少奇和彭真好象在压抑他们所管辖的那一部分中央政府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整风的热情。5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透露说，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各机关党委书记开会，以决定如何扩大整风。会议在整风的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在讨论如何进行这次运动时，会议决定成立以习仲勋为首的国务院机关小组，而没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作出任何决定。

运动期间，反对整风的人把精力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如何保证坚持“和风细雨”的政策问题；领导人是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问题；整风妨碍正常工作的问题。《人民日报》公开赞同整风，但是在按照反整风势力的愿望论述这三个问题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可能是因为毛的要求，该报确实转载了上海党报一些强烈赞同整风的社论。

而赞同整风的阵营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是让非党人士参与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下从5月8日开始，党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对党进行了批评。于是，在各类机构的主持下，中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座谈会。5月13日，文艺界主要宣传官员周扬对中国作家协会作了重要讲话。他鼓励批评者说：“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①开门整风就这样在进行。但一个月后，毛不得不同意

---

① 《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第502页。——译者注

对那些批评者作出反应；6月7日，中央委员会秘密指示停止整风。

到5月中旬时，赞同整风的力量已在领导人应该参加体力劳动问题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不过，他们的对手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这些人用事实证明，整风妨碍了工作。然而，一直到5月19日，毛看来仍感到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舞人们继续辩论，并批评了那些忧心忡忡的党员。该报还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于6月13日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但在5月19日至25日期间，高层领导人，也许包括毛在内，改变了初衷，5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决定推迟到6月20日举行，同时，毛本人对批评者发出了警告。在对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讲话时，毛说：

>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胜利。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这段引文里所强调的那个句子具有极大的意义。但为什么要发出这个警告呢？再说，它所指的又是谁呢？

毛对青年领导人讲这些话表明只有年轻人才最受关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15日会议开幕那天与青年团领导人交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原注

谈时，他却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语。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事是北京大学——中国的最高学府——开始了大鸣大放，并波及到其他大学，发展十分迅速。5月19日，由于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的鼓舞，北大学生开始把大字报张贴在著名的所谓“民主墙”上。据一位在场的西方观察家说：“人们长期压抑的感情、渴望、痛恨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每天都要张贴好几百张大字报。这扩大了运动的对象，并攻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所提出的问题中，有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有党在教育机构的僵化领导问题；有固守苏联教育模式的问题；有学术课程过分政治化的问题；有党的干部对非党师生的“宗派”态度问题等。很快，学生们便开始讨论自身以外的问题，诸如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生活水平是否真正提高的问题等。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来到北大的“民主广场”讲演。林小姐是最坦率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之一，她提出已在1955年被谴责为反革命分子的作家胡风一案。她肯定地说，胡风实际上并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他的案情应该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谈到胡风时，她断言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不再适用。她还指控一些党员想压制人民，采取愚弄他们的政策。

在即将结束讲演时，林希翎小姐说：“北大已经行动起来，这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的学生也动起来了。”这是使高级领导人十分担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份揭发材料中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说，5月25日，当刘少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讲到年会将推迟时，他提醒观众说：

> “……更好地进行整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就会有人上街游行……各类学校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工人群众最好行动得慢一些。如果工人群众、中小学教师和其他群众、团体动员起来了，我们就无法坚

守阵地了……。我们如果不控制局势，马上就会有百万人行动起来，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那对我们是不利的。”①

刘少奇所表露的忧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直到5月25日，学生们由于不知道外地学生在干些什么，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约束。两天前，林小姐在演说时就曾抱怨说，我们无法相互取得联系，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消息被封锁了。

由于5月26日的《光明日报》和5月27日的《文汇报》报道了北大学生的活动②，很快影响了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形势马上就发生了变化。6月2日，一些北大学生还到天津去鼓动那里一些大学的学生。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知道自己是在点火，但他们根本不顾毛对青年团代表的讲话，即“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句话已经用白体字写在北大“民主广场”上）。

学生们的大鸣大放活动很快达到顶点以及在很多场合引向了反党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开头最关键的几天里，最富有经验的青年团干部（他们本可以把争论导向更稳妥的战线上）正在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这些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回到校园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到5月27日，北大已经张贴了从纽约《工人日报》摘译过来的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尽管北大党委一两天后就将它们撕掉了，但是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却在北京地区高等院校里迅速传播开来。

---

① 作者原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册子《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未查到原件，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光明日报》的报道题为《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文汇报》的报道题为《北京大学“民主墙”》。——译者注

当毛和同事们观察到这种骚乱的动态时，他们一定会想到两个令人担忧的先例。一是匈牙利事件；1957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和1956年匈牙利国内的形势是迥然不同的。但匈牙利的动乱表明了知识分子和学生是如何向党发动猛烈攻击的。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正在模仿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裴多菲俱乐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这样做尔后受到攻击。近在本国的先例，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7年5月，当学生骚乱愈演愈烈时，中国所有领导人都不会不记得自己和同事们大约在40年前通过示威争取到了什么。可以肯定，周恩来是不会忘记这些的；5月30日，毛对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说：“对这样一些人应该有一定的限制。”①

6月6日，一些党外的政治、教育界高级领导人开会讨论时局时引证了匈牙利事件和五四运动。据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他应该是消息灵通人士）说：

> “学生如今有很多问题，并且已达到了饱和点。他们一旦上街游行，城市居民便会参加进去，形势会更加恶化。因为现在群众也对党不满……党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众。除此之外，还有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因此，时局一触即发。目前的情况很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前夕。很有可能党错误地估计了目前的整风运动。党可能认为高校知识分子会带来许多问题而青年学生却肯定不会带来任何问题。结果却正好相反，党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上海的形势可能比北京更严重。”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曾昭抡有关中共对整风运动发生的逆转会感到吃惊的估计，

---

① 作者原引自埃德加·富尔的著作，现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② 作者原引自英文文献，现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后来他被指责为两个主要右派头子之一）同意曾的观点并补充道：

> “目前的整风运动要求党外人士发表意见。我认为其后果被德高望重的毛所估计到了：民主党派总会很温和地提出问题。不过，这个估计并不全面。没想到党会犯这么多错误。”①

与会的另一位教育家是清华大学（首都的主要学府之一）的副校长，他说一些家长给他来信，要他劝他们的孩子不要去闹事。“我劝过了，但学生们决心已定。看起来真像‘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不听父母的劝告，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不接受我们父母的意见一样。”还有一位与会者根据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见闻说道：“有人说目前的形势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正如批评家后来所说的那样，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有可能看到了在这一危机中跻身政坛的机会。章伯钧好像感觉到他和他的民主同盟如果帮助中国共产党把学潮平息，他们的影响就会扩大。然而也正如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并没有被所发生的事件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地过高估计形势的严重性。但6月12日至13日湖北汉阳发生的学生骚乱（煽动者称之为“小匈牙利事件”），一下子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当章伯钧等人试图向周恩来靠近，愿意助一臂之力时，周恩来不愿意表态。然而，政治局的许多成员一定私下里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6月6日会议对局势所作的估价的。

这一假设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5月25日，毛和刘分别发出了公开和私下的警告；二是刘少奇估计大学师生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他否定了来自大学师生方面的危险，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共一方面让林业部部长罗隆基

① 作者原引自英文文献，现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和章伯钧（反党阴谋的两个领导人之一）于6月3日（即对右派的反攻即将开始之际）出国，而另一方面却严厉地惩处了反攻中持不同政见的学生。一个月之后，1000名党的重要官员被调到大学工作，其中200人被授予校长或副校长之类的高级职务。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另一项决定要求每个高校毕业生在分配工作之前都要经过政审。

对"五四"式迸发的畏惧可能使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相信有必要进行反攻。但毛可能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无根据的；陈伯达参观了北大校园，说新华社《内部参考》有关学生骚乱的报道是夸大其词。此外，毛公开表示他丝毫不在乎骚乱。然而，由于毛未能像他向党保证的那样去进行"和风细雨"运动，他的地位受到了影响。而且中共干部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毛不得不同意进行反攻，把这次受挫的气都出在那些报纸上，正是这些报纸的报道使得运动愈演愈烈了。还是在5月中旬，毛就针对报刊中的修正主义问题写道：

>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①

值得注意的是，反右开始后，毛以谴责《文汇报》的形式公

① 见《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译者注

开地（但没有署名）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不满情绪。

也许为了对这一反党批评狂潮加以反击，党不得不宣称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反党阴谋。但是选择两个非党员部长章伯钧和罗隆基作为这一阴谋的领导人，也许是因为他们俩和在“大鸣大放”中起主导作用的党外报纸有联系。章伯钧是《光明日报》社的社长，该社的编辑因派记者到9个城市去举行批评座谈会而受到攻击。罗隆基由于老友、《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小姨子）的关系，在《文汇报》社里影响很大。

第二节 “和风细雨”问题

整风运动开始时，其反对者并不知道在5月底以前他们就能得到强有力的论据来要求停止整风。结果，他们找出了一些问题，并以此作为争取缓和运动进程的依据。“和风细雨”是这些问题的头一条，后来证明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两个月前，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使用了“和风细雨”这个词。他把它与“小民主”（即整风指示里所倡导的同志式的谈心活动）相联系。然而，和刘一样，毛也曾设想了“大民主”（即大规模的批斗会）的必要性。——哪些地方如不使用“大民主”，官僚主义就无可救药。但是整风指示却禁止使用这类方法。显然，为了让整风更能为党员所接受，毛作了很大的让步。然而，不少党员仍然忧心忡忡，因为毛暗示中共一直是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对待资产阶级的。但也许理论上是如此，而实际上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从5月份人们对党提出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连毛本人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比因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的秦始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5月7日，《人民日报》在题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的社论反映了党员的忧虑。为了解释整风指示为什么

强调使用这一方法，社论说如果党不行动起来改正不良的工作作风：

> “这对于一个以服务于人民为自己的天职的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自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党为要整顿自己的作风，就片面地强调给予所有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甚至用纪律处分代替思想教育，形成了惩办主义，这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危险的。”

实际上，社论在此将粗暴的对待人民群众和粗暴的对待犯了错误的党员这两种后果的严重性等同起来了。然而，毛发动整风运动，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粗暴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而不是后者。

接下来，社论引用刘少奇向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强调采取过分严厉的而又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干部犯错误的思想问题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为了让忧虑的党员相信毛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社论说：“我们党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就确定了对待党内错误的正确方针。”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论这么说就暗示了毛和刘少奇尽管在整风运动上意见有分歧，但他们在如何对待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一项关于整风运动扩大会议上讲话时，突出强调了毛的反对者所关注的“和风细雨”方法的重要性。《人民日报》有关彭真讲话的报道几乎一半是讲这个问题的，并引用他的话说，“和风细雨”的做法，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特点。① 这就点出了党员的忧虑所在。只要有人说“和风细雨”

---

① 《彭真同志谈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译者注

方法是以前思想教育运动的特征，他们就不自在。彭好象是在说这是一个新方法、因为他不能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一点，如果这样就会指责了前一次的整风运动。

《人民日报》把有关彭的讲话的报道放在头版上。在这二版的"党员来信"栏目里刊登了一封要求弄清政策的来信：《应该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再次对党员干部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来信人曾志问："究竟怎样做才是和风细雨呢？是不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这封信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总结了干部们的忧虑，这封信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来信人的身份，尽管该报没有说明曾志是谁。实际上，她就是广州市委的一位高级官员，更有意义的是，她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夫人。

这封信，加上中共广东省委在体力劳动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将在下面一节讨论），说明彭真和伏罗希洛夫4月底的广州之行有着很重要的政治意义，甚至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可以看出，彭陪同伏罗希洛夫南行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摆脱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如果他觉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他可能也要和陶铸商量一下。

刘少奇和彭真似乎有意被描绘成"和风细雨"政策的维护者，而广东省委通过陶铸夫人的信，也介入进来，进一步强调了维护者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然而，把刘，可能彭也在内看成是那些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绝对保护者，未免过于简单了。5月7日，刘少奇告诉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和他的一个同事说：

"对原则问题要搞清楚，但方式一定要好，不要伤感情，不要损害人家的自尊心。同时，也不要因为采取这种'和风细雨'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对原则问题马马虎虎。解决思想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就是既要团结同志，又要分清是非。在执行中存在的偏向，往往是有了这一头，就没

有那一头。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是很大的艺术……只有一头是不行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同样，如果认为陶铸、刘少奇、彭真三人对所有整风问题的看法都一致，这也未免过分简单了。陶4月份在广东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与毛的观点要比与刘的更接近一些，而且他同邓小平一样，明确承认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与刘的看法相反。刘、邓、彭团结起来，只是为了反对可能使共产党陷入混乱的过热的整风运动。当“和风细雨”的政策失败后，毛只好同意停止整风运动。

第三节　体力劳动问题

整风指示的另一个特征是它要求领导人员抽出部分时间进行体力劳动。这是“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②指示说将发一个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门指示，这足以证明这一问题对毛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党的主席又遇到了来自刘少奇、彭真和陶铸的阻力。

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同群众共甘苦》的社论。社论说，参加体力劳动是领导人员避免与群众脱离的重要途径。在追溯到延安时代干部就参加体力劳动时社论问：“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他们（指领导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接着，社论便开始阐述与

---

① “1957年5月7日与高级党校同志的谈话”。——译者注

②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译者注

群众共甘苦的重要性，并从刘少奇在八大的报告中引用了一大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

> “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引人注目的是这段引文里竟没有提到体力劳动。在刘所描绘的图画里，领导是一个有无限自我牺牲精神的、有理解力的人，而未必真要去参加体力劳动。诚然，我在引文里所强调的第二句话表明，对领导人来说，具有刘所列举的品质已经足够了，也不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当然，刘是在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讨论这问题时讲的这段话，没有提到体力劳动也不是他的错。然而，有趣的是，当1957年情况已经变化时，《人民日报》却单单引用了刘这一段忽略了社论的中心议题的讲话。社论的题目暗示了什么？为什么要引用刘的话？这些问题在社论中紧接着上述引文的最后一段里就变得更清楚了：

> “每个领导人员一定要做到关心群众痛痒，同群众共甘苦，并且尽一切努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把自己同群众中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都打破吧！把阶级社会遗留的影响尽快地象清除垃圾那样扫除掉吧！放下“官架子”，走到群众中间去吧！”

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但是又没有讲到体力劳动。同样有趣的是这篇社论里有关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例子全都表明下级官员

忧虑重重。

这篇社论表明人们正在争议忠诚的党员参加体力劳动究竟有多少必要。社论还表明那些认为没有必要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在强调领导人是多么的忙。他们可能希望在体力劳动的指示里插入一个条款，以便让那些说没有“时间和机会”的干部免于参加体力劳动。

整风指示公布后，人们争议了两个星期。5月4日，即《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河北省（该省环绕着北京）和天津市的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事迹①；第二天他们的照片就上了《人民日报》。这则新闻好象使中国其他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认识到体力劳动是逃脱不了的，这是因为《人民日报》后来发表了一篇10省综合报道，说5月5日是其他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最早的日子。5月7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和政委朱良才将军参加了体力劳动。但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却没有刊登他们的照片。彭真落在附近的河北省和天津市第一书记的后面，这已经显得很清楚了。到了5月9日，彭真终于参加了体力劳动，《人民日报》这才刊登了两位将军的照片。彭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其他官员做了一些修路工作。5月10日，《人民日报》登了他劳动时的照片，并且用黑体字刊印了他劳动时所讲的话：

“我对体力劳动还很熟悉，从小干过十多年的庄稼活。在延安的时候，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干部都下地劳动，现在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好的传统。”②

---

①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黄火青。——译者注

② 《领导人员和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译者注

直到现在，《人民日报》才发表了10省综合报道。这篇文章揭示了这10省的第一书记差不多都比彭早一些参加体力劳动，有的要早好几天。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得出一个更重要的结论，即中国还有一半多的省份和省一级城市在这一问题上仍在观望，看风向将向哪一边吹。

广东是在体力劳动问题上迟迟不肯表态的省份之一。其党委领导人只是从5月11日起才开始参加劳动，这事发生在《人民日报》报道彭真的事迹之后。5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制定了自己的体力劳动纲领，尽管整风指示里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央即将发出体力劳动指示。这样看来，广东省委似乎只想抢先订好自己的指示，以便来影响中央指示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的有关广东省委参加劳动的一篇长长的新闻稿里竟然没有提到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的名字，这与5月10日《人民日报》的有关9省体力劳动的报道是十分矛盾的——这些报道要简短得多，而且每篇里都直截了当地点了省委第一书记的名。

广东的体力劳动计划发表在5月14日的《南方日报》上。就在同一天，中央在北京发出了体力劳动的指示。广东的计划规定所有60岁以下身体好的人每月平均参加两天半的体力劳动。在中央的指示里没有年龄规定，而是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中央指示说："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指示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反对意见根本不予考虑，并且没有提有关体力劳动的"时间和机会"问题，而且还特地把中央委员也纳入规定之内。刘少奇和彭真可能曾经试图使中央指示以工作忙为理由而不要把中央委员包括进来。然而，当中央指示在5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时，刘少奇表示赞同。他对一位青年团领导说："你们不参加劳动，就做不好青年工作

啊！”①

现在，两个保护党内干部利益的人（刘少奇和彭真）都支持体力劳动政策。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体力劳动问题的第二篇社论。这一次，社论的题目确实强调了体力劳动——《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同时，社论证实了只有身体不好的人才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我一直未能明白广东省委为什么要以60岁年龄为限，以及陶铸为什么不公开表明他是支持体力劳动政策的。这未必意味着陶通过逃避劳动来违背指示（一旦刘和彭同意体力劳动政策，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是这表明他希望让人知道他仍然不同意此项政策。

第四节　整风与工作的关系问题

反对整风的一些人通过提出“和风细雨”和领导的体力劳动问题，试图减缓整风的冲击力。当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未奏效后，他们又做出了削弱整个运动的新尝试，提出整风危害了重要的经济工作。整风指示说：“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应该注意到，这个指示目的是想把整风和工作都搞好，但是实际上整风运动一直是居于首位的。

5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提议，这些机关已经表示愿意当整风运动的协调者。《人民日报》报道说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弄清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接着，《人民日报》暗示之所以有这一混乱是因为一般干部对把整风日期从1958年提前到1957年5月没有思想准备。这就巧妙地讽刺了毛坚持要提前整风。一个星

① 《最亲切的会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译者注

期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整风和工作要两不误》的本报评论员文章①。该文章的题目把整风和工作的位置放对了，但是在正文里，"评论员"却说错了：中央在关于整风的指示当中，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的原则。这一词序的颠倒在正文里出了几次。很明显，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评论员"争论的重点是一些国家机关的整风太过分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党委规定每周两、三个下午学习，但是有的机关规定每周学习三天，或者学习五个下午。有的机关每到学习时间，工作就完全停顿下来，电话也不接，整个机关没有一个主要干部值班。"评论员"说，这种现象应该防止。一般来说，"评论员"是不可能捏造政府机关对整风过分热心的事实的。不过，《人民日报》也许想趁此机会指出整风的危害，批评周恩来的下属。

这一假设从当天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编辑邓拓批评"庸人政治"的匿名文章②可以得到证实。邓拓所说的"庸人政治"指的是一些干部爱管闲事，他们不管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当时，有些干部只想着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无休止地开会、谈话、写报告等等，忙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很明显，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他所想到的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并且他还叫人们等这些庸人冷静下来。然而，他承认要坚持好的政策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面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③他提倡对不懂的问题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他又承认要有这种态度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而这样就很容易被人攻击为放弃领导权。毫无疑问，这是对毛的尖锐讽刺。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译者注

② 指《废弃"庸人政治"》（署名：卜无忌），《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译者注

③ 同上。

这两篇文章的含义是干部不应该让整风搞乱他们的日常工作。除了广东省外，还看不出这一启示对其他省市有什么影响。已知的证据表明广东省委可能联合了《人民日报》，以推动反整风与赞同工作的浪头向前翻滚。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来自广州的新华社报道。报道说广东省委常委决定保证整风、工作两不误方针，避免“狂风暴雨”和“赶任务”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些现象，5月17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那两篇文章的一星期内），广东省常委同意将整风时间延长，订在6月份开始，9月份结束的单位改为5月20日开始，11月份结束。奇怪的是广东省正在改变的是一个尚未公布的整风计划；广东的整风计划是在5月15日制订的，但直到5月20日才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如果新华社的报道准确的话，如果广东省委常委在两天之内就制订出了一个整风指示，并决定修改这一计划的话，那么有趣的是广东省委常委发表的不是这一计划，而恰恰是计划的修正案。奇怪的是这一计划本身没提到修改的原因；计划里也没有对“狂风暴雨”和“赶任务”现象进行警告。这就说明人们有意给新华社记者讲了广东省委对“和风细雨”方法以及整风与工作问题的忧虑。广东的整风计划里有关体力劳动的那一段进一步表明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态度。广东的计划并不想依照更为严格的中央指示去废除60岁以上的领导人员的特权。

《人民日报》没有报道任何省份跟着广东走。一个星期以后，该报更进了一步，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社论。这次该报没有那么大胆地颠倒词的秩序，把工作放在整风前面，而是十分明确地说出了它的意思。显然，《人民日报》所主要关心的是工作，而不是整风。该报从广东手里接过接力棒，主张为了不妨碍工作，整风运动就得延期。该报再一次把中央国家机关拿出来批评了一番，甚至指责了那些每星期仅仅只用两个下午进行整风的绝大多数单位，理由是如果它们在二、

三个月内如期地结束了整风运动，他们的整风只能是非常肤浅的。其次、《人民日报》主张在紧迫任务（如防洪）出现时应该停止或起码要减少整风时间。

由于社论要比"评论员"的文章权威得多，这一主张更快地得到了响应。第二天，即5月28日，新华社报道说由于夏收夏种季节已经到来，河北省委决定推迟整风检查。5月29日，河南省委作出了同样的决定。5月30日，《人民日报》透露了新疆也以类似的理由采取了类似的方法。①

当然，《人民日报》所主张的政策是很切合实际的。即使毛本人也不愿意整风妨碍收获。再说，要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去让整风影响农业生产也是不可能的。通过发表社论，《人民日报》把自己的权威借给了那些吃不准整风的省委领导，让他们逃脱整风。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方针并没有正式取消或修改。不过社论已经指出在实施时它将怎样被削弱。应该记得，中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让人们卷入闹哄哄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让人们牢记运动目的的紧迫性。在城市里，这就意味着停止日常工作，不过这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通过鼓励官方延长整风运动，《人民日报》提倡了必然能够减轻运动影响的措施。总编邓拓也许认为自己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担心整风运动的进程。

然而，毛的支持者们对于《人民日报》越来越多的攻击显然并不服输。6月3日，周恩来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增产节约的指示②，这是在工作与整风问题上的最严重的冲突。

---

① 《河北、新疆具体安排不让整风妨碍夏收》，《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译者注

② 《国务院发布指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译者注

由于官方党报说整风普遍危害了工作，特别是使得中央国家机关长期停止工作，人们一定会想国务院这个指示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然而，很明显，指示忽略了这一问题，同时却把周恩来在此问题相反的意见阐述得十分清楚。

开始，指示宣称增产节约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获得初步的效果。"（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指示承认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接着又列举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并没有包括因为政府部门过分整风而耽误工作这一项。相反，指示接下来充分肯定了整风，说它是增产节约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固然与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所造成的。因此，整风运动的开展，就必然为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造成顺利的条件；同时，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又可以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整风运动收到更大的收获。"（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这里，周恩来拒绝承认整风给生产带来了任何有害的影响；刚好相反，他断言整风运动必然会给经济建设创造适当的条件。他这么说的理由是经济错误不仅与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三害"所造成的。

《人民日报》不愿照此办理，就紧接着刊登了一篇社论，用不同的观点分析了这一指示。指示的题目只不过是《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社论则通过《整风运动要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这一题目表明了自己的忧虑。社论的这一题目暗示了国务院的指示是为了制止整风运动和发展增产节约运动。但是，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指示并没有这样暗示。一开始，社论就十分敏锐地指出指示是"很适时的"。社论打破了常规，没有列举增产节约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支持指示所说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只是草率地说道："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但是，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样，社论就没有引用指示恭维整风运动的两句话。不仅如此，社论甚至用"有了"效果代替"获得"效果，使得指示所说的整风的作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接着，社论转载了指示的一整段话，说这段话说明了增产节约的意义。但是接下来社论开始含蓄地批评所引用的那段话的观点。

鉴于国务院的指示强调了整风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性，社论则断言国务院一些部门因为整风而耽误了增产节约运动：

>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同时进行两种以上重要工作的时候，决不能把两种工作对立起来，借口进行这种工作而放松那种工作。最近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就只顾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而把增产节约运动搁在一旁了；有些只制定了增产节约的方案，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连方案还没有制定。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加以改变。"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接着，文章批评了政府机关破坏了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以前的那样紧密联系，还说经济部门的工作应该是管经济。在批评政府机关之后，该报含蓄地暗示了1957年5月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大可不必的：

> "其实，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原来就是紧密联系

---

①② 《整风运动要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原注

的。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要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就是要反对铺张浪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整风指示确定'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对于经济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不过，《人民日报》对国务院所说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是由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加强整风就必然会给增产节约运动造成有利条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人民日报》并没有避开这一点，而是把责任一方面归咎于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归咎于"三害"：

"经济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等缺点和错误，固然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同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从领导思想来检查，也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毫不奇怪，社论和指示不一样，它没有继续争论整风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性，只是退了一步，承认目前"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必须帮助领导人员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6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是说国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且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它引用八大的政治决议里的话（包括使毛生气的那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社论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整风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不是像周恩来所说的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在这个争论中，《人民日报》很快得到北京市委的支持。

6月5日，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正式贯彻国务院指示。实际上，这是为了强调《人民日报》社论的主张。北京市委承认

了它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缺点，指出："最近期间，有些部门因为忙于整风，更是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① 北京市委对国务院指示强调的整风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性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据《人民日报》报道说，在提到整风运动时，北京市委谈到要"认真"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方针。这篇报告的全部大意表明，所谓"认真"的最好表现就是不要让整风妨碍生产。

在北京市委开会的同一天，《人民日报》成功地暗示了那些热衷于搞整风的省份是在一味地蛮干。该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它转载了江苏省的省报《新华日报》6月1日的社论和刊登了一则有关江苏省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报道。社论的题目是《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这篇社论一开始就敲响了警钟，号召人们行动起来：

> "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这一伟大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决不允许满足现状，决不允许迟疑不前，更不允许畏缩后退。"②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接着，社论用大部分的篇幅继续用这种腔调主张继续进行大鸣大放，直到最后一段话社论才谈论了当前的繁重的工作负担问题。在交待了今后几个星期里将要做的农村工作和其他工作之后，社论说："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整风运动中牢牢抓住上述任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社论接着承认有些单位得临时中止整风去完成经济任务，但它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用不了省委下令普遍放慢整风步伐：

---

① 《增产节约必须贯彻全面观点》，《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原注

②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原注

"暂不进行整风的单位一定要集中全力搞好当前生产和工作，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解决迫切需要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一方面为本地区本单位的整风运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正在进行整风的单位，能够顺利地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很显然，江苏并不是希望所有的单位都要停止整风。

《人民日报》把自己有关江苏经济问题的报道刊印在这篇转载的社论之上。有鉴于《新华日报》的社论说眼下的农业任务只是"十分繁重"，《人民日报》则说江苏的形势"十分紧张"：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十分紧张的阶段，夏收、夏种、夏播等工作几乎是在同时期内进行，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误了农时，将会造成极大损失。"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人民日报》的报道接着评述了江苏的问题，只要读了这第一段的人再去读转载的社论，都能理解到：尽管江苏省面临着经济困难，但是省委却想着整风，耽误了重要的农村工作。

不过，周恩来支持赞同整风的各省领导。6月10日，国务院又颁发了一个指示②。这个指示是有关抓紧领导农业生产的。指示指出目前已处于农事紧张的季节，并承认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尽管指示同意一些干部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上去，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整风运动将被搁在一边：

---

① 《江苏农忙中的问题需要抓紧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原注

② 《国务院指示各地抓紧领导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注

> “搞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各地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必须抓紧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切实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省级领导机关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力量领导农业生产。县级整风推迟到省级整风以后进行，更应该用全力领导当前的农业生产。”（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人民日报》有关这一指示的社论，通过一个模棱两可的题目（即《整风不能误了生产》）又点出了问题的中心。社论说：“怎样保证整风运动同争取大丰收的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是当前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① 该报强调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把它说成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打破了指示的公式。说明了这一点之后，该报接着说：“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使整风与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而不要因为整风贻误了千金一刻的农业生产的紧要时机。”② 社论赞许地列举了河南省领导人的行动，说他们同意必要时可以中止会议或将其延期。

国务院指示暗示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县级以下集中了农业生产的基层领导，他们还没有开始整风。有必要的只是保证上级省领导仍然能够监督下级。社论却没有那么乐观：

> “过去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运动进展期间，下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往往因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忙于运动，而被搁置或积压起来，等到运动告一段落腾出手来的时候，生产已经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在这次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偏向，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凡是涉及当前生产的问题，都要及时加以解决。”

---

①② 《整风不能误了生产》，《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原注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争论主要还是理论上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一系列社论的头一篇社论。事情很快就明朗化了：毛和周原先设想的整风运动将会取消。但是，有关工作和整风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反击开始或更晚一些，这表明这个问题并没有促使斗争方向起变化。

第五节　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

党的领导人在整风耽误工作方面的意见分歧不可能引起对党外批评者的进攻。这次反击是由学生骚乱激发起来的。党可以平息校园的风暴，但是其本身的士气和权威都因为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不断揭发而受到了损害。在这个紧要关头，即使是那些支持整风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本人）都可能改变主意。

当时，政治局有17个委员和6个候补委员。其中6个是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里，毛、周恩来和邓小平向来是政策的策划者。陈云由于在私有工商业国有化的第一阶段里主张和国内的工商业者搞好关系，因此他一向支持减轻对资本家压力的政策。在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的主席台上，陈云坐在周和邓的中间，这又一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刘少奇在整风问题上对毛的反对已经有文献所证实，而且在整风运动开始后有进一步的证据说明了他的态度。当他在高级党校与杨献珍讨论工作与整风问题时，他说学生要读书（即做正常的理论工作），同时也要改进工作方法。在这里，他把读书放在改进工作方法的前面。据说，"文化大革命"时刘还支持杨献珍拒绝康生要求党校中止研究计划，集中学习毛有关矛盾的讲话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刘在与杨献珍谈话时曾经两次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同志间的矛盾。这表明即使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他和陆定一早先一样，仍然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整顿党内干部。

考虑到学生骚乱对于整风运动的结束所起的作用，刘5月份在对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讲话时说了一段很露骨的话：

> “有人说，你们打过了游击，好是好，就是摆老资格，有官僚主义。这话也不假，你说他打过游击，有官僚主义，那你们没有打过游击，住在城市里有没有官僚主义呢？我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高，我只是中学毕业生，我的同学有大学毕业的，他们有没有官僚主义呢？没有上山打游击的人，我看官僚主义也不会少，不只是官僚主义，恐怕还有资本主义呢？我们呢？只是有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恐怕只有很少一点。”①

在这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对学生居然批评那些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老干部而表示出的一种憎恶，这种憎恶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如别人而更严重了。

政治局常委里还有一位委员是朱德。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他，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不过，5月7日他在给中直机关青年积极分子讲话时并没有提到整风，也没有提到什么矛盾问题。因此，整风运动开始时，政治局常委里有4个委员是支持整风的，有一个（也许两个）是反对的。

政治局有其他11位委员，其中两个好像病了，即林彪和陈毅。他们两位可能没怎么参加讨论如何发起整风运动。不过，陈毅确实公开说过毛提出的矛盾问题和准备整风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林彪，由于从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和毛很亲密，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支持毛，因此他毫无疑问是拥护主席进行整风的。

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上除了没有刘少奇、朱德和林彪外，彭

---

① 《对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的谈话》。——译者注

德怀也没有。彭好象是反对整风的。5月29日在军队会议上讲话时，他赞同毛的矛盾论，但不赞成整风。更主要的是，没有报道说他领导了军队的整风工作。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整过风，但这只是彭的部下干的。应该记得，1957年1月批评毛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是军队的宣传干部。如果他们知道国防部部长是支持他们的，他们这么胆大就更容易理解了。至于72岁的党内元老林伯渠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好像也是对整风持保留态度的。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采访时，他强调了“和风细雨”方法，说它是“十分重要”和合理的。他还说“很多同志可以改正他们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句话好像是否定了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尽管他承认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权，问题会比以前整风所遇到的要多些，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这样党外人士就可以参加整风了。林好象是想批评宗派主义，即歧视党外人士的错误。他只有一次是按照整风指示顺序那样列举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三害”，其他时候他都把宗派主义列在最后，或者是将其省略掉，只提其他两个弊病。通常，党的指示的标准公式是不能随意对待的。

至于最高国务会议照片上所缺的第三个人罗荣桓元帅，好像没有什么有关他态度的线索。从1956年9月的八大召开到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来华，他都没有公开露面，这表明他可能是病了。他从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63年61岁时去世，都只是出于礼节而参加一些活动。还有一位可能病了的元帅是刘伯承，在此期间他很少露面。和林彪一样，他只是在伏罗希洛夫来上海时才出来欢迎他。

在政治局的正式委员中，彭真很明显是反对毛整风的。70岁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也许比较矛盾，但他是忠于毛的。在最高法院里他亲自领导了整风，不过他和林伯渠一样，把“三害”的秩序弄颠倒了。董排的秩序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

派主义，他好像是想强调思想问题（主观主义）以及打破对非党人士的不公正待遇（宗派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者要求重新审理反革命案件，因此董用这种秩序排列"三害"表明了他在担心司法人员的命运。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贺龙元帅坐在主席台上，他可以说是支持整风的。政治局还有两位正式委员是管经济工作的，即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在5月31日开始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鼓励整风并且用正确的秩序排列了"三害"。但是，他把错误很平均地归咎于"三害"和经验不足。因此，在国务院6月3日的指示和《人民日报》6月4日的社论中间，他所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整风期间财政部长李先念在公开场合下只讲了一次话，即代表中央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讲话。但是，由于他讲话那天才颁布整风指示，因此他没有提到整风运动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他有关处理矛盾的简短谈话是值得注意的：

>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对于自治区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地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各民族人民服务。"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正如毛所需要的那样，李把官僚主义放在首位，但是他把主观主义放在第二位。以"大民族主义"（即汉人对蒙古人的歧视）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也许是应内蒙古地方党委领导人。政治

① 见《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原注

局候补委员乌兰夫的要求才提出来的。

另一件能说明李先念态度的事情是他在反击批评者开始之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预算报告。在报告里，他插入了有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的话语，但他没提到整风运动，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热情就不像周恩来那样高。周在大会上作报告说：

> "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

总的说来，李先念可以算一个整风的支持者，但是热情并不高。只要整风的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党外知识分子、工程师以及工商业者（他们的合作对搞好五年计划是至关重要的）的关系来促进经济建设，那么，李富春和李先念都可以说成是支持整风的。另一方面，如果运动扰乱工作，特别是经济困难的时候影响工作（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不会特别满意的。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话语与另外一个主要的经济计划者，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相比较，这两个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要积极多了。

5月9日，薄一波在四川作了一个题为《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何进行整风》的讲话。两天以后，这篇讲话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薄号召全体干部：

> "特别是经济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克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薄一波说："勤俭建国是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总方针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影响国家的建设。"（着重号为作

者所加）

接者，薄讨论了一些实际问题和缺点，他说它们“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主张“除了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之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解决办法。

薄这篇讲话的目的好象是想强调整风对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有些已经在整风指示里提到过了）以及什么是整风的主要目的（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就巧妙地说明了生产比整风更重要。这个问题在《人民日报》的“党员来信”①栏目里提出来只两天之后，薄的讲话就发表了。来信人是一个名叫郭芮的党员（此人身份不详），他说检查中央整风指示所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单位既可以检查本部门执行政策方针中间的问题，又可以检查本部门中领导和群众之间、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来信人说他赞成前一种方法，《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称之为“重要意见”，并且还号召人们继续发表其他意见。对许多读者来说，《人民日报》两天以后所报道的薄一波的讲话是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对郭芮的意见的支持。

5月16日，李富春在重庆发表讲话之后，薄又作了一些补充发言。他也是把“三害”顺序说错了。据《人民日报》报道说：“他认为目前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基本关键，是在于克服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里他漏掉了“三害”中最重要的一个，即官僚主义，而且把宗派主义放在刘少奇最喜欢批判的弊病主观主义之后。有意思的是，薄所说的生产和经济的

① 郭芮：《整风检查从什么地方入手？》，《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译者注

基本“关键”是在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与6月3日国务院指示说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很相似，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薄并没有提到整风运动。

6月初，也许是因为听说中央已经决定对批评者进行反击而鼓起了勇气，薄一波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整风运动的态度。他在李富春主持的计划会议上讲了话，傲慢地驳斥了那些批评者，并把缺点都归咎于经验不足，在此以前，他却还在责备那“三害”。和李富春不同的是，他表面上不止一次提起过整风运动和人民内部矛盾；和李先念不同的是，他7月1日在人民代表大会讲话时却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和彭真关系密切，薄一波受到攻击。因为他们俩30年代都在华北工作，而且又是老乡，政治局里只有他们是山西人，因此说他们关系密切是有道理的。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整风运动。

政治局的其他几位候补委员可能有两位是支持毛的。陈伯达和毛的特殊关系前面已经讲过了；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康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益）1957年春天到天津和高级党校去支持毛。但是，中宣部长陆定一1957年3月表明自己不喜欢毛的整风形式；他未能迫使邓拓发表毛的讲话。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同，他在运动期间的沉默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整风运动强调要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好像是支持整风的。当他在4月30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写贺词时，他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今后的任务之一。同一天，他在呼和浩特发表讲话时说：

“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强人民团结，必须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必须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和李先念在同一场合的讲话一样，乌兰夫把“三害”的顺序弄混了，不过他们错的方式不一样。乌兰夫和刘少奇一样，通过强调主观主义，把重点放在干部思想问题上。5月20日，《人民日报》的新闻里报道了内蒙古党委两天前通过一个“新的”整风工作计划。这也表明了乌兰夫的态度。报道在解释为什么是“新”计划时提出：从1956年12月到1957年3月，内蒙古党委曾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和精简机构为中心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就暗示了新整风运动是多余的。6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说明了这个意思。《人民日报》的报道还进一步暗示了整风的宗旨是要直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要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最后一个能表明乌兰夫立场的例子是反右开始之后，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没有提到矛盾问题或整风运动。

政治局还有一位候补委员张闻天，他的态度好像没有清楚地表明过。不过，30年代他是毛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党的八大时，他被撤销了政治局正式委员的职务。后来，大跃进之后，他是批评党的主席最严厉的人物之一。说他不可能在什么问题上热情地支持毛，以及说他在整风期间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不满，都是合情合理的。

基于这些支离破碎的公认的证据，下面这个表可以表明政治局委员对整风运动的态度：

---

①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原注

正式委员

赞成和也许赞成	含糊而又忠于毛	反对和可能反对	不肯定
毛泽东	董必武	刘少奇	(罗荣桓：病了?)*
周恩来	李先念	朱　德	(刘伯承：病了?)*
陈　云		林伯渠	
邓小平		彭　真	
(林彪：病了?)*		彭德怀	
(陈毅：病了)*			
李富春			
贺　龙			

候补委员

赞成和也许赞成	含糊而又忠于毛	反对和可能反对	不肯定
陈伯达		乌兰夫	
康　生		张闻天	
		陆定一	
		薄一波	

* 括号表明此人在政治局有关整风问题上的争论中不起主要作用。

如果这种排列比较准确的话，那么毛很显然处于弱势。政治局里有9个正式委员支持他，其中可能只有5人是坚决拥护他的，在辩论中也很活跃，而反对毛的有5个正式委员。如果政治局举行投票表决，候补委员可能不会参加，但很明显他们的意见是起作用的。如果把候补委员加进来，12个委员支持毛的整风，9个反对，还有两个不肯定。因此，他知道支持自己的力量不大，这更使他怀疑是否要继续整风了。在1955年夏天和秋天里，毛面对着同事的反对，一个人发起了集体化运动。现在的形势和那时的刚好相反。那时成功使得他的大胆精神很快得到了承认；现在，他的大胆精神却捅了马蜂窝。还有，他那时有各省委领导的支

持；而现在则不同了。据说曾经有一个"右派"党员说："毛主席的压力很大。在这次国内动乱里，电报（从党内反对大鸣大放的人那里）象雪片一样飞来，都要求限制（整风）"。毫无疑问，有些电报是省委领导打来的。他们因为害怕那些批评打击了他们的官员的士气而显得很焦急。证据表明至少有9个省（它们拥有两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的省委第一书记是反对毛的。（见附录8）。由于这些省的领导支持政治局里毛的反对者，他终于在5月底、6月初当大学里的形势变得难以驾驭时停止了整风运动。

附 录 7

1957年2月27日刘少奇在何处？

究竟是刘没有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毛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还是他有意叫人等他不在场时照相呢？2月14日以后，刘没有在北京露面，这月下旬，他可能开始了行程2400英里的各省视察工作。即便如此，他3月份才到河南省，如果他2月27日以前到了那里的话，他完全可以很快地回到北京。再说，如果他已开始视察，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毛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还要离开呢？

刘出席会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只不过是不想出现表明他参加会议的照片。有证据表明彭真坐在毛的右边，这应该是刘的座位。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形成了一个规矩。按照这个规矩，开会时国家领袖的一边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依次就坐，而另一边应该由总理和副总理依次就坐。这一次，彭真作为全国人大委员会的第八个副委员长，应该和毛还隔着几个座位。1956年1月时，前排还没有彭真的座位（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的照片）。很有可能是，刘想离开座位一会，便叫彭真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资格坐在他的座位上。如果刘根本就没有去参加会议的话，宋庆龄夫人一定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资格坐在毛的右边。

照相的时候，刘可能就在会议厅外面。这一假设后来被消息灵通的持反对政见的学生领袖林希翎所证实。1957年5月23日她提到此事：

"据说当毛主席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时，80%的高级干部表示不满，有的甚至站起身来走出了会场。”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林小姐上述讲话引出了一段有趣的后话。北大（林小姐就是在那里说高级干部退出会场的事的）校长马上就否认了她的说法。尽管校长马寅初教授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但是学生们没让他轻易脱身。他们张贴大字报，质问马校长如下问题：“一、马先生是坐在最后一排吗？二、马先生有没有集中注意力观察是否有人退场？”同时大字报也替马寅初答道：“一、马先生未必坐在最后一排，他也未必扭头向后看。二、马先生肯定也分不清楚那些出去的人是在退场还是要去厕所。”

马寅初教授可能不得不否定党内不团结的证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退场的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干部（因为主席台上的人退场马是可以看见的），而有可能是坐在会议厅后边的一般干部。更有可能的是，刘少奇（也许是其他人）确实在某个时候离开过主席台，但照完相后他又回来了，因此那些党外人士认为他可能刚好上厕所去了。

有关最高国务会议照片的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那张照片照的角度太低，以致于前排以后的人的面孔都无法辨清。一方面，这可能是为了不让读者知道有很多重要的人都没有参加会议，不让他们注意到党内很不团结；另一方面，这更有可能是那些反毛的人所故意设计的，为的是象征性地说明只有那坐在前排的面目清晰的人（除了彭真以外，这些前面已谈到过）真正拥护毛的讲话。尽管如此，除了刘少奇外，前排也有好几个政治局的重要人物缺席。他们是：朱德、林彪、林伯渠、罗荣桓、彭德怀等。其中，林彪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未出席，但政治

---

① 作者引自国外文献，现根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局仍然还有5个委员（包括刘）无故缺席。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人民日报》并没有象1956年1月那样对最高国务会议照片进行附加说明，没有把出席者的名字列出来。如果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刘出席了会议而又想进行象征性的抗议，那么，只要《人民日报》把他的名字与参加会议的人列在一起，他就可能达不到目的了，其他所有要进行象征性抗议的缺席者也不会达到目的。

附　录　8

各省委领导对整风的态度

各省委领导对整风的态度如何，看看宣传他们参加整风活动的材料就可以知道。整风指示规定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挂帅，应该成立运动领导小组。可以说，所有省委领导都遵守了这一指示。不这样做，就会犯组织纪律错误，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不过，整风运动之后只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即河南的潘复生）被解除职务，而且这好象不是因为他违背了指示。

然而，省委领导有可能在服从指示的同时又表示不满。指示一颁布，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报道了一系列有关各省将如何组织整风的新闻。这些报道一定是根据省委宣传机构的官员给记者的材料而来的。这些官员公开强调自己所在省的第一书记遵照指示领导特别小组进行整风。然而，在对25个省一级机构的报道里（见298、299页的表），只有11个才可能表示省委第一书记愿意挂帅。在这11个省级机构里，其中10个建立了领导小组，还有3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可能建立了领导小组，两个省的第一书记想表明群众支持整风。这样，仍然有9个省的领导的名字没能上全国报纸。其中，6个省连它们的特别小组也没上报，5个省的领导没有被在全国报纸报导参加体力劳动。考虑到指示里有关领

导整风的规定，考虑到有关遵守这一规定的形式主义的11个省的新闻报道，我们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报纸故意漏掉的那9省领导是对整风持不赞成态度的。

不赞成整风的省份包括全国人口最多的四川；如果说朱德没有参加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说明了他对毛的态度，那么，他可能乘自己年初时在老家四川之机联合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起来反毛。刘少奇在3、4月间所视察的5个省里就有两个省属于那9省之列，另外一个省态度也是可疑的。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和他的家乡山西省也属于那9省之列。所有这9个“漏掉”的省市管辖着两亿五千万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40%。

各省委领导对整风的态度注释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未成立；鉴于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所说的西藏此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所以我将西藏除外。

②“同意”指报道中特别指出省委第一书记将亲自领导整风运动。“——”指报道中没有提到省委第一书记亲自领导整风运动的问题。

③“同意”指报道中特别指出已建立起专门的小组领导整风运动；“——”指报道中没有提到曾成立了这样的小组。（同意）表示有可能第一书记亲自负责这个小组。

④整风运动准备斗争的“三害”的正确顺序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正确”指在报告中曾提到了“三害”，并且次序正确。“——”表示没有提“三害”。

⑤资料来源尽可能采用新华社的报道。

⑥“同意”表示曾专门报道过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的消息，空的地方表示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

省份①	第一书记挂帅②	成立领导小组③	"三害"顺序④
安徽	同意	(同意)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福建	同意?	?	正确
甘肃	——	——	——
广东	——	——	正确
广西			
贵州	同意	——	正确
河北	同意	同意	——
河南	——	同意	——
黑龙江	同意	同意	——
湖北	同意	同意	——
湖南	?	?	正确
吉林	同意	同意	——
江苏	——?	同意	正确
江西	?	同意	官僚主义
辽宁	同意	同意	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内蒙古	——	——	正确
青海	同意	同意	——
山东	同意	同意	正确
山西	——	——	——
陕西	同意	同意	正确
四川	——	——	正确
新疆	同意	同意	正确
云南	同意?	?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浙江	——	——	——
北京	——	同意	正确
上海	同意?	?	官僚主义
天津			

整风的态度

资料来源⑤	第一书记参加体力劳动⑥	资料来源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37，第10页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11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37，第11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7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5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27，第25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同上第24—25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27，第27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同上，第16—17页		
《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27，第22—23页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		
同上，第20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5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27，第18—19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同上，第20—21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同上，		
同上，第26—27页		
同上，第27—28页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中国大陆报刊一览》1527，第26页		
同上第21-22页《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10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日，11日		
	同意	《人民日报》5月5日

第四部分

反右运动

第十七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发表

第一节　“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1日至20日的某一天，或许是这段时间的末尾，毛泽东透露出大鸣大放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定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说明了他自己头脑里和外部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开始对修正主义感到更加焦虑不安：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在这里，毛泽东强化了1956年12月底，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确定的路线，那篇文章指出，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应该加以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译者注

对。在12月份的文章中，教条主义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险。到了5月中旬，毛似乎要重新估计这两种偏向的相对危险程度。他准备说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比党内教条主义分子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显然不愿意明确指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加危险，部分原因是，他有点自相矛盾地坚持认为，“左”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与右带来的损失一样严重，部分原因则是他觉得党内修正主义的例子只是个别的。很明显，毛泽东的思想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他还不准备鼓励对修正主义进行大规模攻击，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下，这种攻击必然要包括对批评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事实上，这个阶段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抱有希望。他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旧留恋旧世界，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经济建设需要他们的帮助，因此党“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①。

大概在毛把这些思想告诉自己的同事之后不到5天，他不得不向青年人发出警告：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次警告比较间接，好像也是同一天即5月25日在一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发出的。在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指出，那种认为共产党不应该辩驳错误的批评的看法是错误的。接着，他站在共产党方面反驳了一项这类批评。他认为，非党干部有职无权（这一点在高层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反复提到），原因是他们不够资格。看来，没有周恩来的允许，处在卢郁文这样地位的人不大可能发表这样直率的讲话。中国总理可能很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为其辩护，而不必亲自非难非党干部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卢郁文的发言还可能是总理对党外人士发出的他们可能遭到反击的警告。倘若如此，

---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7页。——译者注

总理的这一步骤结局是不愉快的，因为卢郁文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责他是马屁精，并恫吓他，如果不及早回头，后果不堪设想。卢郁文在6月6日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披露了此事。6月8日，《人民日报》以这一事件为由，发表了第一篇对向党提出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社论。

第二节 批评标准的形成

《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卢郁文收到的那封恐吓信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是某些人想利用整风运动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信号。社论写道："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社论的这段话是不祥之兆。同一天，《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辞呈。他的报纸曾在鼓励批评者大胆讲话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本人直率，具有批评精神。

尽管储安平认为凶多吉少，但是有迹象表明，党的领导人尚未对反击的范围取得一致意见。另一位政治嗅觉灵敏的高级记者浦熙修小姐，6月8日打电话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询问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否预示着大鸣大放的结束，得到的答复是，并非如此。既然陆定一可以像两天前周恩来那样拒绝评论，那么他故意撒谎似乎不大可能。他在这个阶段把浦熙修小姐及其报纸《文汇报》引入歧途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承认了许多错误，因此陆定一不一定非要再放任他们，使其自取灭亡。也不可能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陆定一得到的消息不准确。因此，人们必然得出政治局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的结论。

《人民日报》6月8日至12日的一系列反击社论进一步证明，到6月8日，政治局还未确定反右派斗争的方向。这些社论

表明，在选择批评标准和对该受谴责的批评者的称呼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政策的形成花费了一些时间。

6月8日的社论，采用了党外妇女领导人何香凝使用的“右派分子”一词，并赞成她的观点，即这种人在滥用整风运动，以便开历史倒车，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推翻社会主义事业。第二天发表的题为：“必须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的社论，其目的显然是要避免整风运动蓦然刹车。这篇社论还首次试图为正确的批评规定标准。社论指出，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团结”的批评，既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整风运动的利益。头两条相当于10天后发表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出现的6条标准的第二和第三条，不过在后者中，它们的范围更加广泛，口气更加强硬。第三条即党和人民的团结，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哪条标准都不完全吻合，但是，它可能是讲话中第一条和第五条标准形成的基础，第一条标准是关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第五条是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在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①中，这些标准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社论提到少数错误观点是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这里再次预告了毛讲话中的第二和第三条标准，尽管形式上比前一天更加包罗万象。毫无疑问，能够被合法地谴责为“削弱”，比方说，“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批评意见，比能够被实际地说成是“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批评意见要多得多。这篇社论还比前一天的社论更加准确地预告了毛泽东讲话中的第五条标准即党的领导，并且提出了第四条标准即民主集中制，尽管它把这条

① 即《工人说话了》。——译者注

标准与第三条标准放在一起，没有给予其在将要发表的毛泽东讲话中所获得的独立地位。在寻找用以描述那些对党进行错误批评的人的适当称呼方面，6月10日的社论也取得了进展。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使用了“右翼知识分子”的提法。6月8日的社论沿用了何夫人“右派分子”的提法。6月10日的社论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为赎买工商业所付定息的期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通常简称为“资产阶级右派”，是后面两种提法的合并，这一提法是后来毛的讲话发表以后，在《人民日报》6月22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中，作为明确的称呼出现的。

6月11日的社论说明，6条标准的形成前进了一步。社论的题目——“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暗示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社论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声明与毛泽东的第二、第三和第五条标准相吻合。但是，随着“拥护”一词——它很可能是毛的讲话中使用的“有利于”一词的前提——的采用，这些标准的范围也再次扩大。避免消极态度是不够的，需要对6条标准采取积极态度。6月11日社论又一次间接提到了毛的第一条标准所涉及的内容，社论问道：

> “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月12日的第五篇反攻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谴责了“右派分子”利用批评运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再次预示了第二、三、五条标准。两天以后，在后来证明是毛的讲话发表前的最后一篇反右派

社论①中，《人民日报》第一次明确指出要有些标准，它选择了一条最为重要的标准：

>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以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②

总之，从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到6月18日毛的讲话发表这10天期间，这些标准是这样一步步勾画出来的：

6月8日，没有提到标准问题。

6月9日，预告了第二、第三条标准；暗示了第一、第五条标准；使用了“破坏”一词。

6月10日，预告了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条标准；使用了“削弱”一词。

6月11日，预告了第二、第三、第五条标准；暗示了第一条标准；暗示了第二条标准（社会主义）的特殊重要性；使用了“拥护”一词。

6月12日，预告了第二、第三、第五条标准。

6月14日，第一次使用“标准”一词；社会主义被选为根本标准。

6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讲话的公开版本，确定标准如下：

> “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

---

①② 《是不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译者注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①

最后确定的标准比以往预告的任何标准都要全面。首先，这些标准包括了新的肯定准绳（“有利于”）和程度上往往两样的否定准绳（“破坏”和“削弱”）。其次，以前从来没有间接提到过的一条新标准，作为第六条标准提了出来。第三，现在有两条标准被单独列为特别重要的标准，而4天前只有一条标准。此外，这两条特别重要的标准被列在第二和第五，而不是第一和第二，这大概是决定发表毛的讲话以后，仓促编写的一个迹象。形成这6条标准的另一迹象是，在毛列举的标准中，关于第二条的描述使用了“社会主义道路”一词。《人民日报》6月9日社论的用词是“社会主义事业”，6月10日社论用了“社会主义方向”一词。类似的情况是，6月10日的社论中突然出现了第四条标准，随后消失了，直到毛的讲话中才重新出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直到6月14日的社论以后，才有人草拟了一套正式的标准并选定了最重要的几条。这一点证实了毛发表演讲时，演讲中没有6条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发表毛的讲话（正值需要把标准系统化的时候）的决定，直到6月14日的社论问世之后才作出。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做出这一决定的？

---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译者注

第三节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决定

可以想象，政治局在6月14日至18日之间才做出决定，认为在不久后《人民日报》所形容的“不平常的春天”造成的局面下，用根据记录修订的原稿，向干部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说明毛关于矛盾问题的分析情况，是有益的。几乎可以肯定，政治局在讨论发表这篇讲话的可取之处时，这是理由之一。但是毛肯定会抵制这一理由。发表插入6条标准的讲话，显然会使人们怀疑他背信弃义，破坏他与党外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关系。实际上，毛在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不得不试图消除这种怀疑（见后面第十八章第三节）。

看来更有可能的是，6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带有很长引语的毛讲话的摘要，使毛措手不及。这篇长篇报道（其中包括从毛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删去的一些段落）的消息到达北京太迟，对6月14日的社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纽约时报》抢先发表的这条独家新闻，看来使中国领导集团产生踌躇并重新考虑其立场。从6月8日到14日，《人民日报》除了一天之外，天天发表反击批评者的社论。但是从6月15日到6月19日即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该报发表时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主题的社论。

当中国领导人关注和讨论《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可能认为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世人都不得已而求其次，将其当作可靠的文本。他们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教训，这一教训提醒他们，如果不发表正式的文本，再多的公开否定也不会推翻泄漏出去的文本。因此，发表原来讲话的正式修订文本，删去在华沙泄漏给《纽约时报》的文本中所包含的令人不太愉快的内容，插进2月份在

毛看来并不需要的政治行动指导方针，这样做要好得多。另外一点较为次要的考虑，可能是面子问题。主席可能不愿意让他的一篇闻名于世的主要讲话，只通过美国的“资产阶级”记者报道出来。这篇讲话是由波兰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泄漏出去的，这可能是毛对待波兰共产党人态度冷淡下来的一个理由，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理由的话。他一定把这次泄漏看成是兄弟般关系的重要裂痕，至少表明波兰安全机关方面效率太差。

第四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正式文本

与华沙文本和罗伯特·洛以及其他人的叙述相比较，可以看出，6月18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原文，删去了所披露的一些非常直率的内容。2月份，毛明明白白地透露了在几次肃反斗争中被处决的人数。按照华沙文本的说法为800,000人；按照罗伯特·洛的说法为“不会大大多于700,000人”；按照学生领袖林希翎的说法为770,000人；按照另一名学生的说法为“770,000多人”。毛披露这一情况的目的，可能是要表明诚意，同时，正如洛所指出的那样，也是要推翻西方关于处决2000万人的估计，这种估计可能为党外知识分子所听信。2月份，毛在谈到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错误时，也非常坦率，他说，西藏的改革不得不推迟数年。

但是，鸣放者对这些删去部分的兴趣和关心程度不及对插入部分的兴趣和关心程度高。插入部分中主要是关于进行批评的6条标准，这6条标准完全改变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批评者的鼓励态度，并且，如果在原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有它们的话，就会实际上阻止任何真正的“大鸣大放”。

这6条标准是直接为了斗争需要而加进去的。其他补充和变更反映了由于“大鸣大放”，毛的认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造成这篇讲话的各个部分着重点明显不同。一方面，毛断言“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后面不远，他又指出：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谁是最终胜利者尚未确定，这一点不符合他在前一年里的讲话精神，尤其是周恩来所阐释的讲话精神，甚至不符合他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所提出的论断，即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中国人的大多数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说明这段话是后来加进去的另一个迹象是，第一句话是6月8日社论中同样一段话的详尽阐述。根据这段话的说法，卢郁文收到的恐吓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如果毛早在2月份就指出了这一点，那么很显然这封信就不会告诉人们任何新东西。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变化即指明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一认识在12月底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没有出现，在该文中两种危险是并列的。看来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译者注

到2月27日毛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看法也不大可能。甚至在5月份，毛也只是准备指明修正主义分子比教条主义者更加危险，而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如果1957年2月毛已经认定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加危险的话，那么3－4月份，毛就不会在接待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时，比接待较为保守的（即教条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具有更大的热忱，或者准备向他作出思想上的让步。正是到了1957年夏天，毛取消原定对华沙的访问之时，他关于两种邪恶哪个更危险的判断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然而，尽管有这些肯定使中国资产阶级感到惊慌不安的形式和内容上的更改，这篇讲话仍不失为一份允诺实行新政的文献，无论把它看作共产党国家提出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彻底否定”，还是看作“众口同声的极权主义社会幻想”的体现都是如此。讲话仍然强调说服教育而不是强迫命令；仍然提倡对待罢工采取克制的态度；仍然答应给在各次肃反运动中受冤屈的人平反昭雪；仍然谴责官僚主义。讲话重申了百花齐放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对国内局势的感觉可能有了改变，但他仍然把这些观点公诸于世。

第十八章

毛泽东与右派的联系

第一节　彭真的态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国外受到报刊的好评，但在国内，它的发表却使主席丢脸。现在，成千上万（也许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知道了毛被迫退却，从根本上修改了不到4个月前他满有把握的主张。对批评共产党的人进行猛烈反击，这对3月份还提倡“放”的方针的那个人来讲，是一个失败。毛被迫承认刘少奇和彭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6月7日，彭真召集北京市委高级干部会议，他对与会者说，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他运用既委婉隐约又咄咄逼人的类比方法继续说道：

“斯大林自以为永远正确、绝对正确，结果被苏共二十大一巴掌打得灰溜溜的，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把斯大林的像片摘下来了，甚至撕毁了。……可

见，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①

彭强调主席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或与党相提并论：“我们党所有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是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个工具，应该怎样更好地加以利用”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看来彭真作了大量工作，这一点为种种事件所证明。至少，就在6月8日社论发表之前，据说他与吴冷西和邓拓（两人分别是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显而易见他在协调安排反右派斗争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但是，彭并不满足于仅仅坐看鸣放被放弃。有证据表明，他对反驳前几个月毛所提出的建议起过作用。他是通过谴责采纳这些建议的“资产阶级右派”这样做的。值得注意的是，头一次提出这类重大谴责的人，是彭真的一位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吴晗是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看来与彭真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这样的共产党同事关系密切。8年以后，当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想摧毁北京市委机构时，正是对吴晗的猛烈攻击预示了清洗即将来临。可以肯定，在1957年夏季，如果没有把握，没有可能来自像彭真这样的高层人物的鼓励，吴晗大概不敢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毛，那怕是间接的批评也是如此。

吴晗的攻击是直接针对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对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进行调查这一建议的。十分明显，他的目标是毛，因

① 《彭真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北京日报》1967年6月10日。——原注

② 《彭真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北京日报》1967年6月10日。——原注

为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了组织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并且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坚持了这一建议，他说：

“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①

吴晗是通过攻击罗隆基来谴责这一建议的。罗5月22日在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纳了毛提出的建议。罗主要关心的不是对过去冤案的平反；十分自然，在毛提出建议之后，他有了根据。他感兴趣的是利用这个委员会，使仍然害怕鸣放的人恢复信心和勇气。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就是：

“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即共产党——作者注。〕，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②

罗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有三个好处：（1）委员会的存在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2）委员会要给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这样会进一步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3）委员会可以使那些敢于打击报复的人，有所畏惧。

反击开始后仅仅两天，即6月10日，吴晗在同《人民日报》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页。——译者注

② 《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注

记者的一次专门谈话中，相当全面、准确地回忆了罗的建议，然后对记者说：

>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①

吴晗的第二点异议，实际上不过是宪法上的诡辩，是争论的观点而不是严肃的批评。显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并不会使这两个机关本身发生变化。但是，提出这点异议可能是打算制造某种冠冕堂皇的假象，要不然就要赤裸裸地攻击毛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对党内同志“不信任”。

6月19日，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的文章发表当天，该报刊登了其中含有原有建议的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吴晗感到有必要稍微改变一下攻击的根据。这一次，他只是攻击罗隆基想要“搞党、政机构以外的平反委员会。”②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预告了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批评。

6月25日即周讲话的前一天，罗隆基在民主同盟一次整风会议上的发言中，试图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 “罗隆基对他曾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作了名词上的辩解。他说：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

---

① 《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注

② 《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原注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我说过〕领导党〔即中共〕也要参加。他又说，这话是错误的，他不否认。据他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①

《人民日报》刊登罗的辩解，再次引起人们对罗的建议与毛的建议之间相同之处的注意。为了防止万一有人对这段话产生误解，该报后来刊登了关于罗在森林工业部活动的长篇揭露文章。据说，罗在森林工业部期间的助手赵文璧曾“三番两次地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引申，与主席讲话精神没有‘不符’之处。”②

至于对待这项建议的正确态度，《人民日报》读者也未产生多大疑问。7月15日刊登的右派分子叶笃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悔过发言中，谈到：

“自从他〔罗隆基〕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喝彩。”③

面对向罗隆基所谓“平反委员会”建议发起的不断攻击，以及罗的建议与毛自己的建议有联系的明显证据，即使是像周恩来那样娴熟的政治家也只能为自己的上级提出极其软弱无力的辩护。6月26日，周在全国人民代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他们〔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

① 《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原注

②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2日。——译者注

③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译者注

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① 严格说来，周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勇敢地正视这样一种棘手的情况，即如果毛的建议得以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某种形式的联合委员会，不能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建立。当年年底，大概是为了同刘少奇取得妥协，毛本人不得不表示支持对罗隆基建议的攻击。看来毛自己的建议没有在全国实施，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

第二节　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攻击

对罗隆基的攻击，在文章、谈话、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都在进行。全国人大的召开为刘少奇和彭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俩人作为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和秘书长，处在组织和督促进行全国反右派斗争的位置上，拥有最大限度地公开活动的权利。

195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② 原定6月3日召开。5月25日，开会日期推迟到6月20日。也许是担心学生们利用开会的机会进行示威，因此决定暂不召开，直到可以制服他们为止。6月19日，即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推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这次推迟到6月26日，中间这段时间举行预备会议。

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这些预备会议好像主要用来学

① 《政府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译者注

② 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译者注

习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由于许多（也许是大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可能亲自或者从磁带录音中听到过原来的讲话，所以可以肯定，基本上是向他们说明进行补充和删节的必要性。6月21日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宋庆龄（孙逸仙的夫人）等非党领导人的文章，使代表们下定了决心，全心全意地参加到后来谴责他们的犯了错误的朋友和同事的行列中去。尤其重要的是，刘少奇和彭真一定利用这些预备会议说明了批评能够据以顺利进行的路线方针。

首先必然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应该怎样描述批评对象。因此，似乎有理由设想，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①中“资产阶级右派”一词，是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需要有一个方便的称呼而仓促使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中国领导人可能长时间内不会在称呼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彭真，可能还有其他早先同他一样对整个整风计划抱怀疑态度的领导人，似乎主张采用更加强硬的称呼，甚至在新创了“资产阶级右派”一词之后也是这样。

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全国人大第一天会议议程的中心内容。总理用了大部分时间为现政权辩护，反驳了自5月初以来针对现政权提出的最突出的指控。他还认为，一旦右派分子被孤立了，大多数人就会接受思想改造。周在报告中也为毛作了辩护，驳斥关于毛犯了错误的怀疑，把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分析称为“光辉指示”（也就是说，不只是讲话或报告），认为根据这些指示“［我们］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②在这段话中，周恩来按其原有次

① 《不平常的春天》。——译者注

②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译者注

序提到了“三害”。但是，在此之前，他采用了更符合刘少奇心意的次序，在看起来像是对刘和彭真提出的和解建议中，把思想改造放在行动改造之前：

> “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①

周本人讲话措词相当温和，在多数情况下，提到批评者时用的是“有些人”，而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滥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称呼。但是，周的温和态度并没有得到普遍效仿，7月1日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反右派发言的调子更加尖刻。大家继续指责右派分子提倡显然是起源于毛那里来的一些建议，指责他们把毛的讲话加以引申而得到鼓励，以图策划阴谋活动。毛的一些拥护者成了此类迂回攻击的牺牲品。从章伯钧（他被说成是罗隆基的同谋）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章伯钧在5月份的一次座谈会上提议建立一个“政治设计（或计划）院”。看来他的目的是要使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应中国共产党之约讨论某些重大问题和政策。这项建议本身所受到的攻击不及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也许是因为中共干部更感到担心的是重新审查肃反运动，而不是可能以不关痛痒的方式加以实施的模模糊糊的立宪建议。刘少奇本人毕竟在1956年11月曾把政协形容为某种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上议院”。但是，章的建议为攻击毛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供了借口。例如，章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4名党员，在全国人大上的联合发言中宣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

---

①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译者注

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指章伯钧〕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野心勃勃，认为今后大有可为。”①

吴晗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把形势描述得更加严峻，他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1956年初以来降临于共产党国家的所有主要灾难相提并论：

> “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章伯钧和罗隆基〕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②

另外一个来自共产党内的明显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的迹象，是右派分子马哲民的自我批评发言提供的。他引用了3月份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我从习仲勋那儿探听了一下口风，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中，极力主张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任务，有了这，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了条件，否则只是空谈，兑不了现。”③

在这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由于把党内分歧向党外人士做了暗示，而受到责难。刘少奇和彭真有理由对他在中央国家机

---

①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的联合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译者注

② 《我愤恨，我控诉！》（吴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译者注

③ 《我要重新做人》（马哲民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译者注

关进行整风的热情以及他想使整风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来的企图感到不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章伯钧的另一次攻击中，更多的高级干部被牵连进去。有人讲到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驻重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首都）办事处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了章伯钧，办事处的负责人周恩来和董必武如何经常同他商量事情，尽管他是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招摇撞骗。言外之意是，周和董至少太不明智，在党的怀抱中养育了一条毒蛇。可以认为，对周的政治智慧进行诋毁，是由于他在整风问题上坚决支持毛。董必武被卷进去，是因为他作为最高法院院长，想必会在肃反斗争问题上坚决替党辩护。

有一次，还有人把周恩来与毛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党的干部认为他几乎同主席一样，对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人类学家费孝通证实，罗隆基经常用毛或周说过的话来吓唬人。

章伯钧在中国民盟中的一位同事对他进行的攻击，为贬低毛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创造了机会，并且附带提供了这种诋毁并非偶然产生的有力证据。胡愈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章在传达毛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对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说的话："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①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毛的讲话有可能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新信念。此外，有关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胡愈之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员，所以不可能参加章伯钧发表这篇讲话的会议。看来，可能是有人蓄意把这段讲话提供给胡愈之，以便使之公诸于众。

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都因"歪曲"毛关于共产党领导高等院

---

① 《章罗联盟的透视》（胡愈之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译者注

校的讲话而受到攻击。这一点对于结束无拘无束的批评运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学生情绪的高涨，任何取消党委领导的举动都可能引起学生情绪的突然爆发。6月初，所传上海复旦大学已经取消了党委负责制的说法被立即加以否定。如果毛以任何方式鼓励这种形势的发展，那么党的干部的不满就会特别强烈。

看来吴晗再次首先暗示了毛应负责任。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发言中说，在4月份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章伯钧和罗隆基散布了要党委退出学校的观点：

> "根据是假借传达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主席说学校党委制党可以研究。章罗传达时变成'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①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针对章伯钧在北京铁道学院活动的批评报道②。据说，5月18日他在铁道学院做报告时宣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毛主席还不知道。章伯钧讲这种话的意义何在不大清楚，但显然暗示了毛对党委制有反感。最后，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另一位发言者③说，章伯钧在两个方面歪曲了毛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之一就是宣称毛建议取消学校党委制。唯一表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材料，是4月初他在中共上海局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主张根本改组大学党委会，包括把一些干部调任他职。4月底他是不是又进了一步呢？总起来看，似乎更有可能是，毛的确说了很类似章罗所断言

① 《我愤恨，我控诉！》（吴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译者注

② 《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点过一把火》，《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译者注

③ 即马哲民。他的发言题为《我要重新做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译者注

的那些话。

第三节 毛泽东进退两难

毛对整风期间出现的对共产党的大肆攻击负有首要责任。毛的困境就在于他制造了两个而不仅仅是一个信誉差距，要消除这两个差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他又不得不努力一试。一方面，他作为具有先见之明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而在党员中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他的诚意，至少他对共产党的权威，由于反右派斗争，现已引起党外人士的怀疑。6月14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对该报在整风期间的作用作了自我批评。社论实际上暗示，《文汇报》的错误是认真采取了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放”的方针：

>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①

这段话刺痛了毛，他在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露出来的）抨击《文汇报》的社论中，引用了这段话。他驳斥了《文汇报》的辩解，指责该报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对于帮助整风并不是真感兴趣。此时，毛试图解决两个信誉差距问题。为了说服党员，他争辩说，起初没有反击是故意设置诱饵，以便引敌人出洞；对于党外人士，他有点自相矛盾的声称，不存在什么阴谋，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充分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

① 《明确方向，继续前进》（社论），《文汇报》1957年6月14日。——译者注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那些听过毛最初两次讲话中任何一个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未必会接受关于最近种种事件的这种说法。4年以后，当共产党试图恢复“百花齐放”的政策时，周扬在一次讲话中承认：“若是认为争鸣的目的在于让毒草放出来，好整它一下，开个斗争会，则大大违背百家争鸣本来的意思。”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毛迫于形势矢口否认自己最初的打算，对反右派斗争表示赞成。实际上，关于存在着一场由章伯钧和罗隆基领导的全国性运动的说法，可能是他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为了把自己的失算搪塞过去而想出来的。看来第一次正式提到章罗同盟，无疑是7月1

① 《在中国科协一九六一年全国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者引自柯志文、张吟韵：《斩断周扬黑帮伸向科技界的魔爪》，《解放日报》1966年8月4日。——原注

日的社论。但是毛仍想以温和手段对待正受攻击的弱者。他坚决要求在处罚右派分子时采取克制态度。毛与主张强硬路线的人显然是语义上的争论，即关于描述右派分子的恰当称呼问题的争论。但是选择何种称呼决定了要给予有罪的人何种惩罚。这一点可以从毛写的7月1日社论的另一段中看出来：

>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的原则〕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①

毛的态度的基本矛盾在于，他准备同意把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行动整个谴责为“反动的”，但同时又不想把资产阶级右派本身称为“反动派”。如果那样做，就会把他们与蒋介石之流等同起来，那他们就理应受到严惩。这种矛盾，由于毛在这篇社论中的说法与他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的说法之间不同而显得突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①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8页。——译者注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后面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在7月1日的社论中，毛认为实行宽大政策就是因为人民的国家已经很巩固，断定右派分子不可能把它推翻，也就是说不可能获胜。

毛并没有使一些人信服。7月1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颠倒了周恩来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重要性的先后次序，否定了毛的温和态度。他说："右派必须无情批判，整风运动必须坚决继续进行。"①

第四节 毛激怒了他的反对者

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可能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召开了一个纪念会。邓小平在会上发了言，讲了一些刘的好话。想以此来缓解毛与刘之间的不和。如果邓真有这个意图的话，那么毛以后的行动使这一意图失败了。

毛在有关右派分子的称呼上的执意反对，一定是因为他对一些同事大为恼火。但是在他的社论发表一星期之后，便真正开始向他们挑战了。由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反右斗争越来越激烈，毛对此十分生气，因此他到了气氛比较和谐的上海。7月7日，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一些地方官员的陪同下，他接见了该市36名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讲了

①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阐述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人民日报》1957年7月12日。——译者注

话。他就右派分子的人数和影响两方面而论，大大地贬低了他们的作用。他讥笑某某同志，说他害怕这些右派分子会闹翻天。他说，7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7月，到了8月，就要和风细雨。整风是正确的，每个五年计划里都应该搞两次。所有领导者，包括他本人都有缺点，都应该经常洗澡。毛对中间派说，他承认他们是同盟军，但是他批评了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最无知识的，又说他们靠着无产阶级过活而又拒绝接受无产阶级思想。

7月9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发表毛的讲话，只是说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亲切的交谈”。[①]还有，《人民日报》拖延了两天之后才刊登了会见的照片。为什么要拖延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刘少奇和彭真正忙于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反右活动，而毛却表明要团结上海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激怒了刘和彭。也许是刘下令《人民日报》编辑不要刊登照片，以此来减小毛的行动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设想：照片最后之所以登出来，是因为毛亲自干预的结果。不管怎么解释，这件事肯定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大为难堪，他在7月3日或4日刚刚接替邓拓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并没有被打倒，他继续作为社长为该报效力，继续主管社论起草工作。并在后来进入了中共北京市委。不过，当高级领导人在整风问题上发生争执后，很明显他是主要的（但不是最后的）一个牺牲品。

更能说明毛决心阻止全力反右的一件事发生在刘少奇和彭真主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从此我们看出为什么在右派分子的称呼问题上发生争议。一些主要的右派分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猛烈批评之后，人们认为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罢免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的部长职务。罗隆基预料全国人民代表

①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译者注

大会肯定会对他的问题作出决定。但事实上，当他在7月15日下午听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并没有作出决定时，他深受鼓舞，马上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抗议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不公正待遇。罗隆基也许已经意识到迟迟不对自己作出处理，是因为高级领导人之间有分歧。由于罗以及他的同事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政府在6个月的时间里存在着3个已被打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右派部长。这样，尽管邓小平在7月8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对各省市委书记说明了对待右派分子的政策，但是广大党员干部还是被弄糊涂了，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也许是因为这两件事情，《人民日报》开始发表直接攻击毛的文章。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是右派分子曲解了毛的政策，毛的面子因此而得以保全。现在，右派分子直接攻击毛的话上了报。尽管报纸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揭露右派分子的罪行，但是，很难相信，它不想说明在整风开始后党员干部对毛的看法。

对毛的直接攻击最早出现于7月11日，即《人民日报》刊登毛在上海会见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照片的那一天。有人批评毛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人民日报》引用章伯钧的话说："合作化工作搞的不好，农民骂毛主席。"①当时，农业合作化是毛在自己的许多同事反对的情况下取得的一大功绩，譬如刘少奇就因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作了自我批评。不过由于1955年7月31日毛发表了一篇影响力极大的讲话②，使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毫无疑问导致在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和协

---

① 《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译者注

② 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译者注

调上产生了不少问题。《人民日报》引自章伯钧的话表明，因为这些问题而不满的农民是在责骂使合作化运动盲目冒进的人，而不是在骂那些不得不执行这一政策的党员干部。这就暗示了如果毛当初同意按照刘所主张的速度去搞合作化的话，他和农民的关系就会好一些。

7月15日，即右派部长得知他们没有被解除职务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对毛本人最集中、最具有损害性的攻击的话语。这些攻击都出现在题为《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的文章里。陈批评毛的性格是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并把他和德国的俾斯麦相提并论，陈指责毛怠慢党的高级干部（不知是否指刘少奇和彭真），宠爱党外的那些趋附之辈。这样的批评竟出于陈这个非党人士之口是很不寻常的，不过，那些被毛在上海的照片触怒的党员肯定会非常欣赏这一批评的。

陈还批评毛搞个人崇拜，特别是一些歌曲称他为"太阳"和"救星"。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自我批评①，他耐人寻味地扭转了陈对毛搞个人崇拜的批评。章承认他和一些非党人士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在此之前，政协全国委员会曾通过一个设立一所毛泽东大学的议案、毛拒绝了这一议案。尽管毛的反对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同党的干部是一致的，然而，章所承认的事情加上陈铭枢对非党人士的攻击，毫无疑问地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主席总和那些心怀鬼胎的非党人士在一起，他们对他搞个人崇拜，以此来讨好他。这样就暗示了毛的个人崇拜不是他同事的责任，同时，党的干部不能因毛的同事使毛登上高位，难以批评而对他们加以责怪。几天之后，人们在攻击右派党员记者刘宾雁时，又把毛与"坏分子"联系到一起。据说，刘宾雁对整个共产

① 《我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译者注

党进行了批评，就是没有指责毛，因为毛在整风问题上决心是大的，而高级干部却是反对整风的保守力量。

右派分子的这类言行起了一个双重的作用。它们既批评了毛、同时又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是坚决反对毛的整风政策的。还有一些右派言论也突出了后面这一点，把彭真说成是干部的主要保护人。《人民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的话说，北京学生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彭真关系密切①。有一位右派分子承认自己诬蔑了中共北京市委，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②的政策。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引用戏曲界的一位右派分子③的话说，京剧界的鸣放搞得没有上海好。所有这些引语实际上是在对那些深深地卷入反击的党员干部表明彭真对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所持的不同立场。

7月17日，《人民日报》更正了陆定一为纪念整风运动15周年而写的文章。我们知道，陆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早在1957年3月5日就发表了，印刷错误在第二天就应该予以更正。这次，《人民日报》过了四个月之后才进行更正，这表明它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作者陆定一耽搁了这么久才去重新审阅自己的讲话。《人民日报》只在三个地方作了同样的更改：在以下几段话里，都将"阶级"改为"剥削阶级"，并为所加的两个字打了着重号：

"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在社会

---

① 《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译者注

② 《我的检讨》（黄药眠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译者注

③ 即李万春。参见《李万春在京剧界兴风作浪，妄想重温日伪时期的旧梦》，《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译者注

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已经消失，只有剥削阶级的残余，即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①

这一更正暗示了中国还没有消灭阶级，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仍可能存在。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

可能是为了突出起见，该报将陆定一文章的更正和引用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右派分子钱伟长的话“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②安排在同一版面上。该报如此公开高层领导者的分歧（也许是接到命令才公开的），充分说明中央在7月中旬仍然存在分歧，刘和彭真对毛和周不愿严厉惩处右派分子表示不安。中国干部担心中国共产党会模仿刚刚清除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4位苏共领导成员的苏联共产党。

第五节　青岛会议

7月的某个时候，也许在16日至22日之间，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全面估计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和条件，清楚地提出了开展运动的政策。是否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尚不为人所知。邓小平可能参加了。他在两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时，提到了青岛会议。我们

① 《更正：陆定一同志来信》，《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第2版。——译者注

②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译者注

知道周恩来和乌兰夫8月初在山东的疗养场，也知道乌兰夫自从7月20日以后一直在那里开民族会议。尽管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也是省级领导，因为他是内蒙古的第一书记。所以，他在青岛，不能说明其他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如果真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那么青岛会议便是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不过，如果刘少奇和彭真在青岛确实见到了毛、周和邓，那么，这次会议显然没有涉及他们之间的所有重大分歧。值得指出的是，邓没有说毛在青岛会议上发出了整风指示，只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方针。邓也没有说毛在会上作了报告，而只是说他作了估计。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毛本人提到青岛“文件”，这也表明他在青岛会议上可能印发了讲话稿，而没有作报告。不管毛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毛在青岛好象进行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没有错误，但是没有青岛的那一篇就不够。”①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所没有提到的问题，后来他在青岛时进行了补充。显然，这说明他意识到当时资产阶级的反党情绪比他估计的要强烈的多。然而，毛却把这种情况变成了一种武器，他认为这证明“八大”决议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是错误的。尽管在反右斗争中毛的对手也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是毛坚持说这同时也证明同党员作斗争也是正确的（我们以后将谈到这一斗争），对此他的一些同事表示极为不满。

毛在青岛讲话的题目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讲话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出现，而且那时也只能看到一些简短的节选。其中一段摘录里包括“我们的目标”这一笼统的说法：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25页。——原注

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①

一方面，这一信念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毛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妥协。当毛7月初在谈到这些目标时，他把民主放在集中前面，把自由放在纪律前面。在另一段摘录里，毛分析了反右斗争的意义，说它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②毛预计反右斗争要延长10至15年之久，而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就会继续下去。毛之所以说反右斗争将延长10至15年之久，是因为他估计工人阶级要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以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也需要花10至15年时间。

由于这些摘录当时并没有公开，因此，从7月底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它们的引文和释义。最先出现这些引文和释义的地方可能是《人民日报》7月28日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这说明毛的讲话稿可能是在7月28日以前的几天里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开头和结尾两段里都是与毛在青岛的讲话稿相呼应的。开始，社论强调了当前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社论说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社论的最后一段谈到了毛在青岛的讲话稿里对党员的品质提出的要求。毛说：

---

①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61页。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①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最后一段里也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定要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永远保持朝气，永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用了毛的讲话稿里的一些词语，也反映出了讲话稿的精神。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断：社论说出了毛对党内右派分子的看法，因为社论与毛5月份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主张是相呼应的。

社论的基本意思是党内存在右派分子（尽管"一些好意的同志"认为这不可能），而且因为这些右派分子从内部发起进攻，所以他们比党外右派分子更加危险，所以应该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严厉对待。后来，毛说青岛"文件"讨论了"保护干部"的问题，并且认为大多数干部的错误并不严重，应该宽大处理。首先，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正在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评的党外

①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0页。——译者注

右派分子身上转移到了党内右派分子的身上，并且强调党内右派分子更具危险性。其次，由于刘和彭曾经是负责教育和发展新党员的（两三年前邓接管了这一工作），所以社论拐弯抹角地批评了刘与彭。同样有趣的是，该社论不得不强调毛在青岛的发言稿里讲党内右派分子的那一段落。

第六节 毛、刘继续不和

不管刘少奇和彭真是否参加了青岛会议，他们对毛在会上的主张显然是不满的。后来邓小平在提到这次会议时显得十分谨慎，这就说明了这一点。更有趣的是毛与刘少奇、彭真间的分歧被进一步公开了。

7月29日（即《人民日报》根据毛在青岛的讲话稿发表社论的那一天），该报刊登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①的如下言论：

> “对右派分子发动了反击可能是毛主席的方针受到了党内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的反对，因而有了转变，毛主席妥协了，这是老干部想报复，太不道德了。……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②

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则批评这一右派分子的报道，把这些引语的大部分又重复了一遍。

《人民日报》再次提起高级领导之间的不和，是没有必要的。该报7月17日发表了一位右派分子的言论，③因此，人们已

① 即许良英。——译者注

② 《决不让党内右派分子腐蚀党的肌体》，《人民日报》1957年7月29日。——译者注

③ 指钱伟长的一段话。——译者注

经知道刘和彭是反对整风的。我们有理由这样假设：《人民日报》再次提起毛与刘、彭之间不和是为了表明他们的不和仍在继续，这也是该报第一次公开他们不和的部分原因。7月中旬，他们之间不和好象是因为毛保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7月底，正如上面的引语所表明的那样，"老干部"仍然想对右派分子进行报复，但是毛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党内右派分子，这更加激怒了刘和彭真。

8月4日（即《人民日报》重复报道7月29日有关高级领导之间不和的报道的第二天），彭真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

>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以前，甚至在大规模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后，不也是说他们只是反对共产党吗？"①

随后，彭又列举了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相同之处：

> "我们应该同陈独秀'宽宏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么？绝对不能。"②
>
>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当蒋介石、汪精卫对待，而是说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性质的严重和恶劣，以及手段的毒辣。"③

总而言之，彭真把资产阶级右派比作蒋介石，提醒人们不要

---

① 《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1957年8月7日。——译者注

②③ 同上。

仿效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包容这样的罪犯。然而，在发起这么一番猛烈的攻击之后，彭却说没有必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作蒋来对待。彭提出了几个历史相似之处，强调毛在7月1日社论里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彭也表明他认为毛的宽大政策是愚蠢的。这是《人民日报》第三次告诉它的读者，彭和毛是有分歧的。

彭真的讲话一处也没有提到过毛或他的讲话。然而，彭的讲话表明他听说过或读过毛在青岛的发言稿。彭两次用了"朝气"这个词，其中一次的上下文和毛相似。彭真承认党员应该有朝气。彭的态度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截然不同的。柯赞同毛的发言稿。

8月15日，柯庆施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引用毛的话，列举了对共产党员的一些要求，并在这些要求当中插入与《人民日报》7月28日社论的结尾相呼应的话：

>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地去克服任何困难……一个共产党员，要永远是朝气蓬勃地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奋斗。"①

接着，柯强调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所列举的领域几乎和毛一样。不过，柯传达毛在青岛的发言稿时所用的最突出的方法是逐字逐句地引用毛关于政治目标的基本论断。柯通过重申毛的"开明"政策的正确性，进一步突出了毛的这段引语的重要性：

> "这是我们党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的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政治局面

① 《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整风》，《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42页。——原注

（即：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总方向。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各项政策，必须也将会继续贯彻执行，绝不因为反右派斗争半途而废。反右派斗争，正是为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创造条件，因为我们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没有共同语言，不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局面是不可能造成的。因此，怀疑不再整风了，不再鸣放了，是没有根据的。”①

我们不知道柯的这番有关政治目标的话是否也是他从毛那里引用过来的。不过，我们有理由这样假设：在毛肯定他以前18个月里所提出的政策的必要性时，他也谈到过政治目标这一问题。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彭真不同意毛的政治目标的提法说明他反对由这些目标所引出来的政策。直到毛、周与刘、彭的分歧解决之后，刘、彭这两位反整风的主要人物才肯接受毛的方案。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柯庆施是赞同毛的主张的。为了说明应该宽大地对待右派分子，他大量地引用主席7月1日的社论。由于柯等人都同意宽大地对待右派分子，青岛会议带来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结果：那些党内干部的保护者要求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惩处右派分子，毛却成功地阻止了他们。

---

① 《深入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整风》，《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第138页。——原注

第十九章

妥　协

1957年8月初，毛和他的对手似乎仍在激烈地争吵。然而到了9月底，他们显然已经调和了彼此间的分歧。甚至今天也不可能搞清楚当时妥协的诸种因素，但妥协的最初基础似乎是这样：刘少奇和彭真接受毛关于党的干部犯有错误的反击性断言，而毛放弃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的观点。作为妥协的结果，农村干部不得不投身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后来又被看成为1958年"大跃进"的中坚角色。在妥协的背后，一定潜伏着这样一个共识：面对严峻的农业形势，领导层需要保持团结。

第一节　粮食危机

1956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情况很糟。尽管1957年气候较好，但农业产量的增长率甚至更低，只有3.5%，而1956年为4.9%，从而损害了农业合作社制度。棉花产量比1956年增长11.4%，

但由于前一年的种种挫折，8月份，棉布的配给量还是减少了。更糟的是，1957年的粮食产量仅仅增长了1%，还不到人口增长率的一半。这更加深了夏末粮食供应的严重危机。在前18个月里，国家粮食征购量急剧下跌，而全国销售量却上升了，不得不动用国家的粮食库存来弥补不足。于是，毛有可能利用这种形势来反击他的对手。

195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有关粮食形势的社论①中，把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农村干部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认为合作化了，自己的生活应该过得更好一些，"本位主义"则指只顾本社本乡的农民眼前的一点小便宜，看不到国家的长远利益。本位主义的干部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多报缺粮，以求给国家少卖余粮，多得供应。而且，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行为，得到县级干部的宽恕，这些县级干部认为，如果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需要限制一下粮食的消费，就将"对不起农民"。

对于欺瞒中央政府的上述手段，农村干部中有个非常流行的开脱理由，即工人坐收农民之利，农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标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农村干部的大胆行为，或许是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斯大林忽视农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批评所鼓舞而采取的行动。中共领导人曾极力驳斥那种认为他们不关心农民的看法。刘少奇在各地巡视时讲过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5月份的《人民日报》上曾发表一篇文章，罗列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数字和事实。② 6月份，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③中强调指出，既然

① 指《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译者注

②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译者注

③ 指《政治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译者注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收入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是应该的。他同时还强调，由于不同性质的劳动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高级工作人员与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应有所差别，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如果取消这种差别，就是平均主义。据此看来，那些反对工农之间的收入应该保持一个合理差别的人也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

总之，农村的“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等错误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些具有平均主义思想的干部认为，农民的待遇与工人的相比是不公正的，从而促使他们搞“平均主义”，并纵容、唆使农民少报粮食产量，宽容农民的“个人主义”，这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漠视。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在他的青岛讲话稿中指出了上述各种倾向间的联系，他号召党员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① 摘录了毛给党员发出的警告，提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没有提到农村干部的本位主义错误这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核心）。直到8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② 才向本位主义开火。5天以后，它发表了中央的“八·八指示”③，从而揭开了在全国农村开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一开始受到

---

①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译者注

②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译者注

③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译者注

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不顾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为中心的思想”。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提到党的干部的错误的社论：

“可是，有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工作人员在内，没有认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同志在对像粮食问题这样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错误地站到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同志，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地给以应有的打击。”①

社论接着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重要方面：

“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②

在这里，社论很清楚地指出了农村教育运动的第一个目的，是纠正党员的错误，并且指出了这些错误与粮食问题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社论反复强调：

“目前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③

在随后的3个星期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6篇社论④，

①②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社论。——原注

③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社论。——原注

④ 即：《粮食销量是能够减少的！》（8月12日）；《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8月15日）；《自由市场要严格管理》（8月18日）；《吃粮要有计划》（8月28日）；《在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8月30日）；《城市用粮必须努力减少》（9月2日）。——原注

论述严重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给毛提供了反击他的对手的机会，毛因此可以指出党的干部犯有严重的倾向性错误，即使这些错误不是整风运动中所要批判的主要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发表7月28日社论到8月5日社论之间的某个时候，毛使他的对手确信了同“本位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如同他在青岛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当毛和刘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才有可能制订出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八·八指示”。

整风运动期间，主要的目标是对准城市党员干部，他们由于以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粗暴地对待资产阶级而受到批判。而现在，农村干部则由于过于宽待农民并因此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而受到批判。这次运动的严重性可以从下达的清除异己分子的指标上显示出来，在广东省，共产党员开除3％，共青团员开除8％。

然而，农村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并不像他们的城市“同仁”3个月前那样易受攻击。在整风运动期间，党员干部们被要求呆呆坐着，逆来顺受地接受批判。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面对党员，同时还面对非党群众。此外，这场运动是由党领导开展的，干部们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不是无能为力地指责自己。毛可能原打算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次群众性大辩论，使农民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在基层，干部们以自述代替了辩论，充满自信地反复为他们自己辩护。

中央领导机构还采取了有助于重申农村干部的领导权威的措施，这就是由国务院8月17日颁布的取缔自由市场的决定①。由

---

① 《国务院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1957年8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6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57年8月18日。——译者注

于农民过分忙于生产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私人产品，农村干部长期以来一直感到很难劝说他们参加集体劳动。而现在干部们可以指望比较容易地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如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关闭自由市场是挥向农村的大棒，那么对农业的较多投资和默认农村干部所抱怨的忽视农民的现象在某些方面存在，则是扔给农村的胡萝卜。8月9日，即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指示发表后的第二天，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天津发表的一次讲话①中透露，中央已经决定在1958年的计划里增加对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就在一个月前，他还强调紧缩财政，并支持国家计委的紧缩政策。而现在他则坚持必须"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并重"，并以"农业发展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可以促进轻重工业的发展"为由，说明增加农业投资的必要性。中央最后决定，农业在国家总投资中的比例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增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0％。

薄的讲话标志着部分地回到了毛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思想上。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强调指出，轻工业和农业上的较多投资，可以更多更快地积累资金，从而有助于重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薄虽反复强调对农业的投资，却并不愿意提对轻工业的较多投资。相反，他指出，"由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1958年对轻工业的投资将有所减少。"但不管怎么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主张，现在已明显被计划部门和党的领导人接受了。

---

① 《薄一波向天津市干部报告编制1958年计划控制数字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译者注

第三节　毛对资产阶级幻想的破灭

在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乐观的，并且坚持认为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 “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①

这段话不禁使人想起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中所表达的态度。对于知识分子接受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这一点，毛并不比周有更多的幻想。他指出，还不能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这个改造。但他期待着他们不断进步并且逐步与工农相结合。他似乎设想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逐步无产阶级化，这一设想未明确说明的根据便是，只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状态得到矫正，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就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4页。——译者注

大约一个月以后，毛在青岛的讲话稿中，相当大地修改了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期望值：“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① 他还指出，党对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因此，他强调（而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却并未这样做），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显然，尽管毛并不打算把响应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的那些右派当作反革命分子或者甚至反动派，但5月和6月初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促使他再次修改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此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取消了早些时候给予作家以很多自由的做法，这也许更使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趋于强硬起来。这一切意味着毛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关于知识分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结果，他在青岛思考的结论，成为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依据。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温和”政策的失败

毛对资产阶级幻想的破灭由于北京没能劝说蒋介石化除干戈，使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而进一步加深了。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头几年里，由于强调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毕竟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但在1956年，毛肯定曾希望中国国内的解冻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所赋予统一战线的新的意义会消除蒋的顾虑。然而，在周恩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译者注

正式提出谈判之后的一年中，并没有任何公开迹象表明国民党准备接受这一邀请。1957年中期台湾发生的反美骚动的结局表明，蒋介石永不会同意与共产党打交道。

1957年5月20日，一名叫雷诺的美军上士在国民党的首府台北接受设在那里的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指控故意杀害了在其营地周围徘徊的一名33岁的中国劳工。①雷诺声称自己无罪，分辩说他是出于自卫才把那个人打死的。5月23日，由5名陆军上校和3名上士组成的军事法庭陪审团宣判雷诺无罪。同一天，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中国人诅咒美国兵的文章。第二天，受害者的遗孀举着“难道杀人犯雷诺无罪？抗议军事法庭不公正的判决！”的标语牌，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她坚持要见“大使”，而“大使”本人此时正在从香港度假回来的路上。人越聚越多，根据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推测，骚乱的真正开始是在当国民党当局的一个无线电广播小组录制了与受害者遗孀的谈话，并通过高音喇叭公之于聚结的人群之后。大约在中午12点30分，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的人群开始向院内扔石头，2点30分，人群涌入院内，推翻车辆，洗劫了“使馆”。美国国旗被扯落下来，而升起了国民党的旗。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也被洗劫一空。当天晚些时候，大约2万——3万名示威者试图冲击警察总署，以便使早些时候被关押的嫌疑犯获得释放。警察开枪还击。据报道，至少有8名示威者伤亡。

一夜之间，蒋介石派遣33000名士兵进入台北，实行军管，局势得到了控制。蒋还解除了台北“卫戍”司令、“宪兵”司令以及台湾省警备司令的职务。但他拒绝了国民党内阁提出的集体辞

---

① 根据《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报道，该劳工名为刘自然。关于刘自然的职业，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官，有的称他为职员。——译者注

职的请求。5月26日，蒋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表达了他的“深深的歉意”。两天之后，据报道，他的政府正准备开展一次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以弥补军事法庭的裁决对美国威望的损害。

据报道，蒋认为，骚乱是“义和团暴动”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6月1日，他发表广播讲话，表示他对那次骚乱负有个人责任，但他警告他的追随者们：

> “今天我必须再一次向我们的人民指明，在执行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的国策中，我们必须坚决与民主国家的领导者的美国站在一条阵线上，我们决不容许来自内外的任何人对这个政策的反对。”

他还鼓动他的听众说，共产党政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挽救它自身的唯一希望是煽动台湾的反美暴乱。毫无疑问，这带有从心理上批判大陆的新色彩。

在大陆，台湾的反美情绪的爆发给中国当局以可以理解的鼓舞。《人民日报》在就这次骚乱发表的第一篇社论①中，号召台湾人民再接再厉，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社论还宣称，企图卖国自保的蒋介石集团的命运是朝不保夕的。这可能反映了或许能说服蒋介石与美断绝关系的一种微弱希望。3天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再次号召台湾人民，把美国赶出台湾。但事实表明，实现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从骚乱中仅仅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虽然用它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台湾，但是它绝对占领不了台湾同胞们的心”。②社论还谴责了国民党当局对美国

---

① 《台湾人民不可屈》，《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译者注

② 《台湾的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译者注

的道歉。

这个期间，大陆新闻界较多地宣传随美国军事法庭审判和骚乱而来的台湾的反美情绪。但是，特别是在蒋介石6月1日的广播讲话之后，有两件事肯定很清楚了：一是国民党当局控制住了局势，并未因此而重新考虑其整个处境，二是周恩来总理6月26日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对台湾时局的论述十分简短：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又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①

周的简短论述反映了政治现实。当毛刚刚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后不久，吁请国共双方和解是一回事；但当反右运动正在进行之际重新呼吁和解则恐怕一点意义也没有。同时，国民党官方对骚乱的反应也表明，就是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前，共产党对其老对手的拉拢也没收到效果。当毛在分析1957年夏季的形势时，他已意识到统一战线政策并没有对台湾产生影响，从而使他决定要消灭资产阶级。

第五节　妥协的产生

8月初发出的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标志着毛和其对手在粮食危机面前达成了初步妥协。有证据表明，在这之后政治局一直致力于重建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9月份，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组社论就是中共高层领导恢复团结的标志。

---

①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译者注

不过，在8月份，就是在妥协达成之时，仍有一系列迹象表明毛的反对者们依然不愿意让他解脱困境。就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彭真便发表讲话，借痛斥右派分子以嘲弄毛的宽大主张。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试图融合双方的分歧点，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这篇社论的重点是关于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问题，但同时它又严格遵循毛在青岛讲话稿中所作的反右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党对整个知识界领导的重要性的分析。社论还简单地提到了党内右派，尽管它并未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把这类右派看作为比其他右派更危险的人。此外，在论证更加坚决地开展反右斗争的主张时，社论引用了显然是经过挑选的两句警言，这两句警句与毛所提出的温和地对待犯过错误的人的有关警句相矛盾。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且还指出要防止“一棍子把人打死”；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警告：“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社论的最后一段暗示了政治局内依旧存在的分歧，不过这些都在语义上巧妙地避开了。社论的这一段指出，反右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这里并未提整风运动（实际上整个社论都是如此）。但在下面一句里，社论首次赞成国务院7月26日所通过的决定①，该决定要求政府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当这个决定作出时正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闭幕，这次会议所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反右派斗争。周恩来可能想通过国务院的决定确保整风运动优先于反右派斗争。8月16日的社论为了表明对这个决定的赞同，甚至引用了其中的某些话，但仍尽可能避免使用“整风”这个词：

---

① 《国务院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1957年7月27日。——译者注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认真执行国务院7月26日所通过的决定，‘把参加这一运动〔整风运动〕和斗争〔反右派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

8月中旬，彭真也开始出面促成妥协。当时，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邀请陆定一和康生两人向5600名宣传工作者作报告。陆定一于8月16日作了关于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讲话。他引用了毛在青岛讲话稿中的论点，但他像彭真早些时候那样，把右派与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而且报告中根本没有谈及整风运动。按说，整风运动作为其报告题目中的第二位内容，无论如何是应该点一下的。康生于8月17日作了关于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与陆定一不同，他多次提到整风运动，并且始终将其摆在反右派斗争之前的头等重要的位置。

然而，到8月中旬，中共高层领导已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人民日报》8月16日的社论指出，许多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正如康生在论及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已告一段落。”换句话说，大学已得到了控制，学生动乱的危险已经过去。这样，在一种局势趋于平静的气氛下，领导者们寻求到了妥协。

妥协是在9月初达成的。9月5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社论① 开始向全党传达这一新的事态发展。妥协的性质——无论是真正的妥协还是语义上的妥协——在社论的第一句话中就指了出来：“党的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目前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也就是说，整风运动

①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原注

和反右斗争将结合起来进行。其目的一方面是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是整顿党的工作作风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宗派主义降到第三位可能表明了对资产阶级兴趣的减弱）的错误。社论承认，整风和反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它宣称，两者都可以采用群众性大辩论的方法。社论批评一些干部害怕这种群众路线在工厂和农村的表现形式。实际上，社论明确暗示了将不会容许5月份那种使党处于被动局面的状况重演。社论公开表示：

> “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通过群众的辩论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放弃领导，可以放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放弃劳动纪律和行政纪律。相反，辩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加强应有的集中和纪律，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

第二天，新华社宣布了6月份汉阳学生闹事的首犯已被处决的消息，这更加强了社论中的这段话的分量。

那么，妥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刘少奇和彭真显然已同意继续纠正官僚主义陋习，但这必须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下。况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或即将在社会各个领域内展开，这将必然意味着党的权威的恢复。人们不能肯定毛是否对这种条件下的整风运动感到满意，但起码面子是挽回来了，他的反对者现已准备接受他的青岛讲话稿中的观点。《人民日报》第一次不带倾向性地引用了毛在青岛讲话稿中有关政治目标的一段概括性的话。这段话几乎可以肯定是毛的讲话稿中最为重要的部分。13年以后，这段话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国家宪法草案里。《人民日报》9月5日的社论引用这段话，是政治局内的裂缝愈合的重要标志。

9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①]再次提出了党内右派问题，6个星期之前，这个问题大概曾使彭真十分恼怒。《人民日报》提到了它7月28日登出的那篇社论[②]，指出必须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它的主要内容是重申毛关于党内右派比资产阶级右派更危险的警告以及强调防止温情主义。其真正的意图好像是要表明，最高领导层在有关党内右派的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 "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同党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以后，（一些同志）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③]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就同一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④]，进一步补充了社论的内容。他在文章中坚持认为，共产党内的间谍现在就藏在毛的身边。事实上，安子文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来自中共北京市委。这也表明，彭真现在正在配合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

4天以后，《人民日报》又提到了另一桩有争议的案子，即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性问题。社论同样提及了以前发表的一篇社论，不过这次提及的是毛为《人民日报》所写的7月1日社论[⑤]。社论似乎是想简单地重新叙述一遍前篇社论的观点，再次论证右派的行为是反动的。重提这个问题的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是，有

---

①③ 《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译者注

②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译者注

④ 《接受教训，增强党性》，《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译者注

⑤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译者注

些人至今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很有可能社论的真正目的是如实地向党说明毛与彭是怎样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在最后两段里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但不能将他们与蒋介石联系起来，即暗示不能像彭真那样把他们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然而社论补充道："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蒋有组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了。"换句话说，彭真不仅随意地将右派与国民党相比较，而且甚至还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实际联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右派就根本不是右派，而是特务了。这里再次从语义上解决了两者观点上的分歧。社论最后拒绝了彭真明确希望的严厉惩罚右派的主张：

> "最后，或许会有人问：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里重申了毛在7月1日社论中所表明的态度，但对毛关于对右派分子——他们中许多是一些头面人物——宽大处理的论点略去不提。这个论点曾是毛这位共产党领袖为不过分得罪任何一方而提出的，所以相当模糊，而且毛大概没有充足的理由来摒弃它。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透露，当时曾作出规定（不知是否是毛？），右派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据说刘少奇在1962年曾评论说："这个规定是正确的，但实际执行上把面搞宽了。"①这段话表明，同彭真一样，刘也曾对不得不同意温和地开展反右斗争极为不满。

9月18日，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人民日报》

① 《在总结四年政法工作时的谈话》（1962年4月28日）。——译者注

发表了有关右派问题的最后一篇社论①。概括性地阐述了为什么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成就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在思想政治领域进行革命的问题。它重申，没有必要对大多数右派采取极端措施。社论还加强了毛在青岛讲话稿中就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提出的时间表的重要意义，它指出，争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还需要经过10年或15年之久。社论中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它表明在是否应给资产阶级右派贴上反动派的标签这一问题上，毛和他的反对者再次达成了语义上的妥协。在社论第一段的末尾，右派被称之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在社论的所有其他地方则被称之为"右派"或"资产阶级右派"。在所能看到的青岛讲话稿的部分摘录中，毛曾有一处把右派称之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邓小平在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正好有一处将右派称之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同样，刘少奇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0周年的讲话中也正好有一处这样称呼右派。因此，妥协似乎是这样：是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为了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各自的讲话中（仅仅一次）把右派称之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但我们必须使用的正常称呼只能是"资产阶级右派"，以表明我们并不打算像对待其他反动派那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为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代表确立方针的最后一篇政论文章仍是由安子文写的，发表于全会开幕的当天②。文章论述了干部政策，其意图似乎在于使党员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安全放心。安子文

---

①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译者注

②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20日。——原注

在文中驳斥了右派所谓“共产党用人是‘德乱才废’、是‘重德轻才’，是‘用人唯资’”的言论。安子文这里详述了实际上在1958年才提出来的“红”比“专”更重要的论点，为党的干部政策辩护。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为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进行辩护时，他引用了毛、刘、周3位中国领导人的话，好像是说，在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关键问题上，党的高层领导的调子是一致的。在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与会者肯定会对此文的用意心领神会并感到放心的。

第六节　邓小平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报告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于1957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了近3周时间，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416名基层干部参加。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全会，这或许表明了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这次会议也是“文化大革命”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全会，它表明最高领导层迫切想向尽可能广泛的听众显示他们的团结。

陈云和周恩来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全会闭幕前两天，毛也发表了讲话，指出中共八大决议有不正确的地方。但大会的主要报告，也是唯一公开发表的报告，则是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体现了前两个月里达成的各方面的妥协。毛取得了许多语义上的胜利和两个具体的胜利——宽大处理右派和继续进行整风。但是，作为交换，刘少奇和彭真可以使党摆脱夏初一度所处的被动地位，恢复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与陆定一一个月前的讲话不同，邓小平报告的标题里仅仅提

到整风运动，而未提及反右派斗争，这是刘、彭让步的书面标志。就他们来说，只要达到了恢复党的领导权威的目的，把反右派斗争归纳于毛的整风运动的总标题下也就无所谓了。邓强调指出，反右派斗争在某一地方某一时间胜利结束后，整风运动要继续开展下去。然而重要的是，在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之前，先要经过反击右派阶段。所以，即使邓断言整风运动的全胜不是“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第二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①党员干部也不会有什么理由对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整风运动感到担心了。

此外，在谈到整风运动时，邓以各种不同的顺序列举了“三害”，这种排列次序上的随意性表明，当整风运动继续进行时，它将不会有以前那样固定的目的了。在有关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险性的认识上的分歧，曾非常明显地出现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向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而现在却毫无涉及，高层领导已一致同意不分先后地反对“三害”。

邓重申了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正确性，将其称之为“中央方针”，这大概意味着它们乃是毛、刘妥协的产物。他们达成一致的措施有：反右斗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在党和非党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相信群众的基础上充分地、坦率地同他们交换意见，展开讨论。

大概正是基于毛、刘之间的这一妥协，邓才能够在他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并吸收毛在青岛讲话稿中的许多论断。在某些地方，邓重复了柯庆施一个月前所提出的看法，这表明柯庆施的这些看法也源于毛的青岛讲话稿。

---

①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译者注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运动的一般情况”中，邓高度赞扬了毛在青岛讲话稿中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然后，邓以毛的话强调了反右派运动的重要性，并且像柯庆施一样，他宣称如果党不能赢得思想政治战线上的辩论的完全胜利，就不能继续前进。邓指出，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为了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再一次引用毛的话，称“资产阶级反动右派”与人民之间的这些矛盾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邓接着对人民内部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整风形式作了区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①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人民内部，则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

正是在这一点上，邓指出，4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的分析。这是高度暗示，上面所作的整个分析也都是对毛的青岛讲话稿的进一步阐述，事实上它是毛在7月份所作的形势估计的相当近似的翻版。另有一个证据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暗示。在邓所作的分析中，几乎所有那些不能直接追溯到毛的青岛讲话稿上去的部分，都与柯庆施一个月前所作的一部分分析十分相近。只是在关于整风的方法问题上，两人的分析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区别。柯曾指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既适用于反右派斗争，也适用于整风运动。邓同意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但就敌人来说，他指出要进行坚决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这种差别也许反映了毛在如何开展反右派斗争

①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译者注

的问题上所作的让步。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邓再一次大量引述了毛在青岛讲话稿中的分析，可以说整个部分都是毛的观点的体现。象毛一样，邓宣称右派的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还不心服，同时也表明，只有取得了对右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才能赢得中间分子，一部分右派分子才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到9月底，邓已经可以宣布，在许多领域，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预告整风运动将从反击右派阶段进到第三阶段，即整改阶段。毛后来也赞同这个估计，11月17日，他曾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说，我们已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右派已被“打垮了”。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论断，但在详细阐述这一胜利的含义时，邓在9月底仍像毛2个月前那样显得十分谨慎。毛在2个月前曾说，打败右派和赢得中间派的斗争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邓的报告表明，尽管右派已被“打垮了”，但他，而且或许还有一个月后的毛都坚持这样的估计：

> “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①

---

①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译者注

作了这一长远的预见之后，对于邓也就毛有关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培养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作出响应就不足为怪了。不过邓大概象毛一样，仍觉得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他断言：

“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

“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

“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①

邓接着肯定说，统一战线这一知识界的百花齐放在政治领域内的必然反映，仍然发挥着作用，不过它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②（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①②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译者注

以上这些分析，都是对毛过去18个月的“宽松”政策的强有力的重申。实际上，邓竭力想表明：5月份的整风运动结束了，但新的整风运动万岁！可是，反右派斗争和六条标准的制订，使毛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已不可能照最初设想的那样加以实施了，毛大胆的试验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语

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他使党受到诋毁，从而招致了许多老资格同事的不满，也逐渐损害了他自己的声望。尽管他曾清醒地看到了改善党与人民关系的必要性，但他明显地低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这是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毛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他的估计上的错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由于先前没有很好地与人民沟通，毛无法了解人民真正在想些什么。

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以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正如邓小平向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毛和他的拥护者都十分清楚，正是执政党的地位，导致了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行为。因此，干部品行的改造，只有通过改变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去实现，但在1957年，毛并不打算这样做，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他毕生始终不渝地相信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部分是因为他那时还十分满意党所创立的这个社会。只

是到了60年代中期当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性和发展不再抱有幻想时，他便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党本身，而不仅仅是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了。

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认识上的一致使得1957年秋妥协的达成成为可能。政治局长期团结的传统也肯定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仲夏，苏共对“反党集团”的清洗，尖锐而又及时地提示了党内激烈斗争的危险性。正如刘少奇1957年12月对一些印度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

> “不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党都必须维护其自身的团结……一个党的分裂比一次革命的失败更加危险，因为这样有时甚至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我们党一贯捍卫自己的团结，反对分裂，按党章办事；不允许自行其是，随便发表个人意见。”①

在这个时候，刘是能够表现自己的高姿态的，因为1958年1月，毛将向干部们公布他准备在1959年任期结束时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图。毛的这个决定可能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作出的，这也许是毛的青岛讲话稿能得到刘的支持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中共第二号实权人物，刘显然最有希望成为毛的接班人，而且也许主席还私下保证将支持他。毛关于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很可能是他准备从权力的第一线逐步退出来的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毛选择这个时间公布自己的退职意图——离他退职的时间还有整整一年，但离他整风运动期间所受到的挫折仅仅几个月——很有可能会被干部们看作是主席个人的某种含蓄的自我批评。

---

① 未查核中文原件，据英文译出。——译者注

刘在统治集团内的地位还因周恩来在1958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去所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务而得到加强。由于周后来仍像以前一样继续较多地管理外交事务，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周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他在整风运动期间所起的作用的一种象征性惩罚而强加于他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周的地位还因严峻的经济形势而受到了削弱。

即使在反击次要的反对者方面，毛也处于软弱的位置，这是不足为怪的。邓拓夏季被解除了《人民日报》总编的职务，但他仍旧负责着报纸的大量事务。很有可能，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是在毛的坚决要求下，于1957年8月辞去兼任的广东省省长职务的。实际上，在当时6位身兼二职的省级干部中，只有陶铸一人辞去了省长职务。据“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露，1957年曾重新审查了他与高岗的关系。陶曾不得不两次发表声明，以表示自己的清白。很有可能，毛当时企图把重大罪行扣在陶头上，以报复他对刘等人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显然是败者。直到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才把陶打倒在地。

毛、刘在经济上的联合

毛、刘1957年秋的和解，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需要。开始，即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毛的自由化政策曾用以唤起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积极支持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经济过热——投资增长了60%，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因而1956年的“跃进”被放弃了。但经济形势仍在继续恶化，部分是因为195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1957年的局部灾害，部分因为1956年“跃进”的持续影响。1957年仲夏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财政投资将要比前年削减20%，1956年的财政赤字将通过压缩财政支出4%，增加税收2%来解决。到

夏末，新闻界开始议论严峻的粮食供应危机。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了，但经济状况仍然相当严峻。

这些问题虽然并不完全是计划部门的错，但它们显然成了替罪羊。它们曾坚决抵制了1956年的“跃进”，但此后的12个月里经济形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计划部门，同时对计划部门的那一套体系也提出了疑问，在两国的人口资源的构成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人完全照搬苏联的发展战略合适吗？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曾暗示了他对苏联体制的某些方面的不满意。1957年中期，刘少奇表示他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疑虑重重，尽管这种模式目前还适用于苏联。在与党校校长谈论分配问题时，他说：

>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从苏联教科书上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要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苏联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说：‘苏联搞计划经济吃了大亏，结果经济生活呆板’。苏联同志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一到中国，见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就很感兴趣。”①

1957年秋季的另外两个因素无疑也加深了对苏联经济模式的不满。中国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已清楚地看到，苏联显然不可能以中期贸易贷款的形式给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这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东欧国家的动乱迫使俄国人给象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国家提供了1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这是苏联1957年9

①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1957年5月7日）。——译者注

月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因素。它进一步促使中国人在投身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完全抛弃了苏联的计划模式。

另一个促使中国领导人抛弃苏联模式的因素便是“秀才造反”，即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毛所发出的展开批评的号召而作的强有力的、而且常常是反党的反应。自1956年1月以来知识分子曾一直受到青睐，因为他们被看作为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如果他们中有那么多的人是不满分子——在1959年10月建国10周年的大赦中有26000个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毛在1958年4月的讲话中指出，共有右派分子30多万，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指出，1957年共抓了40万右派分子——那么，把国家的经济前途建立在他们的技术的基础上将是相当危险的。而没有忠诚的知识分子，苏联经济模式中臃肿的行政机构如何维持？此外，俄国人不是已承认他们的经济机构也不适用他们自己了吗？1957年5月，赫鲁晓夫曾实行了彻底的经济改革，包括撤消25个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权力下放给一个称之为“苏联经济委员会”的新的经济部门。

所有以上这些因素——经济危机，对苏联模式的幻想的破灭，暗淡的（苏联）援助前景，对专家治国论的怀疑，以及苏联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合力，使计划部门处于守势，而把毛、刘推向了各自的怀抱。1956年，他们两人都赞成高速度地发展经济；都赞成“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秋天，当萧条的农业成为国家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时，他们两人都极力主张重新实施“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它作为试图开展新的大跃进的标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宣称：“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合作化表现出了很大优越性，才是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接着，他再一次阐述了“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他说，这个“纲要”鼓舞了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根据经验，对此作了一些修改，提

议全会予以批准。农村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要以“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冬季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然后，中央将作再一次的修改，经年底党代会讨论，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颁布。但是，要实现“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必须同保守主义作斗争。“1956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全会结束后一个星期，谭震林（同邓小平一样，他也是毛个人小圈子中的成员之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毛就象两年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做法一样，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又转而求助那些他确信可以依赖的人。

毛、刘试图决定再搞一次跃进，必然影响到周恩来和计划部门的地位。周不安地意识到，一年来他对1956年“跃进”的反对使他与主席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尽管毛在整风运动期间曾深深地依赖于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周就一年前反对盲目冒进作了自我批评。不管是在整风运动上还是经济上，周都是输掉的一方。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周和他的经济计划部门的主管陈云退到了幕后，他们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也都没有发表。

威信受到损害的并不仅仅是周、陈云两人。由于毛，刘显然受到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鼓舞，开始推行向地方放权的计划，整个中央经济部门都蒙受了很大的打击。1958年5月，两个计划工作者李富春和李先念被选入中央书记处，这表明，从那时起，中央一切经济计划的制订都要由党的机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来讨论了。中国已经开始抛弃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中苏关系

1957年秋天，俄国人可能根本未想到中国人正在抛弃苏联的发展战略，可能毛、刘本人也并未意识到他们正在这样做，以为自己不过是开始设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对赫鲁晓夫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并且也是令他满意的，这即是毛已终止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苏中意识形态分歧的开端，因为尽管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告诉周恩来，他的国家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但赫鲁晓夫后来明确斥之为邪说。随着整风运动的放弃，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就失去了实际影响，事实上，这一学说一度似乎已被人们忘却了。因此，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就暂时趋于平息。

然而，如果赫鲁晓夫对毛的整风运动的结局不感到某种程度的幸灾乐祸的话，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他肯定对中国人以自信的态度为震荡不安的共产主义阵营制定准则、鼓励波兰要求更大的独立以及创造一个使东欧知识分子羡慕的“自由”共产主义模式等行为极为恼怒。但是现在，百花已经凋零，毛再也不准备默认波兰反对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的行动了。其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自己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华沙泄露出去感到愤怒，但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国人打算同国民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以使台湾回归大陆的种种愿望都付之东流了。甚至在反右派运动以前，北京肯定已经明白蒋介石不会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北京再也未向国民党呼吁在共产党与资产阶级重新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在日内瓦同美国人的会谈也无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日内瓦会谈中，中国人促使美国人同意允许在美的华

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返回大陆。但是说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同意双方互不使用武力的种种努力，却因杜勒斯提出所谓中国人应答应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反建议而没能取得成功。1957年5月，美国与国民党签署了允许美国在台湾部署斗牛士地对地导弹的协定，这些导弹能够发射深入中国大陆好几百英里的核弹头。这项协定似乎是美国以更为现代化武器加强其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的总战略的一部分。在1957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周恩来抱怨了南朝鲜发生的类似情况。6月28日，杜勒斯在《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中，重申了他的强硬政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商，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此外，为中国内部高涨的批评浪潮所鼓舞，他说，他深信，共产主义在那里只是昙花一现。显然，到1957年中期，北京对美和台湾的温和外交路线已失败了。

由于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国领导人一定为苏联在火箭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消息所深深鼓舞。8月26日，塔斯社宣布，苏联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6个星期以后，即10月4日，苏联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不到一个月，即11月3日，它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上还载有一条狗。美国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因为这表明苏联在火箭技术上已遥遥领先。中国人对此又惊又喜。

苏联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头一天，毛抵达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导弹技术上优势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用很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的这个看法，即“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号召对西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并且不再准备默认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团结；波兰人大为震惊，毛劝谏他们要保持团结，毛现在强调的是纪律而不是自由，同国内政策一样，在外交政策上，这位主席也改变了方针路

线。

毛在国内外所表现的新的战斗精神，使1957年秋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乐观主义情绪消失和百花齐放时期的幻想破灭的背后人们看到了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下一个10年里占去了毛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这些问题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共产党的作用，经济发展的速度，苏联模式的适用性，以及他自己地位的不可捉摸。而首先摆到面前的问题则是"大跃进"运动的狂热和混乱，三年困难时期和中苏分裂。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是第二卷研究的主题。在第三卷中，我将试图揭示，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